

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叢書

國家與經濟生活

國聯世界文化合作院編
王鳳儀譯

一九三三年的會議，將在全體會議的概括討論以後，分爲三個委員會，分別研究上列的三類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將送繳於異日再開的全體會議。

本會議已接受英國協立國際研究委員會的邀請，一九三三年的會議將在倫敦召集。

國 家 與 經 濟 生 活

L'ÉTAT ET LA VIE

ÉCONOMIQUE

所				版
	委	會	中	化
	員	籌	國	合
	會	備	協	作
有				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 實價國幣一元

編 者

國際聯盟

世界文化合作院

譯 者 王

鳳 儀

出 版 者

上海霞飛路一八五六號
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籌備委員會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弁言

這本書不是一個人的作品，也不是兩人三人的合作作品，乃由數十個現代翹出的經濟學者，奮其筆舌，——一部分是書面的報告，一部分是會場的演說，——合作而成，這就是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一九三二年米蘭會的紀錄。會議的淵源及對象，研究的範圍及方法，讀者均可在原序中看見，這裏不贅。譯者要說的話，就是這本譯文出現晚了，一九三二年的米蘭會議，現在已成陳迹，介紹它的記錄，似乎也失却時效了，不過這本書的價值，並不僅在它的新聞性質上，各國的備忘錄，都是各大學教授的精心結撰，會議席上的演說，都是一鳴驚人的崇論閎議。這些學者，正因他們的知識浩博，觀察深遠，所以於本會議所討論的特種問題而外，往往把整個的經濟問題，直至把整個的經濟科學，不自覺地撼動起來，牽連出來，好像要併案辦理。原來米蘭會議提出的問題：『國家與經濟生活』，就經濟範圍論，便是很容易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就時間的範圍論，也不是

一九三二年以後不再發生的問題，即就米蘭會議的成績論，也還是沒解決的問題。不過在本記錄中，這個問題，已得到國際學者公開的探討，寶貴的貢獻，尤其是以自負『超國民的評論家』的態度，在彼此利害衝突的關頭，冷靜地交換意見，這是國際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舉。所以這本記錄，說它在新聞上的價值，今日已失了許多，這倒不妨，因為它在學理上的價值，在政策上的價值，在歷史上的價值，絲毫不減。

迴想譯此書的經過，也有應該聲明的一點。原本有英文本法文本兩種，譯者譯此書，係承同學友陳和銑先生之託，為他所從事的世界文化工作，幫一點忙。陳先生初次寄來的原本，是英文的，當我譯纔及半，却把原本並譯稿一部，在旅行中遺失了，因聞原本不易再得，只有盡棄前功，後來陳先生又覓得一法文本寄來，始得接續譯完。但以法文原本與由英文本譯出之部分校對，大致雖尚不差，可是段落的分析，句法的結構，辭意的內涵，不同處正復不少。我初擬把這一部分都用法文本校對修改，纔略動

筆，又覺多此一舉，因英法原本，雖然各行其是，實係一爐冶出，——參看『緣起』，——譯者兼收並存，有何不可？於是不再修改了，但也許遇到細心的讀者，要把譯文與原文校對一下，我就應在這裏聲明：從『第一次研究會議』，至『討論之總結束——鐸爾東博士發言』之起處，是由英文本譯出的。自此以至本書末頁，都是由法文本譯出的，但本書開端的『緣起』，『參加本會議人員名錄』，『本會議研究大綱』，及『開幕詞』，都是最後譯出的，所以也是由法文本譯出。

附譯例

(一) 本書內之演說及備忘錄，其本文中間每插入記錄者之敘事，或編訂者之附註，有時演說中有一兩段却用小碼字排印，這些夾雜參差的記錄，在譯本中，爲醒眉目，均有分別安排的必要，因以豎行上空之格數別之；凡演說及備忘錄之本文，每段第一行只空一格，餘行頂格。凡種種標題，及一切由記錄者插入之敘事，由編訂者增加之附註，以至本文之註腳，

本文在原本中用小碼字排印之節段，其第一行上端均低二格，餘行平列。至如人員名錄及會議大綱等眉日本自清晰者，不在此例。

(二) 本書中所稱之『報告書』，『備忘錄』，有時又稱『研究書』，初讀則易疑其各有所指，其實只係一物，譯文因順原文下筆，故未求畫一。

(三) 凡人名地名，除國名各大都市之名及歷史上卓著之人名外，其他於第一次在本書中出現時，皆於譯名下填註原文。至參加本會議人員，因卷首有名錄可查，故西文名多從略。

譯者記

緣起

此書由國際文化合作社用法文及英文同時編訂出版，係根據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會議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米蘭開第五屆年會中之決定。

國家與經濟生活

緣起

一九三二年五月在米蘭舉行之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第五屆會議
參加本會議人員如下：

主席：

羅誥君。(M. Alfreds Roco)

總報告員：

博恩君，(M. M. Z. Bonn)及鐸爾東君。(M. Hugh Dalton)

其他參加人員：

亞摩羅蘇君。(M. Luigi Amoroso)

巴布科克君。(M. Earle B. Babcock)

伯克爾拉特君。(M. Herbert Von Beckerath)

賁罕穆君。(M. F. C. C. Benham)

柏爾柯希特來塞爾君。(M. Arnold Bergsträsser)

鮑爾德里尼君。(M. Marcello Boldrini)

布葛勒君。(M. Celestin Bouglé)

雷葉斯君。(M. Manuel Carrasco Y. Reyes) 列席

加爾特爾君。(M. Edward C. Carter)

柯波拉君。(M. Francesco Coppola)

席比紹夫斯基君。(M. Zigmunt Gychowski)

杜納第君。(M. Donato Donati)

愛森曼君。(M. Louis Eisenmann)

斐拉里君。(M. Giannino Ferrari)

斐里君。(M. Carlo Emilio Ferri)

加拉夫雷西君。(M. Giuseppe Gallavresi)

蓋奔君。(M. Edwin F. Gay)

紀德爾君。(M. Gilbert Gidel)

糾里亞諾君。(M. Michele Giuliano)

- 根因君。(M. Selskar M. Gunn)列席
- 哈斯君。(M. Wilhelm Haas)
- 郝愛茲希君。(M. Otto Hoetzsch)
- 雅克君。(M. Ernst Jackh)
- 詹納康因君。(M. Pasquale Jannaconne)
- 姚欽君。(M. V. Joachim)
- 岳柯斯君。(M. Louis Joxe)
- 克爾夏格爾君。(M. Richard Kerschagl)
- 荊霍爾君。(M. Stephen King-Hall)
- 柯勒芬君。(M. Egon Van Kleffens)
- 馬德家祿君。(M. Virgile Madgearu)
- 滿寧君。(M. C. A. W. Manning)
- 滿都君。(M. Paul Mantoux)

摩爾達拉君。(M. Giorgio Mortara)

裴德爾森君。(M. Jørgen Pedersen)

李格體君。(M. Giuseppe Righetti)

邵特威爾君。(M. James T. Shotwell)列席

蘇爾米君。(M. Arrigo Solmi)

施巴文達君。(M. Renato Spaventa)

斯特法尼君。(M. Alberto de Stefani)

陶恩畢君。(M. Arnold J. Toynbee)

維克爾斯君。(M. O. G. Vickers)

勿爾斐爾斯君。(M. Arnold Wolfers)

齊梅恩夫人。(Mme Alfred Zimmer)

齊梅恩君。(M. Alfred Zimmer)

代表國聯文化合作組織者有日內瓦國聯祕書：

杜富爾斐農斯君。(M. A. Dufour-Feronce)

孟德納霍君。(M. J. D. de Montenach)

庫爾曼君。(M. G. G. Kullmann)

巴黎國際文化合作社代表：

鮑奈君。(M. Henri Bonnet)

派特君。(M. Werner Picht)

萊特君。(M. F. Chalmers Wright)

註(一)參看二九五——三〇五頁。

國家與經濟生活

參加會議人員名錄

本會議研究大綱

國家與經濟生活，——特從國際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上觀察。

第一部分。

就事實作歷史的觀察而敘述之：

(一) 國家干涉之有直接影響於他國者：

(甲) 侵犯國際商業之種種方略：

國家對國內及對國際採取種種方略而以下列數事爲其重要目的者。

(a) 佔有國外銷場。(如對於輸出者給獎貸款等等)。

(b) 保護國內銷場。(如高築關稅壁壘特設優待稅率嚴行互惠制度宣傳

抵制外貨等等)。

(乙) 侵犯國際金融之種種方略：

1. 國家對國內及對國際採用種種方略而以影響資本之趨向爲目的者，

例如：(a) 對投資國外及應募外債之監督與節制，(b) 與國際公私債權債務有

關之種種方略。

2. 國家對國內及國際採用種種方略而以影響於國外匯兌率爲目的者，例如對國內貨幣施行膨脹或緊縮政策等等。

(丙) 侵犯國際上人民移徙之種種方略，如本國人民出境之限制及客籍人民入境之限制。

(二) 國家在私經濟上之干涉有影響於國際之經濟生活者：

(甲) 國家之鼓勵與補助。

(乙) 國家之監督與節制。

(丙) 國家直接舉辦。(如國有私產)。

第二部分。

就第一部分所指出之方略而研究其理由與動機。例如：經濟的及社會的理論，國民生活水準的維持，政治上的利益，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對抗，社會結構的變更。

第三部分。

就第一部分所指出之方略而考察其作用：

(甲)在國際經濟關係上之作用。

(乙)在政治生活上之作用

附註：

提綱委員會曾提議過在一九三二年討論之範圍，應以第一部分內(甲)項下所指之方略的事實理由動機及作用爲限，即屬於國際貿易者。但此種界限，不能排斥第一部分內(乙)項下一切干涉方略的考察，即關於金融貨幣者。更不能排斥第一部分內(丙)項的考察，因爲此項也當認爲與國際貿易不無關係者。

各國內的研究團體均受通告，應把本國內所採種種與國際貿易接觸的方略，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以來所採的方略，並把別國所採用而本國受其重大影響的種種方略，作一原原本本的研究書，送繳本會議。這種

研究書，須包括一種簡要的敘述，把由施行第一部分內所指種種方略所造成的局面，表現出來。

原序

此冊內容，係一九三二年在米蘭 (Milan) 所開之國際會議的情形一本報告書，所研究的問題，是國際上經濟與政治之間及現代國家與經濟生活之間的種種關係。本會議在進行中間，對於現代生活所發生的國際經濟問題及國際政治問題，曾適用我們在本序中要說明的新研究方法。

這樣博大的題目，當時只能作一種部分的而且粗淺的考察。許多新會議，還要依次地繼開。在一九三三年應開的下屆會議中，再把本年已開端的研究工作，繼續推進。本書不過是若干冊中之第一冊，若到完滿時期，便可表示由米蘭會議中建設的新研究方法，對科學有無積極的貢獻，對國際關係科學的研究，曾否作有效的發展。要知這些會議，對於國際問題的研究，其最良效果，究竟可期望達到若何程度，讀以下數頁，自可推想。

我們現在應該對讀者，尤其是對留心國際關係的學者，把這種國際會議的緣起，把這種研究方法重要的特質，把米蘭會議的組織，末了，把下屆

會議的籌備，作導言式的說明。

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會議。

國際文化合作社，追逐着在許多國內已經鼓舞起來的熱力，為的是在研究國際問題的種種團體之間，完成一種調諧的組合，乃於一九二八年，在柏林的德國高等政治學校，組織了一種專家會議，其任務就是尋求在國際上要美滿完成這種調諧組合的可能性。當時德美英奧法意各國的團體，及四個國際組織的團體，都有代表參加。他們擬就了切實合作的計畫。聲明要憑藉國際文化合作社的助力，並決定次年開第二屆會議。

這就是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會議如何產生的情形。從那時起，每年集會一次，一九二九年集會於倫敦，一九三〇年集會於巴黎，一九三一年集會於哥本哈根，今年乃集會於米蘭。許多他國的團體，也加入了本會議，如斯干地納維亞諸邦，丹麥，波蘭，魯馬尼亞，捷克斯拉夫，都有團體加入。此外如澳大利，中國，西班牙，匈牙利，日本，紐西蘭各國的團體，

現正在預備一致加入。註(二)

直到第四次哥本哈根的年會，本會議總是注重在調諧組合方法的發展。此種方法，乃一九二八年柏林會議所規定。柏林會議，一方面預示本會議各分子團體間的講演員交換，消息互通，出版物互贈，研究大綱互相報告，參考書籍互相傳閱等等，一方面擬藉國際文化合作社的技術助力，共同編製關於國際問題的消息索引，例如一九三一年由國際文化合作社出版的政治文件總匯之國際索引，又如正在編製之政治辭典。本會議於此種實施的成績外，還有一件最有用的功勞，就是對於許多國別中專攻國際問題的教授，給以每年相聚一次的機會，使得討論他們公共利益的問題。再則本會議又造成了一種調諧組合的國內委員會，使各國國內凡致力於國際問題之研究及講授的種種團體，互相聯絡，成一協作的組織。所以一國內假使有多數此種團體，則直接向本會議派遣代表的機關，不是各團體而是各團體組合的委員會。於是本會議於其特殊的國際任務而外，又在各國內部舉

凡致力於國際問題的種種團體之間，完成了一種調諧組合的工作，這種工作，尤爲有效。

註（一）：人們在世界文化合作社出版的一本索引內，可以看見凡在本會議派有代表之各團體的名目表及與各團體有關的消息。閱者可檢索引內『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巴黎，一九二九』一條即得。這本索引，曾經補充，並在一種油印的文件上發表，該文件目次爲C. I. 一九三二，亦係該社編製。

共同討論及搜求。

當第三次會議告終時，本會議的大綱，多半業已實現，實際合作的方法，已經規定，此時只有在鞏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些方法，大半已成了自動運行的了，只任憑本會議的執行委員會及國際文化合作社負責照應就行了，既然如此，則繼續着每年召集一次大會，討論無多的問題，未免有多此一舉之嫌。

但在一九三〇年間，本會議已開始向比較普遍問題的研究方面推進。一

九三一年一月，本會議執行委員會主席柏維利吉君 (Beveridge) 曾代表英國國際研究合組委員會提出建議，這個建議，受了執行委員會同仁的贊成。建議的目標，是把本會議的工作向特定的國際問題之研究方面推進。既然具有一種組織，每年有許多日子，把各國最著名的學者教授聚於一堂，給他們一個不受拘束的講壇，使他們得坦然發表其意見，爲什麼不利用本會議逐漸造成的這個機構，給這些專門家一個機會，使他們各人把自己在本國研究的題目，提出來作共同的探討，再看各人藉着本國國民在藝術科學上由傳統的成就所發的光明，究竟得到若何結論呢？試問一種探討，由各國學人共同努力，使各人不同的思想，各國民特殊的理解，互相接觸，安得不成一種寶貴的比較研究，在探討的問題上，放射出新鮮的光明嗎？即文化合作的目的，不就是讓諸位學者互相接觸，藉以熟悉異國同仁廣有特殊發現和方法嗎？

本會議執行委員會，當時決定把這個建議，提交於次期的大會。次期的

會議，當一九三一年在哥本哈根開幕後，就採納了這個建議，並議決「一種限定的國際問題之討論，當屬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各團體對於本會議應擔任的通常工作之一部，且欲達到此目的，更須組織特別研究會議。」一種範圍狹小的委員會，即提綱委員會，因之設立，擔任對於下列的題目，擬出詳悉討論的綱領。題目由教授齊梅恩提出，即

『經濟與政治之關係』。

先把國家置於一方，再把個人及私人組織置於對方，然後就經濟範圍內的國際方面，觀察他們兩間的關係，尤其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新方式，監督經濟的新方式，國內的和國際的，直接的和間接的，總之，都是由歐戰時發展起來的，再搜求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所以演變到如此情況的理由及動機。

凡在本會議有代表的團體，均被邀請對於本題作成報告草案或研究書，送交提綱委員會，並應根據提綱委員會所建立的工作基礎，對於選定的題

目，在次期會議的討論中，作詳細的研究。

提綱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二月開會時，曾接到由德美英丹法意捷克諸國各團體送來連篇累牘的啓示和指點。提綱委員會先把這些備忘錄審慎地分析了一番，於是決定了一種研究大綱，其條文註（一）見後。當提綱委員會與本會議執行委員會開聯席會議的中間，又決議一面請各團體於次期的會議中加派專門委員，一面又進行二三總報告員的選任。該會又發願，須使一切備繳會議的報告書，由共同研究的團體編製，勿由個人編製。它又勸告，凡代表一國的團體，須與代表他國的團體就大綱劃定的範圍內，研究一樣的問題，俾在次期會議中，由國際的集合，能作一種各國報告書的比較研究。

註（一）參看一——四頁。

米蘭會議。

國際關係科學研究會議，永遠認作他的一種重要任務，就是讓一國著名

的學者與他國著名的學者得晤對的機會，彼此得熟悉他國各學派習用的研究方法。此種接觸，在各種科學上極爲可貴，自不待言，現在差不多成了留心國際問題者斷不可少的機會，良由此種探討的性質使然。所以本會議爲使這種方法，得到更大的效率，乃在初次開會的期間，提出一個原則，即在可能範圍內，在經費所許的限度內，務使年年的例會，在不同的國家內，擇定一個地點舉行。直到現在，這個原則，還能毅繼續遵守，前面已追述過本會議曾在德英法丹次第開過四回。這種年年轉徙的會議，致需費有加無已，多藉作主邀請的團體，予以贊助。我們在此，特別感覺愉快而致謝的，就是意大利的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多虧它的博大惠助，使我們今歲適於本會議範圍擴大之時，得開幕於意大利，再則，這本書的出版，也多賴意大利委員會的慨助。

第五屆的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會議，於是在米蘭開幕，由意大利司法部長兼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主席羅誥教授擔任主席。意大利當局曾

以加斯德祿斯弗采斯科 (Castello Sforzesco) 大廈，交給本會議以備應用，一切都安置妥帖，以保障本會議的成功，以利便各會員工作的進行。米蘭省及米蘭市的執政，加斯德祿斯弗采斯科的總管及其僚屬，還有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祕書長李格體君 (M. Ginsgpe Righetti) 及其屬員，都不憚辛勞，務保障本會議的成功，並對本會議中各代表及國際文化合作社的人員，供給可能範圍內所有的一切利便。

凡參加本會議的人員，更忘不了米蘭的東道主種種懇熱招待的舉動，使他們益感覺旅況的愉快。他們曾受米蘭市長莫德龍公爵 (Duc Marcello Visconti di Modrone) 的招待，又受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的招待，皇族公爵柏爾加謨 (Duc de Bergame) 曾邀本會議各成員作公園雅集，米蘭的王國大學，亦對他們表示歡迎，這些優禮，對於本會議的成功，一定都有助力。意大利當局，又組織了一個博羅美諸島 (Iles Boronées) 的旅行，成績最大。意大利交通部長及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更有表示優待的

一節，凡參加本會議的人員，都得到意大利的火車免票。
步驟及方法。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爲本屆會議開幕之日，其詳情誌於後幅。註(一)接連五次都是專討論這個選定的題目『國家與經濟生活』。第六次卽最後一幕，於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告終。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作博羅美諸島竟日之遊。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本會議提綱委員會開會決定下屆會議討論的問題，又對於下屆會議應收的文件，規定編製的步驟，下屆會議，預定在一九三三年內舉行。

註(一)參看一——六頁。

依提綱委員會的勸告，本會議的成員，於舉行會議之前，收得種種報告書及備忘錄，(大半載在本冊後幅)係德英奧丹法意魯捷各國的團體編製的。本會議的成員，研究此項文件時，感覺得極濃厚的興趣，這可以米蘭會議中間的討論證明。大部分的討論，都是由這些文件中的主張啓誘出來

的。至於這些貢獻的重要性，則有種種形式的差異，這也是在所不免的，如提出問題，各有各的方法，所考究的問題，亦各有各的底蘊。將來各團體若能對於在下屆會議應擔的種種貢獻中，努力維持一定的平衡，自然是本會議所深願的。但他們對於下屆會議的準備，當有較長的時間，可以處分。並且讀者在後面可以看見，還有特別條文，囑各團體對於本會議目標的解釋，務須歸於一致。

討論由柏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博恩先生 (Professeur M. J. Bonn) 開端，在他的導言中，他提出許多問題，都可認作本會議將來工作的基礎。倫敦大學的鐸爾東博士 (Docteur Hugh Dalton) 曾被邀請把所有的備忘錄及報告書，於預先研究之後，作一種分析，對本會議說出其中重要的意思，於是他繼博恩教授而發言，他的話也就像博恩教授的話，開了一條路徑，更可說是限定了隨後的辯論。他說到終結時，也是列舉了許多具體的問題，請本會議挪出一部分的時間，立即討論。

當着會席，立時提出若干問題，要在目前繼起的辯論中，激出答覆來，這種方法，得了大多數出席員的贊同。人們可以推想，這種步驟，將來很能發展起來，並能生出效果。人們在當時討論的記錄內，可以看見席間臨時的插言，不止一次，可都不是爲發揮他們備忘錄中所指的事實及所持的議論，其未曾預繳報告書者，也不是爲當着會議，陳說大多數國內的主張，却都是爲直接答覆臨時提出的問題。再則若把會議錄前後細加檢閱，可以看出許多人的演說，都是由不多時以前某某所發表的主張引起的反應。在實際上，整個的討論，並不因插言的紛歧而失其一貫的性質。

討論的始末，由總報告員博恩教授及鐸爾東博士撮述概略。要知第一次國際會議研究『國家與經濟生活』的結果，就請讀者看總報告員的結論。我們須反覆聲明總報告員職責之重要，他們在本會議，不是作某某團體的傳言者，尤其不是作他們祖國的代表，他們只是獨立不羈的專門學者，正如鐸爾東博士自己說的『超出國民的評論者』。記錄上顯然示出這回議席

上自始至終有一種聯絡與團結的精神，這却多虧總報告員在開議時及撮述時所持的態度。

在第四次會議席上，（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對於米蘭會議所創建之國際問題研究的新方法，有一番重要的辯論，可是這種辯論，出乎本會議研究的題目『國家與經濟生活』之範圍以外，我們覺得在敘中提說幾句，比在這本書的正文中夾敘，較為適當。

曾經辯論者有兩大問題，將限定一研究的題目，或剖析一題為幾方面，請各團體各擔任一方面的觀察呢？其次若任各團體對於所擔任的工作，私自研究，私相討論，自由撰述，是否比較在下次會議中專從一切繳到的報告書中考察成績，其結果更佳呢？在這個紛紜辯論中，邵特威爾教授（Professor James T. Shotwell）根據幾種理由，認為本會議所採的方法較好，他以為這種辯論的紛糾情狀，是本題的自然性質使然，他說『假使我們取一個問題如關稅問題，把它拘束在一種單純的辯論方式內，那就要使我們

科學的步驟，異常的虛偽，我們須先明白各國民的見解是不同的。』邵特威爾教授更有幾層說明，足爲米蘭會議所創設的方法，作有力的擁護，他說：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要採取表決通過的方式，不要力求達到全體一致的結論。我們把所有的備忘錄及種種的主張，分析起來，與我們自己的經驗相對證，這是一種必要的方法，假使我們要想進步的話。在嘵嘵辯論的中間，人們或以爲我們辯論愈多，進步愈少，因爲我們並不向結論上走去。在實際上，假使人們力求某種意志的成立，——就像那國際商會會議一樣，——當你徵求大眾同意的時候，眼看着某種意志的表示，漸漸地薄弱化以至於毫無意義，這種方法，逼迫得各個發言人都發揮他們個人的主張，並極力聳動別人俾與自己站在一個觀點，本會議若採取這種步驟，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本會議總須能產出效果纔好，像我們這種會議裏提出的一個問題，決非僅供

席上臨時的辯論，一旦閉幕，就可置之腦後的。萬一如此，則這種會議，只可當作我們科學工作之間一時適意的消遣罷了。我們回到國內，還須督促我們的團體，藉那從國際的獎激和批評添來的助力，推進我們已着手的工作。

以歷史家的資格，我再說一句樂觀的話，不過這話從歷史家的口中出來，却倒有一點稀奇，我們目前所過渡的這種變動時期，這種恐慌現象，就已往的歷史說來，畢竟算不了多大的事體。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改革的中途，這個改革的重要性，我們無法估量，我以為這個改革，就是以科學適用於物質生活的結果。若是要人類與環境相適應，我們應當乞靈於過去的教訓，也像我們乞靈於人類的智慧一樣，以期尋出戰勝恐慌的途徑，這就是我認為本會議的真正目標。』

下屆的研究會議。

差不多一切演說者，在他們的演說中間，都有精確的問題提出。這些問

題，可以留在下屆『國家與經濟生活』的會議中作有效的探討。這些提議，曾經送交提綱委員會，於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開會審查。讀者在本書之末的『附錄』註(一)中，可以看見提綱委員會貢獻的意見，其目的是對於特別選出的幾個題目，引起一種有體系的研究，並務使下屆會議，搞得到一種有方法而又合科學的辯論。在來年的進程中，凡本會議的成員團體，彼此應常常互通消息，把自己工作進行的情形，互相報告。國際文化合作社當任其間聯絡的媒介。還有一個建議，就是邀請一位專家，以特別報告委員的名義，參加會議，他須親赴各團體所在地，調整他們的活動，並根據他從各團體方面所得的消息，在下屆會議議程表的最後決定時，作重要的贊助。末了，更擬選請幾位專家，爲的是一面襄助國際文化合作社工作的進行，一面審查特別報告委員的結論。

註(一)參看三〇五——三〇九頁。

結論。

在本序的開端，我們已說過米蘭會議創設了一個研究國際問題的新方法，現在可以把這種方法的特質，用數語撮其要領，並指出它與以前所適用的方法之異點。第一點，就是對於選定的一個國際問題，由各國國內的團體擔任起來，作同時協進的研究，這些團體內的成員，實兼思想家及實行家而有之。第二點，就是在國聯指導之下的一種國際集團裏，要把各團體在本國內研究的結果，作一比較的研究。第三點，就是要努力發現意見離合之點，却不是爲達到一種決議，不是用投票式以揭出本會議大多數的主張，而是要在可能範圍內尋出全體一致的意見。這種意見，即不能得到迅速而公開的實施，但至少可以轉移那些以國際關係爲職責者的意志，使他們改變政策以求與此種客觀無私之研究的結果相調諧。就是這幾種因素的結合，給這個國際問題研究之新方法以新穎而特殊的性質，在下屆討論『國家與經濟生活』之國際研究會議中，此種新穎而特殊的性質，當更得充分的發揮。

國家與經濟生活

原序

演說與討論

目次

頁數

(一)緣起.....一

(二)參加會議人員名錄.....一至五

(三)本會議研究大綱.....一至四

(四)原序.....一至一七

(五)演說與討論.....一至一九九

會議開幕——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一至六

第一次研究會議——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六至三七

第二次研究會議——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七至九七

第三次研究會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七至一三九

第四次研究會議——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一三九至一六九

第五次研究會議——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一六九至一九九

(六)各國研究團體送繳本會議之備忘錄.....二〇一至二九四

德國備忘錄	二〇一至二二〇
奧國備忘錄	二二〇至二二八
丹麥備忘錄	二二八至二四四
法國備忘錄	二四四至二六四
英國備忘錄	二六四至二六七
意大利備忘錄	二六七至二七一
魯馬尼亞備忘錄	二七一至二八七
捷克斯拉夫備忘錄	二八七至二九四
(七)附錄	二九五至三〇八
參加本會議人員及其所代表之團體一覽	二九五至三〇五
擬定一九三三年會議研究大綱	三〇五至三〇八

演說與討論

會議開幕，——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九點半鐘開幕，羅誥先生 (M. Alfred Rocco) 主席。

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第五屆會議，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由意大利司法部長兼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委員長主席，宣告開幕，典禮在加斯德祿斯弗采斯科大廈舉行，參加者有柏爾加穆公爵，(S. A. R. le Duc de Bergame) 米蘭省及米蘭市的當局，及米蘭高級社會的代表。

主席致開會詞：——隨同主席者有米蘭市長莫德龍公爵，省長福爾納西亞里，(M. Bruno Fornaciari) 法西斯蒂國民黨黨聯秘書布魯薩，(M. Erminio Brusa) 巴黎大學教授法國高等國際研究協作委員會秘書愛森曼，(M. Louis Eisenmann) 國聯副秘書長杜富爾斐龍斯，(M. A. Dufour-Feronce) 及國際文化合作社主任鮑奈。(M. Henri Bonnet)

諸位皇親！諸位名公巨卿！諸位女士！諸位先生！現代的國際生活，以歷史上最駭人的一種矛盾現象，獻給我們。關於民族相互的友愛，關於國際間諒解協作的談說，也許從來尙無如今日之盛，其目的或在建立民族間即非永遠而尙可經久的和平基礎，或在使各方面的努力，同時結合爲一，一齊奔轍着世界文化的進步。

但是從來國際文化合作，未有難於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者。我們不要忘了現代的時期，是國民思想發展的時期，這就是說，不僅在政治方面，各國民各有其特殊之點，即在文化方面亦然。

由往昔直到十八世紀，智識的生活，是歐羅巴的，換句話說，是世界的。拉丁文在那時期，是科學思想唯一的媒介，各國對於他國科學探討的結果，毫無難色地接受，今日的情形，已大相懸殊了，文化日甚一日地國民化了，智識的生活，日甚一日地被政治疆界隔閡了。

無論交通如何迅速，一國的新發明，他國歷久不得而知。彼此既不相謀

，於是一種方法，往往在不同的國內，却經過幾次的探討，幾次的發明。有的國內，只有在本國發表的科學成績，是國人所知道所引用的。不同國籍的學者，彼此相知相見的機會，比較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少得多了。

當政治家一面努力於整理紛歧的政策，努力於組織世界，而所得之結果，乃不足觀，而智識中人，乃一面沉靜地工作起來，從文化方面，聯合不同的民族，恢復那百餘年來已經破壞之科學的藝術的文學的統一生活，這就是國聯文化合作委員會，及其執行機關巴黎研究院，與作日內瓦的組織和各國內諸團體之聯絡中心的國民委員會，所擔任的工作。

文化合作的需要，有一個最急切的地方，就是國際關係科學研究的領域。這種研究，舉法律經濟政治皆在其對象之列。此中的國際性，再沒有比較更深切的，可是真有似乎矛盾者，有時要與各國內研究國際問題的團體相接觸，要向他們探聽在所必需的消息，却是很難的事。這種困難，一部分固由於此種研究的性質，因為此種研究，與國民情感及國民利害有密切

的關係，但是也由於這些團體，在他們本國度其孤立的生活。

自一九二八年國際文化合作社提出聯絡各國研究國際關係的團體一個問題，第一會議，即於一九二八年舉行於柏林，接着又於一九二九年再會於倫敦，一九三〇年再會於巴黎，一九三一年再會於哥本哈根。各團體在本國內，已有集中的組織。

結果超出我們的望外，當各團體的代表初次相見於一堂，雖語言不同，思想不同，方法不同，但其所從事考察的問題則無異。他們感覺到共同的利益，由共同的研究而出，而共同的利益，即拉攏他們彼此接近的原動力，他們又看出有許多項的工作，非數國密切互助不為功，同時還有他項的工作，由一國完成為較易。他們還要求即於是年內再開會議。

自第一會議迄今四年，這種協作精神越長進了。一種交換講演交換書籍的方法，業已成立，消息索引，業已出版，編製政治辭典之計畫，業已就緒。

今天的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會議，真是一個世界的組織。參加者有大國，有小國，北美合衆國與焉，即荷諾盧盧（Honolulu）的和平關係社亦與焉，英德法代表俱集於此，意大利的『國民中心』，在我的聲望卓著的同寅焦萬宜蔣蒂爾主席領導之下，維持本會議與意大利國內許多團體間之聯絡。茲將意大利各團體之目，列舉如下，弗羅凌斯（Florence）社會科學研究院，皮色，（Pise）團體法規美備研究專門學校，米蘭政治科學學校，巴度（Padoue）政治社會科學學校，巴維也（Pavie）大學政治科學院，貝魯斯（Pérouse）大學法西斯蒂政治科學院，羅馬大學政治科學院。

多謝米蘭市長莫德龍公爵米蘭省長馬達羅尼君（M. Mataloni）及米蘭各團體之惠助，此第五屆會議，乃得舉行於米蘭。本屆會議，乃會議程途上極重要之一階段。

本會議已順利地完成了聯絡及調諧的工作，在米蘭會議中，正要着手一種更需勇氣的任務，就是挾絕大的自由，以純粹客觀的科學的精神，把關

於人羣政治經濟生活的根本問題提出。

一個概括的討論題目，業已選定，作第一次的試驗，就是『國家干涉經濟生活』。這是一個極切近的問題，尤其是就它在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上的影響說來。

如此，文化合作，便從許多努力的簡單協進，變成一個共同的努力。

共同努力作真理的探討，這就是國際合作中極尊貴極崇高極大公無私的模範。

米蘭市長國聯副祕書長國際文化合作社主任，都有演說。愛森曼君又代表本會議衆委員致辭。

開幕典禮，於十點二十分鐘告終，衆委員齊集於聊納度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廳，準備開本屆第一次研究會議。

第一次研究會議，——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點鐘開會，羅誥教授主席。

主席於開會之始，先請本會議組織主席團，（註一）乃致辭如左：

我先請博恩先生發表一引言式的報告，再請鐸爾東先生把本會各成員團體繳到的『國家與經濟生活』之報告書，作一提要的分析，這些講演告終以後，就是說，在下午開會的時候，同仁中誰有意見要申，就請誰發言。只因發表的意見裏少不了附帶着種種問題，發言人若能把提出的問題，用書面發表，俾衆人得以閱覽，主席團當然要感謝的。

註（一）參看三〇六——三〇七頁

報告書引言

博恩教授發言：

本人以爲就一個意大利城市中『國家與經濟的關係』，作爲討論的起點，是最適合的，因爲可以博得利益的唯一手段，就是步武一個曾創造政治新科學的意大利偉人——馬夏維里（Machiavel）——之後塵。他曾說，『談到政府，莫有別的對象，就是要問應該怎樣纔算是政府唯一的遵循之

路，就是把政府照政府的本來面目表現出來。』

若由哲學的理路，在這裏開始一場辯論，說什麼是國家的職權，什麼不是國家的職權，這種辯論，不見得怎麼奇特，又不免顯得冗長。多半的這種議論，曾經用過了再用，現在仍可以用過了再用，將來仍免不了用過了再用。本人不願從事於此，但願指出幾種事實。本人覺得最要緊的事實，就是政府行動之範圍，在經濟上已非常地擴大，我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本人以為擴大的原因，在新構的理想方面，不如其在困難的事實方面之多。說到底，總有一條路永遠避不了政府的干涉，即在今日已為理想所不許也罷，政府永遠須得生存，它須對於它生存的方法，付以代價，這就是說，向納稅者取錢。這個理由，從來不能使政府的干涉，博得人民的歡迎，但這却是領導政府干涉一個最有力量的動機。

政府這樣的干涉，近來始非常擴大。本人記得三十年前，普魯士人對於所得稅的標準，曾有一場爭論，爾時凡有十萬馬克收入以上之人民，須納

百分之四比率之所得稅，有少數態度激烈而主張澈底者，竟欲對十萬以上馬克之收入，提高比率至百分之五，他們失敗了。因爲在那時期，衆人認他們的提議，是社會主義者的主張，不幸的事，我們把那輕鬆的百分五比率的稅額，——即所謂社會主義式的稅額，——早已超過了。我們從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並且有的地方，直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了，這就是國家干涉的程度，在過去的時代，誰也夢想不到的。可是這樣的干涉，絲毫不是以經濟爲前提的，大半由於交戰各國，沒有早計算到，一個戰爭，在財政經濟的觀點上，並不是能取得酬償的事業，倒是各國現在還須爲戰爭酬償，於是干涉到經濟上來了。

在財政的領域內，只有兩個方法，可以辦此，或是政府把它的手伸在人民的腰包裏，或是政府另設法自賺收入，在十四世紀，就有一個意大利財政著作家說過，君主最富足之府庫，便是人民的腰包，政府從來就是按照這個原則舉動，但是近來却由別一條道上，得到與國民收入相助爲用的一

種方法，政府由納稅者取得的錢，若仍不敷用時，它就要仗它自己各種的企業，彌補其缺。這種辦法，仍與普通的社會原則及革新的理想，是毫不相涉的。這是一個應用政策的問題，假使你招惹出許多的積欠，非清不可，假使你指徵收的賦稅及發行公債所得之利益尙不能夠償還的話。

政府用這種方法恣其干涉的程度，也是自來聞所未聞的。大戰中各國締結的債務，使人不容疑問地推想，應該總有擔任付息的人。這些債務，使各國政府顛仆在國民資本的基金上。從來任何種社會改革所生之壓力，無如此之重者，在一個時期內，似乎政府把所有貸款於己的債主，都認爲是國家的股東，但是在許多情形之下，他們的股票，只給了他們一個破財的機會，却不是一個分潤的權利。因爲差不多所有的國家，都不免走入通貨膨脹的路上。政府干涉所用的一切方式，就吾人所知者言之，最殘酷的莫如於無意中用通貨膨脹的手段，把人民的動產收沒。我們儘着說俄羅斯的革命，不知我們西方經濟界的真正社會革命，就是通貨膨脹引起的革命，

我們現在還看不見它的底止。

政府這麼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却自己還沒想到這叫干涉。他們借過錢，他們沒有償還。他們這樣作去，同時便把一切債權人與債務人兩間的關係，從新地調換安排，其變動的範圍之大，為從來所未聞。可是到底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有許多人民還情願深入於新式的通貨膨脹之途呢？這並不是他們深究過貨幣學的理論，他們對於貨幣論『除是希望由此能得一點利益，即感不到絲毫興味的，因為通貨膨脹能使他們容易解脫自身的債務，所以他們贊成。這又是一種政府干涉的例子，其實這種干涉法，與國家的理論，亦沒有很大的關係，但在實行上，却是不幸的必要所尋獲的出路。

有的政府，在財政上常用着忠厚老實的手段，但也是免不了干涉，利率在今日比戰前很高，因為政府借款多糜費亦多，致人人資金缺乏，發行公債與提高利率，其義一也。

且不說財政方面，我們看看商業政策方面，政府的干涉，也有日甚一日的現象。其積極干涉的原因，不盡在保護派理論的復活。現在各國固然都實行了保護政策，可是理論方面的保護主義者，現在實無幾人，膽敢宣傳保護主義的信仰者尤其寥寥。本人並不是說保護主義者已失去了他們對於保護的信仰，但他們却頗替保護道歉。保護的復活，實出於政治上種種原因，許多民族，受着安全不保的恐嚇，歐戰已分明揭出一件事實，就是各國未有恃水陸軍備完全斷絕輸入之外貨而能自立於安全之地者，他們能用潛艇，封鎖，飛機，阻遏饑饉之侵入，可是他們無以自救於餓斃。人們思索得十分清楚，假設他們不能依靠海上的自由，不能依靠戰時不斷的交通，他們就須組織出他們的經濟體系來。或者他們須採取一種體系，讓他們在戰時彼此有無互通，與在平時無異，或者他們須設法自脫於戰爭的危險，或者他們須舉辦可以自己自足的事業。

拿破崙之戰，產出第一個國家自給自足的大策略來，我們今日把它再度

演出，這也是極其天然的。但是其間有一個異點，我們曉得現在大半數的國家，不能完成這個策略，雖然如此，他們却竭蹶而行，假設世界上的天然富源，平均爲各國所分據，這種策略，便是分明合理的，但事實却不如，天然對於他們偏枯之物，他們却要勉強用人工產生替代品以補救之，這種策略的結果，就是在一時期內，國際商業漸漸迫近於停頓狀況。

政府這種干涉，出於自由決定者甚少，多半是迫於必要，本人敢說，實在願意控制國外貿易的政府，沒有幾個，大多數的政府，因爲政治的情況造成經濟的需要，驅策他們實行干涉，而這種干涉，與他們對於政府權限適當的範圍之觀念，亦無大關係。干涉在實行上所達之程度，超過當日預計之程度遠甚，假使政治的情況，還容它繼續着再進稍久，則許多的國家，其間國際的經濟關係，就得停頓。

我們只有兩個辦法是可能的，或者我們可以聲明『我們在這種干涉之下，不能再繼續生活了，我們要走還於國際的相互依賴，倚仗着平衡而循序

的國外貿易，政府不得妨礙。』這是經濟方面一種合理的政策，然而十有九是行不去的，就是因爲適爲現在政治的立場所不容。或者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割斷你們彼此的一切關係，靠着你的自身，憑你自己的生產生活。』在政治觀點上，這是十分安穩的，——除過你有餓斃之虞。多半的民族，經濟上是辦不到的。

在政治的立場上，政府並不是爲恣其干涉的意欲而干涉，乃是因不幸而負着解決恐慌的責任，雖明知這種干涉，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法，但不能因沒有找到較好的方法，就不勉強去幹。

這些情形，也未嘗不可說是暫時的，我希望如此，但即使這種情形的本身是暫時的，他們的結果，定然不是暫時的，我們在戰爭初息時，就看見一個例證，在戰爭期間，大半的交戰國內，有一種新潮，漸漸高漲，名曰『戰時的社會主義』。這個主義的成功，並沒延及戰後，但是它的生命，却很頑強，它永沒被人剷除淨盡。一種機構，雖爲一時的使用而設，但一

經造成，這機構便有它自身的生命，即遇有力的要求，非消滅它不可，它也是不會停止的。

再說，還有幾種力量，就是爲協助干涉而活動着。在經濟與國家的關係中，曾發生一大變化，昔時人民，大抵視政府如讎敵然，如以斂人民之財剝人民之力爲職志者然，他們與政府常作猛烈的決鬥，干涉的義意，他們認爲就是使納稅者出錢，供治人階級爲謀自身利益之用，而採取一種以政府爲前提的方式而已。自現代的民主主義出現，這種情況，乃完全一變，政府與人民中間的決鬥形勢，已化除了，他們雙方的關係，現在被一種與前相反的觀念統治着，政府不是致人民於窮困的主動者，它是能致人民於富足的權力，政府的職務，是分配國民的收入，其手段如提高貨物之價格以利生產者，又如低減生活費以利一般人民。美國人嘗自矜發現一種經濟方式，足使政府盡此項職務，俱屬可能，但在世界他國，未會有相當之成功。

現代的經濟理論，在原始是以自由競爭之體系的存在爲前提（除土地原來是一種獨占品，附帶着獨占的價格，這種價格的變動，按照着他們固有的原則。）除過這種例外，生產與消費，完全被自由競爭的體系維持一種平衡狀態。此種事態。已不復存在了，因許多新地的墾殖，土地已不成獨占品了，但種種的獨占事業，到處發榮滋長，初則發生於運輸事業，繼則蔓延於各種實業。凡獨占事業盤踞之處，供求不復受自由競爭力之調劑。獨占無人過問，自由競爭亦無人過問，兩者所得之結果，實在却大不相同。假使獨占不受政府的控制，則獨占不但要反來控制政府，且不難控制全國國民的經濟生活。

這是第二種變化，尙在方興未艾。同時與此變化並行者，有另一種發展，即私有財富之龐大，其形式不一，而往往與無名之大公司結成一體，致財富之主人翁據有曩時所不能有之權力。在十九世紀之前半期，一個通常的製造家，即使富饒，並不算國內的什麼權力，但自獨占事業日漸強大，

財富與生產，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造成個人雄厚的利益，足使國家被其影響。

還有第四個變化，妨礙自然的發展，就許多方面看來，政府的建設，與私人大規模的營業，在今日很少分別。私人的營業，有官樣的標準，有公務機關的規模，而其標準之高，規模之大，直使昔日流傳『私人營業，富伸縮力，政府建設，無遷就性，』之恆言，不復適用。今日有許多私人營業，表現一種拘守成規毫不遷就的精神，即政府各部，且自愧弗如而不免於健羨，蓋政府各部，在民衆的監督與影響之下，所受之迫脅，較私人營業實遠過之。

我看這種發展，似乎前程還很遠大，似乎我們可努力於許多有用的工作，把每一個國家裏面這種情形，作比較的研究。不是要研究他們的當然，只要研究他們的已然。

澈底地說，這些同樣的團體，在不同的國家裏面工作起來，仍不能一致

，就是用着一樣的名詞，在不同的國家裏面，也是指着大有差別的事實。當我們在日本談『資本主義』的時候，與在美國或德國或法國談『資本主義』，固然用的是一個名詞，——似乎永遠不變，假使你給它一個綽乎有容的定義的話，——但它所表示的，却是大不相同的東西。

不過也有幾種返古的現象。僅在十年以前，全世界上有一種有力的要求，要使一切營業，不許政府干預，大有滿徹斯特學派復興之勢，然此不過一種滑稽的滿徹斯特學派。老滿徹斯特學派極力反對政府的干涉，與他們反對有力階級的獨占地位，是一樣的。現代的滿徹斯特學派，尤其是在德國，則要求予獨占者以自由，他們的目的，是讓工商業家與世界角逐。當賠償問題的爭論期中，各方面已明白表示一種意見，就是只要政府與當局的政治家袖手旁觀，則衆工商業家自然會把這個問題很容易地解決。今日世界所利賴的榮君方案，就是那些獨立營業家的傑作，要解除世界上政府的壓力。（不錯，列國政府已接受了這個方案，他們在上邊蓋了橡皮圖章

，——可以這麼說，——使這一般人士的智計，發生效力。再則，他們要協力組成一個國際清算銀行的重大意義，就是希望着一個偉大的國際財政中樞，不受政府干預，纔能拯救世界。

本人還要說出一件事實，若我們擔任這種的研究，——本人希望如此，——我們還須觀察相反的方面。本人相信，政府是不肯與工商業務脫離關係的，政府營業，固難望事事成功，但私人營業亦不能保有成無敗，政府既加入營業，遂受其束縛而不能自拔，因爲已然發生的情況，使政府非停留在營業裏面不可。今日實在的問題，是政府入了營業的程途，還能走多麼遠？將站在目下所佔的地步呢？還是更要進行呢？說到這裏，仍然是一國與一國不同，以是之故，若對此問題，作比較的國際研究，當有很大的用處。

但是若說政府走入營業了，也要說營業早已侵入政府了。當本人用『營業』二字時，本人之意，並非僅指資本家的營業，實兼包勞動界而言。政

府或受一個職工協會的委員支配，或受一個工業家組合支配，或者農民聯合起來也要左右政府，其實是一樣的。自人民知道政府可利用作一個國民收益的分配者，遵照他們的意欲而行，於是他們都向政治方面進攻。政治這個名詞的原始意義，乃是關於宗教問題或憲法問題的事務，這種意義，在今日大多數的國家裏面，已不復存在了。大多數國家裏面的政黨，都是經濟的團體，帶着政治的徽章，因為這種徽章，在過去的歷史上，是有些意義的。

大多數人民在政治上的活動，就是經濟上的活動。這個例證，眼前就有，即如政府的勢力，能以操縱物價，然而人民還要支配政府，使他用適當的手段，去操縱物價。類此的事態，得步進步，恢而彌廣，引而彌長，馴致今日世界上許多的地方，『公然運動以入選，』『狼狽相依以分利，』都成了政治生活重要的對象。有力的政府，在今日大不易得，一部分就是由於經濟勢力的龐大，因為當政府被用作國民收益的分配者，用其所謂適

當的方法來分配時，它實在被那些彼此不相謀的經濟團體，控馭而行。

我們若就關係各國，把這些紛紜錯雜的關切，作一詳密的研究，也許很有用處。在我們的眼前，醞釀着很嚴重的事態，我們若要估量這些事態的重要性，只須在比較細微的事體裏面，觀察同樣的問題就够了。即如地方自治權，對於公用事業之企業者，往往以租讓之約，畀以特權，此即營業侵入政治一個很顯的例證。企業家若平日好與政客相周旋，要得到這種特權，自然不是難事，並且，既侵入政治領域，要把私人營業的利益，妥帖地保護，更是無上的好機會。因為這個緣故，政治的機械與工商的業務，其間有很密切的關係，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表現出來。

有些糾紛，帶着『移花接木』的現象，在狹小的地方，已不時發生，用不着在國民政府較大的範圍內求實驗的。但是當政府干涉經濟及分配國民收益之權，已公然被承認時，使那些經濟團體，專為自身的利益用其勢力以左右政府，也許對於他們前途的發展，是一種有力的鼓勵。

我們不能用概括的理論，解決這些問題。各國的憲法，各國的歷史，各國今日發生的問題，都是各國國民特殊的天才所生的結果。即使我們有同一的憲法，有同一的經濟狀況，我們藉這些同樣的建設努力工作的效果，仍然不會一致的，何況我們並沒有如此畫一的建設。我們用的方法，是一處與一處不同的。以是之故，我希望我們在此次會議中，把各國這些問題應有之描寫分析批評的種種工作，劃定一個研究範圍。這種研究，將表現出各國政府與經濟關係的變化，將說明這些變化的原因，並將指出這些變化的結果，就是在政治與營業之間更具有最廣意義的一種變化。倘使我們這樣作起，在將來的會議中，繼承本人出席發言的人，比本人現在所處的地位，必多慶幸，他們必不以發表幾句平凡而概括的言論為滿足，他們當能從博大而確實的事實中，得到結論，他們必能從政治方面，供獻指南。至於本人，只能略陳幾點提示的大意，為我們工作開始之一助罷了。

『國家與經濟生活』備忘錄之分析與撮要，註(一)——備忘錄由本會議

中諸成員繳到。

註(一)參看二〇一——二九五頁。

鐸爾東博士發言：

我們來到這裏，是爲討論『國家與經濟生活』。我們好像一夥醫生，圍繞着文化的病榻，或者可以說得更確切一點，我們的本身，也就是一個病院裏有代表病夫資格的同居者，這個病院裏，排着長行的國民病榻。我有一位朋友，聽說我對於『國家與經濟生活』這個問題，要來講話，他表示他的希望，是希望我不要參加這個驗屍的任務。但事實尙不至於如此啊！現在國家的經濟生活，尙沒有完全滅亡，可是若說這些病夫，顯示着血枯，腹枵，心臟衰弱，內部各機關失次，精神頹靡不振，並且有的直至譫語昏狂，種種不寧的症候，這却不算言過其實。

目下的世界，實處在一個悲慘而滑稽的地位。在一方面，一種生產財富的力量之偉大，與種種理論的及實用的科學知識之廣博，皆我們從來所未

曾有。在另一方面，試看利用這些力量及這些知識的手段，顯見得是日甚一日的失敗。一個意大利的飛機隊，在紀律節制之下，能橫過大西洋如飛鷹，澳洲的人，——即或是一個無人作伴的英國婦人，——能獨往獨來的從英國飛到澳洲，又返回英國，所需的鐘點，一天比一天減少。但是這些騰空的男女英雄，俯瞰下界的居民，其成分日有增加的，却是失業的工人，破產的農夫，恐怖的財政家，這些人乃在無事的工廠，停採的煤坑，港口不動的船舶上，及信用凝凍而成爲冰山之陰影下，過着生活。這不是令人相信的景象。

無疑的，這種景象，是種種原因結合而生。有的原因，存在於我們的題目『國家與經濟生活』之範圍以外，即使我們給這個題目以最廣汎的解釋，也包括不了這種原因。但其他許多的原因，却在這範圍以內，就是這件事實，給我們這種討論一種很大的現實性，一種很有力的現實性。

博恩教授用興奮的言辭，給諸位以準確討探的提示，此種探討，可以導

入於各國國家與營業之關係的比較工作。本人覺得這個提示，提綱委員會應加以注意。有的人們，要把我們目前晦氣的一切責任，擲在國家寬闊的背上，列寧有句話『毀滅國家，』這句格言，被共產主義與個人主義雙方的極端派，都寫在他們的旗幟上。然而還有些人們，從積極的一隅，觀察這個問題，以為現代的國家，正可用作工具，脫人民於目前經濟的災殃，尤其是傾向於國家合作的現代國家。至於合作的範圍基構，有國際聯盟規定，因為我們的會議還是從國際聯盟產出的。

此次會議的籌備員，已表示期望，凡代表各國內種種團體論列『國家與經濟生活』問題尤其注重關稅及與有連屬性之策略的文件，均須繳本會審查。八個團體，已將報告書送到，曾經同仁傳觀。我們在先，希望能收到九個，但是我們波蘭的朋友，雖亦到會，可以參加討論，却沒有帶來報告書。

本人應負的職責，是把這些報告書分析撮要，並加以解釋。披誦這些報

告書，是一件很有興趣又很受教益的義務，但其中篇幅之長短，內容之多寡，及論列之方法，各報告書大不相同。因此，要作任何一種比較的研究，頗非易事。爲着手此種工作，本人要特請本會注意，此後或務擴大各國貢獻的標準，例如使報告書的內容，把各大問題剖析爲種種細碎問題而復類彙之，或以仍任各國之自由貢獻爲較善，本人於此點並無成見，但因我們由本年經驗得到的光明，本人相信這個提示，必能受大家的注意。

在經濟政策的問題上，有人主張放任自由，有人主張須有計畫。在我們這個會議中，對於報告書編製問題，恰似一樣。因爲接受了預先計畫而作的報告書，自不能任意在廣漠的範圍內暢所欲言，所以有贊成的，也不免有反對的。

我們的目的，在聯合國際，研究出一種新技術。此種性質的會議，這應算是第一次了，我聽得說，在前此的三屆會議中，所商權的不過是進行的步驟，所以這算第一次我們纔把實質上有重要性的種種問題，提來討論。

對於這種問題，我們在這裏，都應當互相諮詢，互換意見，互聯友誼。本人還有一個提示，就是凡意在領導提綱委員會的工作而繼續發言的人，——即如博恩教授已經發揮了他明白曉暢的言論，——都可在此範圍廣大的題目上，提出任何問題，只要各人認爲是應再努力加以有效的研究的問題。或在本年會中或在來年會中研究，均無不可。

本年的報告書所占的地方，較當日命題者之所預期，擴大得多。這因爲有一種特別的理由，這個關稅問題，不是一種新的問題，只略有一點新的事情，可以加到一個冗長的故實上面，這種故實，屬於人們所熟悉的過去歷史。在這個題目上，各國的理想家嘵嘵得舌敝唇焦，却在實行上沒發生過顯著的影響。有些人以爲這個關稅問題，單獨提出來討論，未曾得過結果，且無趣味，且甚至引起意氣的鋒芒逼人。這種見解，註（一）在意大利的貢獻裏面，已切實地爽直地傾吐出來。本人對此，頗有同情，特隨着意大利的明見，希望本會注意，是否對於一種計劃的經濟內所有較新興較廣

博較複雜的種種問題，應再加以比從來更切實的研究？在意大利新發展的團體國家裏面，我們看見一種計劃經濟的模範，在蘇俄則另是一種，雖有許多不同之要點，但就許多根本相同之處看來，說它與意大利的實驗很接近，亦不爲過。此外，我們這些公民，既不屬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又不屬俄羅斯的蘇維埃，在我們不同的國家裏面，不用求這種宏大的經濟生活之效果，把這樣非常有趣的實驗，也就可付之茫然。

註（一）參看五一——五八頁，二六七——二七一頁。

這裏所有的文件，大概可作三種區別，第一是按照着報告人的態度，或僅敘述事實，附帶着當局公然發表的意見，或自己發表意見，自己尋求合理的結論。第二是按照着報告書所從出的地點，或只包涵本國的政策與狀況，或並涉及他國的政策與狀況。第三是按照着題目的範圍，或專論關稅問題及與關稅問題有切近的連帶關係之問題，或馳驟於更大之區域。

第一項區別的例子，如一方面專敘事實，一方面專陳議論，兩者均走極

端，英吉利 註(一)與意大利 註(二)之報告書，即其明證。英國的報告書，長至五十五頁，其中只見事實統計，一點理論一點意見都沒發揮，意大利的報告書，內容是三十件富有刺激性的概括提議，但是沒有一個特別的事實或數字。其餘的報告書，是應列入此兩端之間。英國的報告，說英國自一九三一年，由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已入於毫不含糊的保護政策。我不知道這國際上的摹倣，是否就算一種國際合作的方式，如其然也，英國在近數月來，已老實地與大家合作起來了，我說這話，並不是在英國公民的立場上站着。現在我領到的任務，與博恩教授的任務一樣，是要做一個超越國民的評註家。這樣的一個國際人物，世界上有無存在之可能，我記得當一九三一年在日內瓦國聯大會第四次委員會中，曾與我的朋友加拉弗勒西 (Gallavresi) 對此問題，有一回暢快的辯論。但是在今日，或許我說，——同時許我證明他誠有理，我實錯了，——我覺得在日前討論的題目上，使我難以自禁地迴憶到我曾有榮幸得以備員的英國政府，它在一九二九與

一九三一年之間，曾尋求一種國際合作的方式，不幸未得他國贊助。它又在日內瓦提議先造成一個關稅停戰的局面，一面以國際締約，禁止在兩年內提高稅率，一面對於減輕稅額之約，在此兩年內任其自由簽訂，這個提議，沒得到普遍的接受。我爾時充成員之一的政府，於是試走另一條路，這條路就是由英政府和與英國有特別重要的商業關係的國家，雙方磋商，務削卑關稅的壁壘。我們爲減輕我們輸出品所受的重稅，曾經努力地與各國逐一商榷，把各種貨逐一地定稅，可是這回的努力，仍然沒有成功。有一個國家，現在有代表出席本會議，我不願指出這個國名，它允許只給英國貨一種優待，就是對於英國出的留聲機片，假如不是假象牙質的，就可把稅額稍微減輕一點，這就是我們努力所達到的地步。我們因爲逼得沒法，於是又離開了這一條道，我們英國人民，從此纔下了決心，要摹倣那些不肯與我們妥協的國家。

註(二)參看五一——五八頁，二六七——二七一頁。

說到第二項區別，就是有專述本國政策的報告書，有並涉及他國政策的報告書，在前一類中，——我希望不致開罪於人，我可用一個現代的術語，把他們叫作『內向的』一類，——除英國的告報書以外，還有魯馬尼亞的，註(一)捷克斯拉夫的。註(二)在後一類中，有德國的，註(三)丹麥的，註(四)奧國的。註(五)至於法國的，註(六)則當放在後一類的邊緣綫上。

註(一)參看二七一——二八七頁。

註(二)參看二八七——二九五頁。

註(三)參看二〇一——二二〇頁。

註(四)參看二二八——二四四頁。

註(五)參看二二〇——二二八頁。

註(六)參看二四四——二六四頁。

魯馬尼亞的報告書，很有意趣，算是一無二之報告書，其中的宣言，

是關稅近已減輕，禁令近已撤消，口岸免稅地帶，已經創設，外國投來資本，毫無障礙，在國際貿易受着無窮摧挫的一個時期，似乎魯馬尼亞却獨自與他國相背而馳。

捷克斯拉夫的報告書，說明本國之保護政策而又擁護之，並謂因守定拉辛（Rasin）大財政總長所建之貨幣政策，捷克斯拉夫乃得免於博恩教授所稱之革命，——即帶有革命性之通貨膨脹。此種革命，其四鄰莫不苦之。

法蘭西的報告書中，有自一八九二年以來法國關稅政策之歷史，頗富興味，並夾敘他國關稅政策，在法國政策上傳播之影響，及最惠國條約之作用。更有興味的，是觀察法國最近的種種發展，其中有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小麥輸入之限制，臨時加稅與補助輸出諸種方法之厲行。報告書的作者，又謂法國人對於『法國的保護政策，已否達到妨害國民經濟的程度？』這個問題，意見並不一致。

德意志丹麥奧大利各國的報告書，都把本國關稅政策變更的理由，大部

分委之於他國的逼迫。德國與丹國的報告書，尤爲發揮充足，大有價值。我不久當得到一個結論，可適用於兩國的報告書。

丹麥有一個久而且強的傳統的商業自由政策，但是在今年一月間，它已被驅入於極端的保護政策。一切輸入的貨物，都須得經過許可，這又是實際的摹倣力量的作用。

第三項區別，就是報告書論列的範圍，或不出關稅及與關稅相關的問題，或開拓更大的領域。我們在這裏，看見多半的報告書拓開廣大的範圍，把貨幣問題，人民移徙的問題，及經濟計畫的種種情態，都包在內。

由這些報告書的研究，以下的幾種問題，自動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一 這樣不斷的關稅增高，與商業上其他的種種限制，可視爲不足爲害嗎？這個問題，我想博恩教授當視爲平凡的。這是一個經過許多紛紜議論的老問題，今日對此，恐怕也沒什麼新鮮的話可說。假使我應該勸告同仁，須權衡種種問題的重輕，以定奪我們寶貴時間的應用，我使對這個問題

有無作長時間研討的價值，要懷疑起來。

二 關稅政策，是否應視為國民經濟計畫的政策之一部分？如其然也，在這種計畫中，其他的成分，又當是什麼？我覺得這又是一個更新穎的更有趣的更少充分討論的一個問題。意大利的報告書，關於此點，頗富暗示。德國的報告書，以為現在趨勢的出路，應當是國家對外貿易的種種獨占，就像俄國的樣子。丹麥的報告書，有相同的見地，但却表示一種恐怖，因為這樣的國家干涉，有惹出戰爭的危險。至於我個人的意見，就是極力主張國家總須比現在積極或消極。我們現在所處，是國家職務與國民經濟組織沒有安定平衡的一個時期，要我們安然忍受着現在所處的地位，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國家從事於革新的活動，或者它放棄它現用的手段，或者在第三條路上，我們只可想見這種世界紊亂令人可恥的現象，將長此懸延，使我們的利益，受愈接愈厲的威嚇。

三 倘使大家都回到較低的稅率，回到國際貿易自由，並非不可能的事

，那麼，由這種政策，可否希望成立一種關稅聯盟，減削許多關稅壁壘，或一種由各地方團體彼此締結之優待條約？假使可行，則在此種聯絡裏面，所謂最惠國條約，將來又以用何種的方式爲最善呢？

以上乃是幾個綱領的問題，很可詫異的，是這些報告書對這幾點，都沒十分注意。但我們的會議，假使進行日久，而這些問題還不自然發生，我却很難相信。

四 國際『加迭爾』之發展，可否視爲現在關稅政策之補充物或替代品？此問題之重要性，忽起忽落，我記得路碩爾先生（Torchet）在一九一九年，對於國際『加迭爾』之新發展，頗表遠大之期許，但最近一二年來，此種組織，却有一點退縮之勢。不過在關稅政策的關係中，這總是值得討論的一件事。

主席！本人已把幾種問題，很簡單地作一提示，請本會注意。此外一定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若討論起來，也是無妨而有用的。我們這次相見，

是在世界的政治歷史和經濟歷史上一個困難的時期裏，任何高的關稅壁壘，沒有把我們攔在意大利的界山背後，於是乎我們已聚在這裏了。在很快的境況中，在現代一個大城市裏，美麗而有歷史的屋宇中，各國教授的代表，公務員的代表，思想家的代表，都可以在這裏互相認識，都可以對於一個幾乎無所不涉的博大題目，也就是關係世界命脈前途的一個題目，交換意見。

讓我把我上面的意見作個結束，就是表示一種希望，從今年的討論及將來繼續集會的討論中，我們能把『國際智識合作』這句空泛而常受流俗譏笑的標語，化爲事實。

主席發言：

我們敬謝鐸爾東博士將本會各成員繳來的報告書作了一個清晰而透徹的分析。因爲現在已晚，倘使大家贊成，我就把一般的討論，展至下次開會舉行。（贊成）下次開會我怕不能出席，就請陶恩畢教授費神，替我主席。

午十二點三刻閉會

第二次研究會議，——星期一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開會，陶恩畢教授主席。

主席發言：

本人應先說明，爲什麼大家看着坐在主席椅子上是本人，而不是大家所希望看見坐這把椅子的斯特法尼教授，因爲一個人不能同時既作主席，又作參加討論的重要分子，我們今日下午既幸而得見斯特法尼教授參加討論，就須得別一國的某人主席……

主席因提出議會進行手續上的兩個問題，一，本研究會議是否應對於每一個問題都付決議？二，參觀旁聽者應否容納？

對於第一個問題，主席請大家回憶：『從我們會議開始以來……都曉得此種會議，是科學性質的會議，不能用投票式來付表決，除是

儻認爲在手續的觀點上，表決是必須的。參加本會的人，都是以私人資格來的，並不是以某國或某機關的代表資格來的，我們並沒有受委任，我們只有各國私人的團體願來參加罷了。』

對於第二個問題，大家贊成選組一個狹小的新聞委員會，其成員由荊霍爾提督勿爾非爾斯博士及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與國際文化合作社會各出代表一人充之。凡列席本會議之新聞記者，其記錄須經過此新聞委員會之審查，始得發表。

主席乃對新聞記者致詞，謂本會議對於新聞界光臨，熱烈地歡迎，並謂自覺上述之措置，甚適合於襄助新聞界之工作。

主席發言：

我們現在要走到我們共同研究的實質上去。今早我們都聽見鐸爾東博士之報告書的分析。各報告書於本會未開以前，業經傳觀。我們都看見鐸爾東博士在分析報告書以後，給我們顯示一個事務順序表的形狀，及其基本

的工作。今日早晨，我既有一良好機會，看過鐸爾東博士的觀點，假使可以的話，我就提議把鐸爾東博士的三個觀點，作爲我們的事務順序表。他原來指出四點，惟第一點應置不論。……

主席又問本會會員是否願於開會之第三日，同時開研究會議及會議，抑願將此兩種會議次第舉行，如願同時舉行，則應分組會議。分爲兩組討論之提議，經愛森曼教授極力反對，麥岑教授亦加入反對，於是次第舉行之議，公決贊成。

主席發言：

讓我把鐸爾東博士提出的幾點，向大家宣讀，作研究的開始。

(1) 關稅政策，可否認爲經濟計畫中政策之一部？果然如此，在這種計畫中，什麼又應當是其他部分的原質呢？這種計畫，在國際經濟和政治的相互間，又有什麼關切呢？

(2) 各國都恢復到較低稅率的水準，恢復到較自由的國際貿易，這件事

可否認爲是辦不到的事呢？依這樣的策略，能否希望作出一點成績？例如關稅同盟，或部分的協定，彼此對於相互的輸出品，予以優待，在這種聯合裏面，最惠國條約將來的的方式，該怎樣纔算是最適合的呢？

(3) 國際加迭爾的發展，可否認爲是現在關稅政策的一種補充方法或一種替代手段？

此外又有蓋奕博士追加一個問題，就是若以工業之移徙，爲抵消關稅作用之手段，其未來觀又應如何？

我覺得若我們照鐸爾東博士的觀點，定我們討論的步驟，是最善利用他今早的貢獻。諸位若有同感，我就提議把這些題目次第提出。(贊成)。

我現在很覺欣幸，得請出斯特法尼教授，對於第一點發言，作討論之開端。

斯特法尼教授發言：

博恩教授今早的演說，給我把路開了。我現在要把鐸爾東博士在他極清

楚的說明裏提出的第一點，用更普通的言詞，加以說明。

諸位當已注意到我們的備忘錄註(一)所用的形式有點出乎尋常。我們要把我們的意思，凝結在有限的幾句話裏面，力避冗長，我們並沒把任何一種直覺的真理，包括在內，不過提出一系列的概括結論，都是根據着我們科學的和政治的經驗。這就可以說明，爲什麼我們的備忘錄，就說到內容，也與別的備忘錄不同，別的備忘錄的著名作者，都是專注重關稅政策問題。

註(一)參看二六七——二七一頁。

我的朋友亞摩羅蘇和我兩人，曾悟到種種理由，足以迫促我們對於當前這個博大問題的小節細目，加以審察，或是在研討的方法上，或是在援證我們論文的材料上。但是我們又想到若把全題作一綜觀，使我們的思想，得到一個更明瞭的方針，也是有用的。

我們送繳的決議，是站在一種假定的前提上。就是把現在經濟體系的結

構裏由非常的事實發生的種種變化，都認爲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因爲我們都親眼看過了，所以我們覺得若歷歷敘述起來，未免使諸位厭煩。

我們恐怕的，是若不指出我們這題目中最概括最真確最顯著的原質，而徒自限於把值得注意的事實，填成表式，把人人習聞的怨聲，人云亦云的提議，反覆陳述，則這個會議，也恐怕就像從前舉行的許多其他會議，一樣懸在空中。

最近事實的敘述，種種的怨歎，種種的激勸，實在不算缺乏，我們確信得若再從而附益之，直是枉費時間，反之，若就我們目前的種種的變化，觀察其趨勢的方向，這倒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情。如此，我們可以收穫從這種知識得來的一切利益。

假使已往許多的會議——我們曾提說的——所得的決議案，所發的勸告書，在建設或恢復的計畫上，發生過一點輕微的影響，則今日的世界，已不讓極樂園了。但還有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個人因深信國際合作的價值而

坦然抱一種樂觀，縱使是極貫徹的樂觀，又因職業關係而堅執的樂觀，恐怕無補於這樣困難事功的實現。

國家與世界經濟階級的上層，——這些專門學者國外的集會，就是這些上層領袖人物助成的，——恰巧就是在其他範圍內支持着一種令人太息的經濟政策者。此種經濟政策，適與這些領袖人物所尋求的政策相反。這個矛盾，發生於一件事實，就是在我們所說的集會裏面，沒有發生出來有力量的思想，沒有一種思想，帶着一種信仰的強迫力，如往古所孕育的偉大思想，能挾人們而走者，沒有一種風靡一世的思想，能使決心抵抗而自掩護於特殊政策之下者終歸屈服。

如同沒有力量的思想一樣，那些久受經濟與政治的媚俗自由主義支配的人民，都停滯在那裏，也沒有創造力的識解發生出來，從他們靈魂的深處，沒有挺出一種思想，能逼入各種經濟建設的結構與其間的關聯，於是便不能把領導人類之行爲及指示效用之準衡的原則，變通盡利。

這裏至今所缺欠的，是對於經濟的力量，就其作用於人生事業以內及人生事業以外的種種原動力，種種目的，如下所陳，加以反覆考察。因為對於先民所揭的原理，加以批評的審查，纔使我們的思想最深處，覺得對於媚俗的自由主義復興之可能，不但視若無覩，並且直不相信。至於認為可能的人們，變種種的方式，作種種的復舊運動，一定使我們得一種感覺，覺得他們所恃以恢復其體系機構中的平衡者，只是一種憑空抽象的勢力。若說到實際的領域上，他們或者把運動復舊及整理自身的力量，早已失了，沒有這種力量，便不能自己防衛，不能得人接受。

我們所能做到的，如此說來，只有待着結果，——這種結果，不會不來，雖然只可預料到八九，——就是在這個體系的結構裏面，其官能的自然運行，將挾來最後的恐慌，而國家與其他龐大的經濟利益之所在，皆將大有贊助於此恐慌而不自知。

我們不能把西方世界現在經濟的擾亂，歸咎於衆多的下層人民。他們當

然的職務，不過按照着訓令而行，因為他們並沒違抗他們的立法者，他們並沒有顯出煩躁不寧的特徵，他們並沒有縱恣他們的情感，像往古時期人民的習慣，他們不見得騷動，也不見得遲鈍，他們揮霍娛樂的方式，也不過像作工的女孩子，喜歡穿一雙絲襪一樣，這些情形，顯然不能說明這個恐慌。

在事實上，這些下層的人民，表現出一種適應晦氣的能力，在現代差不多可說是空前的。我們並不能因工資提高，歸咎他們，因在理論與實行上，要促進消費的必要手段和充分手段，就是提高工資，這是美國的領袖資本主義者曾熱烈高唱的論調，——雖事實已證其誣。

於是乎這些稟命而行的下層人民的舉動，就應當排除於構成厄運的原素之外，我們並且爲此作他們的見證，這是應該的。還有一層理由，更應當放過他們，就是因爲我抱定一種見解，假使我們在這個厄運本身上，要避免含混而偏於學理的研究，假使我們要把它固有的和偶然的現象，放在一

邊，自然要離開客觀的和無質的窮因方法，走到主觀的有形的對人的方法，把社會各級人民的舉動，同時合算起來。我們寧研究行爲之人的病態，不研究行爲本身的病態，這就是一種方法。

就這個提到會議的題目——國家與經濟生活——的賦形說來，若用客觀的方法，也不免發生缺憾。這用兩個名詞合成的一語，是我們故意要表出一種單純的意思，要把它提在一個抽象界較高的平原，要把它由它所有具體的意義中分解出來。審察這一語，定然要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走上寫實求真的路程，務勿嘗試把它在形而上學的假面具下，介紹於衆。

龐大的獨占事業，及他們組合的團體，其威權與強制力之大且厲，不減於法律本身的力量。在政治機關的意欲一旁，有一種有組織的意欲，出於資本家與少數的領袖人物，這些人管理着政治機關，且從己所欲而利用之。

在世界經濟活動最先進的部分裏面，——此部分正在擴張，——儲蓄的

分配，——即資本的和勞力的分配，——不復受一羣自由意欲的管理。况一面個人企業在這些正事擴張的部分裏，正趨進於集中兼併之途，若一面仍把無限的無數的個人自由企業，認為是這個體系中能作生氣的及有集合力的原則，那就毫無意義了。

這兩個名詞合成的一語，——國家與經濟生活，——含有一種相反的意思，一種對抗的意思，或者在任何程度下有一種相互關係，存在兩個題目的中間。這兩個題目，原來彼此或多或少總有些生疏，可是在事實上，彼此漸漸地互相遷就，有結為一體之勢，於是兩者之間，對抗的意義，亦因之而消滅。自由經濟體系的劇情，——在此體系中，一方面乃諸大營業之間的相互關係，一方面乃國家之職務，——由法律節制與經濟變動兩者增長不止的現象，表演出來。這種發展的趨勢，使大實業及銀行家之利益上常受限制，但往往只顯得是贊助限制而不是強迫限制。生產的量，貨物的價，生產者的數目，國內國外的競爭，獨占的事業，資本的收回，利息，

工資，及投機所得的利潤。凡此種種，實際上無非營業方面與國家方面協力活動的產物，而兩者之間，却並沒有也不能有一種合作的締約。

假使我們同意，把『自然的』這個形容詞，加於一種經濟平衡上，設想這個經濟平衡，是成立於自由狀況中假定的和抽象的條件之下的，那麼，我們要形容我們自身生活在內的經濟平衡，只有加一『人工的』形容詞纔行，這就是說，這個平衡，是建築在資本的封建主義之上，這種主義，受着國家保護的約束與保證。

有些人說，最近五十年內漸漸形成而又受特別情形促進的經濟實況，原是一種病態，此種病態的救藥之法，便是復舊，我們只有把此種論斷之正當與否，有用與否，懸為疑問。

有些人們，從我們現正閱歷的困難恐慌裏，看出一種有創造力的景象，他們視這個恐慌，乃是從自由經濟自然調劑的體系之消滅到新經濟制度之代起中間的一種過渡現象，在此新經濟制度中，勞力與資本之分配，亦猶

生產之體系，皆待根據對於一切需要的知識，預先作一整個的計畫以規定之。

假使這就是事實所取的方向，這就是有機體的和有藝術的變化自然演進的結果，那麼，我們對於促進返古所能出的氣力，所能用的理論，其結果不過只延長恐慌的時期，並且阻撓我們作所應作的事，假使這個已經開端的變化是要貢獻可能的最好成績的話。

就是爲此，我們正在這『團體的體系』裏面努力。這個『團體的體系』，乃是有伸縮力之種種建設，結成一體，能在這種進行中，適應一切變態。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承認我們接受經濟等差與由經濟等差所生之兼併，同時我們對於國家監視他們與保持他們於健全狀態之權利，是一樣地承認，一樣地接受。

再則在實行上處處傳播着——即西方亦然——一種觀念，以爲在生產重要部門內的需要，一是進步，二是統一的計畫，因爲自然調劑的經濟體系

之力量，日就衰退。

此種觀念，在西方的演進，大約不能與在東方的進展循一樣的路線，我們現在還不能逆料此種演進的趨向。

雖然如此，可是一切國內的或國際的計畫，勞力組合或生產業組合，出於志願或出於強迫的，各種銀行或實業的組織，一切無例外地都表現一種趨勢，向統一而預計的政策上進行，爲的是應付消費內的變化與發展，並且向指揮領導之集中上進行，爲的是安定個人的或公共利益。

即私人企業，亦漸漸趨於兼併他業與集中權力的程途上，其結果爲本身的發展，受了規範，其發展中的示威態度，受了裁制。

私人企業的集中權力與兼併他業，可以在國家用種種方法以保護他們的範圍內繼續地存在，這其中毫無危及自由思想自由想像或危及科學進步的意義。科學的進步，是我們人類的尊榮所要求的，不應當與物質的贏益混爲一談，他受着國家權力的保護，在許多地方都有實現的可能。

我曾決心地把我們的觀點清晰地說明，以表示現在我們環境變化之進行的大概性質。它的進行，是有機的，藝術的，於是乎也是經濟的。我們若用經濟自由主義空洞的標幟以衡量事實，就免不了對於當前的變化，構成一種不可救藥之病症的觀念，但是以上的觀點，可以領導我們離開這種觀念。

至於經濟體系內有未曾發覺的原素，及人們爲先事預防計，對這些原素，用統一的集中的支配，適增重了這些原素的價值，這件事實，並無損於經濟的原則。再則，一個單純的意欲，供團體的使用，來替代了私人不相爲謀的自由行動，替代了這些未知原素的自行決定，這件事也無傷於經濟原則。

『國家與經濟生活』，乃互相關連的兩種事實，由反對的地位，漸就於同一的地位，這兩個名詞合成的一語，將失其二元的質素。

諸位先生，就是我簡單地提在大家面前的這幾點考慮，領導着我們在我

們的備忘錄裏，擬定下列的提議。

1. 事實指出來在這個自動調劑的自由經濟體系裏面，種種力量發生出來，無間斷地破壞那自由原則實體的內容，經濟力的自由活動，在無論那條路上，不能保證這個體系間接或直接的效力。

2. 各國的自由經濟體系的領袖人物，若不受國家的干涉，便無能力保持企業的平衡。他們已默認這個自然調劑力及他們自己領袖這種體系的任務，都成了強弩之末，所以他們回頭向他們的政府要求，以對外法規的作用，保障企業的均衡，尤其是保障他們自己的均衡。這種均衡的保障，無論是他們自己，無論是自由體系本身，都不會造成，不會維持的。

3. 無疑的，有人說這些破綻及由此而生的失衡現象，根本上是由世界大戰發生的。這種抗議，理由却不充足，因為最近五十年的經濟史，足以證明這個經濟平衡自動恢復的機構，當世界大戰以前，已腐朽了。

4. 要究這種原因，應在實業和銀行集中現象裏，就技術方面和財政方面

的事實求之，實業和銀行，因傾向於限制自由競爭，同時就不免破壞自由競爭之調劑力，而防害其維持平衡之作用。

5. 生產企業之集中，遇着一個敵手，就是職工組合。它把勞力的供給，凝成一團，它的成立與發展，就是爲保障一般供給勞力者的利益，它導工資於一種強硬化的趨向，工資強硬化，使一般營業狀況之變動，對於勞力供給者，在一定範圍內不生影響。

6. 我們從這種獨占化之演進，——在國內與在國際一致，——不自動地走到一個結論上，就是在現在私人企業的體系裏，各種獨立的力量之組合上，可以看見一種逐漸的變化。這些力量，順着這個進行的方向，挾空前的大數量，在空前的大範圍內，趨於聯合與兼併，當自由經濟體系之自動調劑力已告失敗的時候。

7. 消費者尙站在集中的程途以外，完成的生產品之需求，大概尙保持着昔時個人主義的形態。

8. 因上述之集中現象，在這個經濟體系內進展，故經濟體系內之凝靜力日增，致物價與生產之伸縮性大受其窘。

9. 大製造業之生產能力，與其排斥和吸收國內國外競爭者之機會，爲正比例，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間之失均，多由於此。

10. 保護關稅，在這種進行中，代表抵抗國外集中的一種防衛原質，同時就是促進國內集中的一種鼓勵手段，因爲他們有封守國內市場的傾向。可就是就在國內市場裏，那一種世界化的進行，像我們上面說過的，仍是一樣地表現，不過在較低的程度之下罷了。

11. 用分期收價手段，及國內國際貸款，以增加消費者之購買力，使消納較多之生產品，非不能造成一種矯飾的和暫時的需求，但這種手段，隨購買者一時所得的購買力之漸漸消失，其效力亦衰退。

12. 大量的賒賣，以貸款手段使之可能，暫時間使交易的趨勢，發生變化，使之不得穩定，於是引起增加關稅保護之必要，始於債務國，繼及於債

權國。因為商業平衡，初被貸款繼被利息之支付與公債基金之負擔所破壞，故不得不用關稅保護，謀商業平衡之恢復。

13. 銀行家只利於銀行業務之活動，而對於他們的活動力所發生之間接的將來的影響，則漠不關心。

14. 戰後的經驗，顯示出國際的銀行事業，對於他們的活動力所發生之擾亂結果，並沒有通盤計算過。既不能預料於前，又不能及時補救於後。其實他們已贊助着促進那自動調劑的自由經濟體系之破裂。這個破裂，在各國內無論情形若何，早已開始了。

15. 從以上所述，可以明白這些大企業與大銀行沒有控馭新經濟進展的能力，需要一個從外面來的力量，超越他們的目的與利益之上，能節制他們，又能與他們調和。

16. 他們自己，在國內和國際，正努力節制他們的活力，從自由經濟的結構而外，用銀行團及企業聯合會種種手段。所得的成績，為生產計畫，生

產標準化。這與維持自由競爭之傾向，相離甚遠，寧可說這就是自由競爭將就消滅的傾向之明徵。

17. 可是雖在一種不整齊的狀態下，目前各國裏面及徧世界都正在建設經濟的計畫，其特質與方法，自然與俄國的計畫不同。但是他們也都代表一種自然發動的及有歷史價值的嘗試，務決定一種經濟平衡狀態。在這種平衡狀態中，一切不同的原素，應常常少作自由進行中有自動調劑特性的官能，而常常多作先事預定的官能。先事預定，以對於消費需求的知識為根據，而以消費率定生產率。

18. 我們傾向於生產預算儘量擴大的適用，使生產與銷場的含量愈能適應。為大眾的利益，不妨犧牲生產中過多的種類，因為只有個人主義的經濟體系，纔要那麼多種類的生產。

19. 就說到儲蓄的分配，也是到處都取着節制而又節制的傾向。現在有一個標準，就是種種方法，種種限制，乃是銷場能消納種種生產的準碯能力

所設置的，而不是衆生產企業者一種經濟搏鬥的可能所設置的。

20. 這就是爲什麼在一方面，國家干涉經濟生活，是人們所傷歎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正是由經濟計畫的發展——其形式有國民的亦有國際的——產出國家的干涉。國家的干涉，沿着銀行團及企業聯合會的路程進行，而銀行團及企業聯合會在經濟領域上適與政府的節制相當。

21. 於是我們的任務，不是要把已知的議論與事實，說來說去，是要向列國政府諸銀行家諸實業家及大眾的意見，說明這個上面略述的有革命性的進行，也就是爲贊助這個進行而說明的。

22. 在這個進行中，個人主義的經濟方面，其利用儲蓄及資本之能力，趨於衰微，在他一方面，則有能愈用而愈善利用的趨勢。保障大眾利益的安全，並不排斥加入股分的個人之利益。在事實上，因投機事業的詭譎手段，受着控制，個人的利益，也得了比較更妥的保障。這個控制力量，使實業界的財閥威權，就了範圍，事實指示出來，財閥威權，是與國民及人類

的利益，常相衝突的。

團體制度，就是發展這種進行的一個模範。

23. 目前的恐慌，也許是我們對於維新組織及轉移標準應給的代價。倘使各國政府及人民，覺悟到有一個方向，許多事物，都朝這個方向奔赴，若能把經濟的力量，向那正在敷設的新秩序中領導，一面也不要摧殘却我們文化進步所憑依的精神上的力量，那麼，這個恐慌所賜的教訓，就是最值得我們慶祝的了。

諸位先生！經驗的教訓，使我們明瞭，一切孤立的計畫，都是沒用的。我們希望這個會議，在這些開明的提議中，得到豐收。這些提議，將摧毀一切封鎖的經濟制度及其不良的結果，就是贊成封鎖經濟制度的人們，也未嘗不感其結果之不良。

雖然，我們不能自禁對於這些正在完成的變化，加以寫實的和敵對形而且學的解釋。這種解釋，是由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觀察力提示我們，且證

明其不誣。

我們或不免受人譏評，說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一種特殊的和磅礴的貢獻，這個理由，我已給諸位說過了。讓諸位中任那一個無過者來詰責，我們總覺得若牢記住我們正走的這條道路，不至於是無用的，一則爲的是避免一切誤會的危險，再則爲的是雖在一種傳統的社會建築有崩潰之虞的時候，仍不付之於絕望。

主席發言：

諸位將留心於那篇傳觀的文件，註（一）（載有斯特法尼教授所說二十三點的條文，）是斯特法尼與亞摩羅蘇兩教授合力的工作，因此我現在要請亞摩羅蘇教授繼起發言。

註（一）參看二六七——二七一頁。

亞摩羅蘇教授發言：

我只有很少的幾句話，加在斯特法尼教授的演說之後。

現在的經濟狀況，可以看作兩種原素的產物，商業軌道上的波動，與一種物極思返的傾向，這兩種原素，現在互相結連，就是這個原因，給現在的恐慌以特別強度。

表現出物極思返的傾向的重要事實，在我們的報告書中，已經指出，適纔又經斯特法尼教授說明，就是實業的兼併與銀行的集中，這兩件事，把私人企業的性质和範圍，深刻地變化。

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私人企業，是個人主義的，是自由的，今日我們仍然用着一樣的術語，當我們指示這個財閥管理下各集團密切關連的活動的時候。可是這些集團有時或公然互相衝突，或以締約自相結合以掩飾他們的衝突，這第二種情形是比較更習見的。他們永遠準備着加入政治的勾當，以防衛他們的特殊利益。

企業之集中，被勞力供給的凝結對抗起來，這是職工聯合會的作用，是十九世紀整個的社會運動之結果。勞力的職工聯合之組織，不僅含有保護

維持工資水準的意義，其目的且在保障勞動者前途的安全，使他們不受交易上波動的影響，使他們的人格，在生產進行中，是社員而不是工具。資本主義的重大錯誤，就是漠視了人類根本的和深切的志願，俄國的共產主義，犯着一樣的過錯，它雖說現在的資本是與國家合而爲一的，其實它把資本剝削勞工裏最不名譽最殘酷的原質，刷新而利用之罷了。

企業獨占化的集中，與職工聯合會，造成勞力供給的強硬化，成了歷史進行上相反而又相就的兩個極端。一切靜止性的力量，由此出發，使生產體系入於殘疾的狀態。這些力量，來反對銷場吸取的伸縮力，——就是說價格的伸縮力，——他們阻撓自動的調劑，而自動的調劑，卻就是資本主義的體系務求達到的目標。

用分期付款銷售法，造成需求上一種不自然的激增，這可以解釋爲一種嘗試，要在財富流通方面加入一種強硬性的原質，對抗生產方面的強硬性，以恢復兩間的平衡狀態。這個嘗試，已失敗了。在種種失敗的原因裏，

銀行的作用，要算是第一個，今日的銀行，不復能作為削平一切界限生產力於同一水準之用，今日的銀行，已成投機手腕操縱市面以投資作賭博的場所了。

一種的嘗試，已曾作過了，現在繼續着還作，是用銀行團的組織，以限制和調劑生產為恢復平衡狀態的手段。這種方法，已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可是並沒有得到——實在也不能得到——人們所期望於它的結果。銀行團這種政策，吃了兩方面錯誤的虧，即理論方面和實行方面。理論方面的錯誤，是一種信仰，以為對一個單純的經濟原素，專想應付它的辦法，不至牽涉到其餘的經濟原素，這明明是一種可笑的見解，因為當存貨的數量，用矯飾的方法使之消滅的時候，銷場便會起反動力，致它自己的吸收力，越發消滅。實行方面的錯誤，可以說是道德上的錯誤，存於一種事實裏面，就是直到而今，國際的合作，並不在公共利益方面發展，却只為特別集團的利益服務。用獨占強烈化的手段，來解除獨占的集中所生之紛擾，欲

其收效，勢必不能。

這種事實，若用理論上的公式來反詰，不會有用的。那些公式，在昔時可以代表實際，且確已代表了，但在今日，那些公式，只算是一個一去不返的時代的回響。

團體制度，在它的模範形式內正是代表着當代的社會一種努力，要對目前新發展的事實，規定一個經濟的和法律的新範圍，這就是團體制度所以不落於一種含糊的觀念學而確有一種生活力的理由。並且因為它的原質，是同時富有理想而又徵諸事實的，它的歷史上的價值，也就在此。

團體制度，仍然站在私人企業上面，它就因為如此，所以顯然與社會主義的一切形式不同。不過私人企業的體系，在這裏只能循着與公共利益符合的路綫進展，不受財閥管理的束縛，却受國家的整飭，調節，和成全。

這就是我們對於事實的觀念，我們未能遵循預為本會議的工作畫定的路

綫，我們的意見，以爲討論關稅問題及討論現在的擾亂中其他特殊現象，都沒有用處，我們應當直窮這個擾亂的本根。

假使我們的病論是不錯的，這些實在的原因，正伏在獨占的財政的和財閥政治的集中裏面。就是這種集中，應當以支配銀行及有限公司之法律的改造，與之決戰。因爲這個組織就是資本主義構成的細胞。種種責任的包攬，股東在企業內的分權，一實業公司爲他實業公司經濟的後盾，資產負債表的失實，投機的事業以及企圖暢銷出品之種種詭計，都不過是私人企業的財閥行政之衰敗中很少數的例證。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目的，應當是打破私人利益的藩籬，把公共利益中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志願，團結而調和之。

我們現在走到目前擾亂的實在原因上了。這些原因，都是由道德方面發生。

目前的狀況，乃是幾百年的行程上最後的一段落。這個行程開端於一種

邪說的高唱，『生活的快樂』。這種邪說，使個人自私自利心自由地馳驟，摧毀了——由於判斷的自由——歐洲人道德自覺的統一。加以無信仰的和唯物化的機器時代方興，乃高呼以政治權支配宗教權的口號，把各民族各階級都武裝起來，使彼此互爲讎敵。到今日要控制這些曾經縱弛的力量，已非其所能了。

爲遏止這個崩潰的潮流，發起了一種運動，恢復起一種建設，而且就用了它原來的名稱。良由這種建設，乃係歐洲千年來經濟生活的基礎，所以這件事實，並不是沒有特殊的意義。『團體』不是一句空言，它包含一種理想，而這種理想，即一種節制快樂的理想。

在團體制度之下，個人將不僅追求他暫時的勝利，僱主將不挾資本的壓力以剝削工人們，工人們——或單獨的或集合的，——將不陷害生產的利益，生產者對生產的目的，銀行家對於其居間經營的結果，皆將不至於漠然置之。企業者若自殆自誤，將自受其惡果，他若想用一種政治的手段，

把責任卸在整個社會的肩頭，那你就錯了。資本將仍生利息，但是重利盤剝，便成了罪名。投機將算合法的行為，當他是經濟遠識的明敏措置之表現時，但以投機譎計操縱市面，亦將成爲罪名。

我們的文化，不得穩定，且正在破壞，因爲一條裂縫，把有價證券價值的波動，與生產進行中實際的變動，分而爲二。我們的文化，正在實業與銀行集中的壓力之下，蹣跚而行。這種集中的壓力，少一部分，可說是專門技術進行變化之結果，多一部分，可說是財富和權力的占有欲及全世界努力地使少數集團包圍的利益支配人人的需求之說明。

貨幣的寡頭政治，是最殘酷的一種寡頭政治，解除了它的武裝，纔可使人間的信用復活。

由於人類天性的弱點，個人趨利的動機，將永遠存留爲生產活力的主要彈簧。個人的贏益，應當尋獲它的水準，應當挽回到一種比較適度的空氣中，在這種空氣中，凡是要想從一切可能性中恣其搾取的人們，是不能生

存的。

我們由這種經濟道德的考察，現在被引到關於本會議議事日程的特別問題上了。我們被問着什麼是我們對於關稅的感想，有個答覆，十分簡單，又十分坦白，因為這是一個由我們適纔所說的話得到的結論。

我們以為各政府最近所採的策略，只表示一種集合的錯亂舉動，根本上就因那些少數集團的利益使然，正如我們的報告書中已說明的。種種策略，顯示出來這等集團，這等階級，怎樣狂謬的事，都能作得出來，當他們想着他們會把自己的利益提在任何問題以上。

但是這種狂謬，在阻礙交易上，已算是成功了。我們為人類文化的光榮及其利益起見，希望他們所用的手段，將迅速地激起一種反動力，抵抗他們自己。

不過當這種狂謬舉動，繼續延長的期間，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從物質的顯見的事物方面看來，尤其是從無形的精神的方面看來，皆重受着它的作

用的壓力。

主席發言：

我們現在要走到我們的大綱的條文上去。我先聲明，我們應有十分鐘的時間，對意大利的貢獻，加以討論。讓我起首請一個意大利的代表，對英國代表提出的問題，解答幾句，就是請意大利的代表把關稅在意大利團體國家的組織中所站的地位，申說幾句。

斯特法尼教授發言：

亞摩羅蘇教授在適纔發表的演說中，已答過這個問題了。

主席發言：

我現在請布戈勒教授發言。

布戈勒教授發言：

主席！諸位先生！我以爲我們尙未達到相當的階段，能够討論這個很惹人注意而揭示在我們面前的方案，就是命令式的團體經濟制度的方案。我

所願的，只是把在法國實現的情況，作一個歷史的尤其是關係目前利害的觀察。我們曾受邀請，爲的是考慮關稅政策與經濟領域上一般政策之間的關係。我要對大家聲明，按着我國歷史的地位，什麼是我們覺得在法國有可能性的。要這樣作去，我將感覺一種愉快。請諸位留意我們的報告書，

註（一）這報告書，是我們的朋友而又是我們的同事裴加爾（Picard）教授作的，他沒出席，我們都覺抱憾。

註（一）參看二四四——二六四頁。

這個報告書，就他的本身說，是很簡短的，並且諸位今早已聽過它的正稿的撮要。但我恐怕這個撮要，在諸位腦筋上，或留一點失真的印象。在事實上，諸位或被導入一種信念，說法蘭西是超羣出衆的保護主義國，並且從來就是這樣的，直到近數年來，纔有一部分法國人，覺悟到這樣舉動，有點過火。就事實論，法國的保護主義，寧說是經過許多比較複雜而完全不同的段落，這纔是實話。就前後所受的限制言，也應當細心地分別。

在戰前很遠的時期，自一八九二年起，我們試行保護政策，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因為我要請教諸君，我們現在所苦的壓迫，還是完全由戰爭的結果而來？還是他的根源伏在比較普通的制度裏面呢？法國試行保護政策於歐戰以前，而保護政策，乃強烈化於歐戰期間。但自戰後以至一九二九年，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我可以把它叫作不完全的自由政策。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我們的政策，又漸入於保護主義，爲的是對抗——各國都是這麼說——他國所採用的策略。裴加爾教授的結論，謂法國倒不反對那趨向於輕減關稅的政策，這却絕非飾詞。

他爲證稿這句話而指出的理由，真是一個美滿的理由，——最好不過的理由，——就是一個傾向減稅的政策，倒還是法國之利，因爲法國現取百分之四十五的稅額，實在加於我們所需要之原料。在事實上，若得見各國民經濟體系間交易常態的恢復，倒是法國的利益。

雖然如此，我可以再加句話，就是要法國採取一種真徹底的經濟自由政

策，怕很少或絕無相當的機會。精神上的自由，——假使諸位願意這麼說，——是法國一大部分人民的傳統物，但一樣大的部分的法國人民，却久已放棄了經濟自由。其理由我還要鄭重的聲明，雖然是諸位已明瞭的。

法國是一個農國，村夫村婦合成的國民，固執地保衛他們鄉村生活的境況。

我說法國是一個農國，我所說的事物，自然是須要一種限定辭的。在法國和在各國是一樣，自五十年來，農村的人民，漸為城市所吸收，但是總計起來，我們一半的勞力者，仍然是鄉下人，或耕田人。諸位可以想到這裏頭所含的意義。法國的政策，大部分還是農人的政策，許多法國人現在仍苦心焦慮地務保存這般農村人民，這般農村人民，乃我們文化的特色。

我們要保存農村人民，要維持他們生活上便利條件的理由，就是我們恐怕耗竭了供給城市人的貯蓄器，並且我們以為就是這個農民一層，給我們文化建築以一種特質。

在這種關係上，我喜歡追述幾句話，乃諸位都曉得的一個人叫作席吉弗利得 (Siegfried) 說出的，他說『法國的農人，因為他是個人主義者，因為他不喜受人支配，受人凌駕，所以能在人道主義的前綫上與我們共同奮鬥。』這句話給我們帶來深刻而多端的理由，保存我們的農村人民。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中，有以關稅政策保護麥價之必要，這是很明瞭的事情。

在我們的歷史初期，當法國農業的重要引人注意時，農村主義者，覺得他們自己在歷史上就是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格思奈 (Guesnay) 與重農派諸子，乃第一次唱這個『任做去放過去』的口號者，而這口號正是為着法國農業的利益。今日農業之昌盛，還是靠着保護，這就是我們所以既作了自由主義的先鋒，復為農業而變成保護主義者的理由。

再則，諸位不要忘記了我們農村裏各階級正在演變他們的性質，正在講求他們的組織。假使我們的另一個朋友歐階拉里伯 (Augé-Taribé) 今日在場，他當告知諸位，我們的農民，怎麼樣也漸漸明白互相聯合的價值了。

但是這些農民，若無國家在邊界上厲行的關稅，便不能維持他們今日所享受的生活狀況。我想，我敢放膽地說，在農業要求的範圍內，沒有一個法國政府，敢推翻這個政策。有一個界限，無論屬於什麼性質的政府，是不能越出的，政府固不應採用提高麵包價格的政策，以冒犯市民怨讟的危險，但要想法國政府採取低廉麥價的政策，却是絕無希望的。我們可以設想麥產有餘之國，與麥產不足之國，雙方原可締結互惠的條約，法國的農民，首先提議此種締約，但迄今無響應者，若專要法國削卑關稅的壁壘，當然是無功的。我們在這裏遇着一個在關稅政策與一般政策之間的關係問題，這種關係，不僅屬於政治的經濟領域，並且屬於社會的經濟領域，一個社會的建築，正在存亡絕續的關頭，我們不願把他一手掀翻。

在農民的旁邊，有一個第二種的力量，在法國一般的經濟和關稅政策裏面，離不了它的作用，這就是民主主義各黨的力量，我們稱這些黨爲左派。

這些左派，並沒走到絕對的完全的雷厲風行的一種社會主義的程度上，——因為我們不肯放棄私產權的小資產家過多，——很願意把監督大規模企業的行動之權利義務，付於國家，尤其是關於對外的經濟政策。

這是法國歷史的遺傳，這些左派，對於脫拉斯加迭爾或其他財閥組織威嚇國家權力的態度，表示憎惡。他們時常憤慨進攻着『金錢的壁壘』，——如赫利歐（Herriot）先生所稱，——而這些大公司大銀行及其他經濟利益的大集團等，都永遠在國內的羣衆中，——這些羣衆，就是在最近選舉中得勝利者，——遇着一個疑忌的壁壘，到這個壁壘之前，他們只好止步。假使法國民衆，覺得被人愚弄，假使大眾意見，覺得托拉斯加迭爾等在政治上用起手腕，而其他營業組織又爲之援，這些左派領袖，登時就會活動起來，以激起民主感情的反抗力。

這是不可置之度外的一件事，法國的政策，將永遠趨向於保護國家的威權，以抵抗龐大的企業及雄厚的財團。

這件事實，可以在國際上發生影響。要把我的意思使諸位了解，讓我陳述一件能表現特質的事實，是近十年內發生的。當法國將以火柴專賣權租讓於某大公司之議起，——這個公司的現狀，恕我不便詳說，——突然起了一片疑忌的風波，甚形高漲。徧世界的經濟學家財政家都說，『法國人瘋了，怎麼在出售獨占權的買賣裏，能看出真正的利益來呢？』其實這項買賣，沒有作成，就是因爲左派對於財閥的疑忌，——就是我適纔說過的，——從中阻撓住了。

在對外政策裏面，這也要算是一個要素。

常聽見一種談論，主張使各國領袖生產者的集團，互相締約，以代替關稅壁壘。我們迴憶到一個法國的實業家而兼政治家路碩爾 (Loucheur)，他就指示過這種辦法的路徑。假使我可以說一句預斷的話，——不是以經濟學家或財政家的資格說，而是以虛心的社會學者的資格說，——我便說，這種政策，在法國不能暢行。在對外政策上，沒有一個政府，在左派的監

視之下，能把法國的命運，交給於那些由脫拉斯加迭爾等造成而政府管不到的國際締約。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歷史造成的局勢，我們的活動力，由此得到一定的方針，及一定的範圍。法國的國家，很可以贊成與他國作經濟的協定，在報施均等的基礎上，它還可以減少一定項目的稅額，但這樣的事，要作得到，還須得民主派的贊同。他們的意見，永遠沒有睡眠的時候。

一個第三種的力量，也須計及，今日在這種力量上憑藉者不少，就是職工組合。它給我們國民生活裏帶來一種新要素。我們的『勞工總聯合會』，沒有像在他國同類的組織那樣勢力之強，範圍之廣，與影響之大，例如英國德國的這類組織。比較這些國家，我們的職工組合，為數較少，而組織且不完善，但是他們常作前驅者，他們的作用，有如酵母，他們提示的意思，常為我們民主黨的政策所採納。

惟其如此，這些職工組合主義者，要求在實業發展的各國之間，成立更

合於理論的協定。但還有個前提，就是生產者的生活標準，不得因之而低落。他們保衛和平，但同時決心要保衛工人。他們已開始要求干預工人之管理，並且用種種方式實行其所謂工人之統馭。許多分子調和的委員會裏，都有他們的成分。他們創設了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目前活動的範圍，雖尚有限，但前途的希望甚大。這種力量，活動起來，令人感覺它還能在我們民主主義的傳統思想上，加上別的東西，就是散西孟及蒲魯東遺傳於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豐富的思想，有時也被人忘記，而這種力量，則大有與此思想漸形密接之勢。散西孟的信徒說過，『要把人民的政府換成事物的管理，現在就是時候。』這句警策語，甚至連蒲魯東規定的程式，即趨向於彭古爾 (Boncour) 所謂『職業同盟』的程式，都被我們的職工組合重提起來了。

既然如此，我們憑着職工組合主義及其作用，或可看見一種國民經濟政策成立，不是集合式的而是聯盟式的，本着一種聯盟的主義，務求分開政

治與經濟的區域，也就是一種以勞動階級爲基礎的聯盟主義，不必決計要把什麼事都交在國家手裏，只要造成——假使我可以用這樣的語法——實業的國民化。

這却不是容易辦得到的，但這種理想，也值得追憶的，因爲它會影響於法國經濟制度中一般的對外政策。

還有一個第四種的力量，不能不算。這種力量，還可以作許多人的憑依。或者曉得它的人還不多，但無論若何，在這裏還沒有提到它，這個力量，就是合作運動。

合作運動，在法國的組織，確不如在英國之強有力，但已可說有一千萬左右的人，在法國都參加了合作運動。諸位曉得像那可惜作古的基特（Grido）他視這種的運動，多麼重要呢！他是富利葉的傳旨者，是合作運動的使徒。這種偉大的力量，現在還守着靜默，因爲它的扶持者不喜喧譁。

但他們努力地工作，並且扮演國際上重要的角色，諸位曉得，卽如『國際

合作同盟』的任務。

這個國際經濟組織的大政策，也許有一天成爲事實，我誠懇地希望如此，我更想親眼看着它發展起來。到那個時候，凡由合作社代表的消費者之勸告，希望，及要求，皆當不至付之遺忘。

諸位更比我明白，若使諸大生產家私立協定，其中有一個危險，就是他們的協定可以成立在消費者的犧牲上。在國際的協定裏面，合作社必維護消費者的意見，所以在第四種力量上面，也可以建樹出事業來。

假使我可以這樣說，我們把四匹馬聯在一起而駕馭之。——農民，左派，職工組合派，合作派。——法國的政策，將永不能適用什麼體系，那怕是怎麼值得讚美的體系，若把這四種力量置之度外的話。諸位先生，假使你要作寫實派，當你考慮關稅政策與一般經濟政策之間的關係時，你必須想到這種情形。

我並不是說因爲有上述的情形法國要抵抗諸位提議的任何體系。我所難

接受的一種意見，——如同一八三〇年左右，在法國通行的一種與事實相反的論調，——就是說法國是抵抗國而不是進步國，換一句時髦的話說，法國是靜象的國而不是動象的國。我儘可以首肯的，就是若說法國在經濟問題上，是不屬於有革命性的。因為種種力量要把它作成一個謹遵繩尺的國家，保持平衡的國家。它有進步的能力，是無疑的，但是須以許它維持自身的平衡為前提。

我們的科學大家班勒維 (Painlevé) 先生很喜歡說，『你須想法子一面另換路軌，一面不要停止交通。』這正是法國人對事的見識。我們常準備着試行新制，但只在世界——和法國——不失其平衡的時間。

諸位先生！這就是由法國現狀的分析可以提出的結論。在結束中，我喜歡簡單地說明由此現狀所得的一切概念，及我幸得看見諸位在研究裏所取的方向。

讀完繳到本會的這些材料豐贍的報告書，我覺得戰後發生的事實，可視

爲世界衰落的原因。有些挾帶着國家主義的感情，在不少的國裏，這種感情都滋長起來。有些帶着——假使我沒有誤會的話——民主主義的色彩。但是都指出來戰爭的兇暴，及其破壞和平條約之惡果，我請諸位對於此點，細想想。

是不是越悉心考察這種情況，便覺得這些原因越普遍，越真確呢？現在我們自己，不是所謂資本主義體系的見證嗎？這個體系，爲贏利的目的，無限制無秩序地生產，現在產出它最後的果實，但却不盡是可喫的。也許是實，我們所以遇着一個生產過剩的恐慌，因爲生產是不曾有計畫的。也許我們已到一個時期，此時正是那些被龐大實業發縱在世界上的力量，我們不復能駕馭的時期了。

我可以恰好地追溯到一個人來，他還是一個深愛意大利地方的人，就是西斯孟底 (Sismondi)。他在一八一九年，就對於他看着漸漸逼來的生產過剩，倡言防制。也許現在時期已到，應當按消費之可能範圍，試行生產額

之酌定以求其適應。

諸位先生！你們看見我現在走到什麼地步了，是否我就要宣告資本主義的破產呢？我不當走到那麼遠，因為我看不見另有一種體系，可把它的地位取而代之。

最近有人對我說，我們當日少年友生中最近作古的一個人阿爾伯爾杜馬斯（Albert Thomas）當與一個實業領袖人物談話中間，這位領袖人物，正悲歎資本主義的破產，他以滑稽的口吻答說，「也許你說的不錯，但也許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破產。」

倘使這個傳聞是確實的，這並不是說阿爾伯爾杜馬斯放棄了他自至少老服膺醉心的理想，這不過是說，對當前籠罩世界的這種紛亂，他並不認為有任何一種預定的體系，——即如馬克斯主義，——可以立刻適用。必需的支撐力，在兩方面都感缺乏。資本主義未歿，社會主義未生，我們被兩個世界夾在中間，是要尋到一條路徑，在他們的兩間溜着進行，不要讓自

已跌倒。

我喜歡看見作兩種的探討。

要答覆關於關稅政策與一般經濟政策之關係這個問題，諸位的探討，當首先是屬於國民性的，諸位將就各國的歷史遺傳，確定各國民對於政治與經濟之關係的理解。

對於第二種的探討，我要回首到歐戰以前，我要提出幾個問題，就是目前世界的衰落，是否歐戰爲惟一原因，再沒有更深的原因呢？這是不是無政府的行爲的結果，現在急需救藥呢？

至於怎樣救藥，我謝不敏。諸君都是專家，我不過試指一條道路，也許是諸位所願從的。

主席發言：

適纔布戈勒教授所提示的一切，當由祕書處鈔出，送交提綱委員會。

貝克爾拉特教授發言：

我想覓得一句話作爲我演說的引言，但很難覓得比較適纔所聽到的一句格言更好的話，就是『諸位要知怎樣一面另換路軌，一面不停止交通。』這是事之真理，也就是這個問題的全體。

諸位不要詫異，假使一個德國人，說他由斯特法尼教授及亞摩羅蘇教授的演說，受了極深刻的印象。他差不多完全贊同『非改變不可』這個見解。至於我們參加改變不參加改變，那倒可以不問。改變總是必要的，它已開始進行了。

但是這種必須改變的情形，是全由私人營業的獨占造成的嗎？我個人對於這個原素，却不像我們意大利的朋友那麼重視。這個改變的真確原因，當係一般民衆精神上態度的轉移。

我們現在正走向一種社會，這種社會將不復接受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像那從前世界各國都有幾個資本主義中堅人物的時候。中堅人物，原來不多，但他們却是支撐一種特別觀念的柱石。這種特別觀念，依我之見，至

少可說在歐洲大多數的國家裏面，一般民衆永遠沒對它表過同情。這些民衆，現在漸得了勢力，而政治思想，亦與經濟建築失其關係。

於是一個改變就成爲必要了。許多改變的綱領，已經在最饒意趣的情態中，提在我們的面前，但說到另換路軌而不停止交通這個問題，依然還是問題。我的印象，是變化已經開始了，但是同時我們却冒着一種危險，就是眼看着舊日資本主義的體系，行將墮地粉碎，却並沒有一個準備妥帖的新體系來替代它。危險就在這裏。我們將在覓得一種新公式以替換舊公式之前，眼看着崩潰的狀況。

我對於意大利同仁給團體制度的說明，甚感興趣。假使我沒有誤會的話，這個團體制度的目的，是把私人的及集合的利益，在團體組織中作一綜合，以歸還法律道德經濟諸概念之間失去的連索。這樣的演進，在一定情形之下，是可能的。即如意大利，現在就大體說，還是一個由小資產家小技術家構成的農國。人人都得到一個印象，並且可說人人都已確認，這種

制度，根本上不至妨礙私人利益，並且私人利益，因與國家的一般利益不相衝突，益得安全的保障。

在事實上，這確是一個強固的根基，在上面建築不難。但問題於是而起，就是同樣的事，在別處也有可能嗎？

第一件，就是事實指示我們，那建造此種制度者個人的天才，乃他人不能摹做的。此種制度的皮毛，是可以摹做的，至於它的實質，及我適纔所說個人的天才，是不能摹做的。如此，則摹做所得，是什麼呢？

要把我的話講得更分明一點，讓我迴溯到我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的體系。這個體系，並不是單憑它自己的勢力而存在，它若單憑它自己的勢力，它就不會走動。也就像一切經濟的體系，都有一個政治的基礎，因為沒有一個體系不是站在法律和道德的基礎上的，而這個基礎的形態，便是政治的。

資本主義的本身，並沒創造出它的種種基本觀念，但是它看見了，就把

他們抓住，就靠着他們生活。而這些觀念，就是私人權利私人契約的觀念，對於國家干涉，只留下很少的地步，或者直可說沒有留下一點。再則，國際上政治的和商業的協定，也是多與這種觀念相適應。三則，還有一種普徧世界的貨幣制度，即金本位。

資本主義，在這種基礎上工作，爲日已久，假使有崩潰的危險，一定是這種基礎動搖，要使它失立足之地。

資本主義，永遠當得起國家的干涉，但國家無限度的干涉，不免使經濟體系及國家本身，兩受其害。經濟生活，能與國家的干涉或多或少地相調和，只要這個干涉以分明成立的和有界說的政治原則爲基礎。但它不能與武斷而無終極的干涉相融洽，這樣的干涉，久之必陷一切於破產。當國家無秩序無計畫地無處不施行其干涉的時候，私人創作力在經濟基礎上的調劑作用，就成了不可能的。

遇到這種情形，假使私人創作力歸於烏有，國家將不得已而自取生產分

配之權，用一些不相聯貫的和急不暇擇的手段，結果就是一個國家任意干涉的體系。在個人的眼中，就是以武斷的予奪損益私人的利益。這就是說，各部分所有公共的精神，勢將瓦解。他們的演變，就是歸到純粹私人利益的集團，與國家的腐化。

現在在一件事實很顯明的，就是資本主義將不復工作，或至少將很難工作。我所說的資本主義，其所有根本原則，差不多已完全被人拋棄了，雖然我們還沒看見替代這些原則的東西，除去很少的國家，例如意大利。在其餘各國，我們到處遇着一種混淆的不合論理的無秩序的國家監督權之發展，一種用急遽手段造成的裝飾。這種的國家監督，可以把私人創作力摧殘淨盡，但別的什麼事業，却都幹不出來。這種摧殘，將領導我們忽忽地陷於大難。

資本主義，總算給我們做了一件有價值的事業，不論價值的高低。它在一種秩序中滋長起來，這種秩序，與其說是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毋寧說

是建築在法律和政治的基礎上。它的性質，原來就是世界的和國際的。它憑藉在國家相對的中立性上。無疑的，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無論各國的政治觀念和理想多麼歧異，而直至今日，要指出一種有國際性的體系，一種爲歐洲泰半國家的生活之基礎的體系，還是可能的事。

一切對於此種體系的攻擊，都可以認爲正當，但我們同時要觀察事實的眞象。現在有許多的國家，靠着的一種國際主義，維持他們的生命。這種事實，雖屬不幸，然却不能改變，國際交易的連索，若一旦裂斷，決不能免許多國民經濟體系的破壞。這不僅是因各國爲入口的原料出口的製造品互相依賴，並且在事實上，今日整個的生產體系，將陷於一種靜止狀況，倘使這個國際的機構破裂的話。一切事物，都要因之停頓，投過的資本，將歸於烏有，此時想再覓得一點資本，在這個目前朝不保夕的體系之基址上，再興土木，那就不可能了。

仍然還是這個問題，我們怎樣能築成一條新路軌而同時不停止交通呢？

解答稿是不易。假如作一種嘗試，要把國家爲全國利益所定的經濟計畫，與國際經濟關係的維持，調停起來，這是行不去的。

一種國際經濟的體系，怎麼能計畫出來？怎麼能領導前進？假使沒有一點國際權力的話，這就是問題的核心。若既不能建立一種國際權力，我就看不見除過國際協定，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得到一種國際的干涉體系。縱然這種協定的可能性還在各國都採取幾分干涉主義的政策，可是尤其在各國都採取一致的行動，即或不完全一致，但當其屬於干涉的行動時，須彼此能互相調諧。假使營業方面及政治領袖人物的根本思想，一國與一國不同，那麼爲實行干涉主義的計畫而企圖之國際協定，怎麼會成立呢？我個人看不見怎樣可以辦到。

目前世界經濟體系，正在崩潰，信用機構，已經敗壞，貨幣制度，亦淩亂錯雜，以致商業條約的體系，亦有岌岌殆哉之勢。從前由商約造成的經濟連帶關係，變而爲各國相互的決鬥。

即設想我們把意大利同仁發表的意思，接受一大部分，我看不見怎樣救藥目前的災象，除過恢復幾分的自由主義。我們對於已經殘廢的國際體系，要恢復其健康。若各國都從採取團體制度上着手，就須同時改換各國政府的基礎，這種浩大工作，當然需時甚久，我們還須求一種比較速成的功效纔好。

就種種情形看來，我以為現在要尋出路，只有作返回到自由原則上的努力，即多少帶着暫時性也罷。須在自由基礎上，重建商業條約的體系，即恢復對於一長期間關稅率的協定，及最惠國條約。

這並不是說要取消關稅，只要能把它安定住，也就够了。不過要達到安定關稅的目的，又須先使貨幣的體系恢復原狀，使它在國際上先得安定然後可。但這些事情，將無一項有可能性，假使各國間的信用關係，常像目前這樣紊亂的話。信用關係的紊亂，若不調理，則信用的壓力，將重不能勝，因信用不復與穩定而有生產力之投資需要相適應，於是國際支付平衡

，不能維持，國際貿易，將陷於停滯狀態，那就是商業政策的窮途。

假使我適纔所提出備用的三個條件，定當在一最短期間施諸實行的話，那麼，至少歐洲各大國對此須得意見一致，這是顯而易見的。至對於過渡時期種種變通的原則，——如在幾個演說裏面，我們幸已聆過的，——意見一致與否，倒不是我所願饒舌的問題。我以爲目前必須施諸實行的事項，只是比較很少的工作。不過總須得把這一點工作，迅速地着手進行，假使我們要得到實在的成績。老實說來，這不僅是歐洲的物質運命問題，乃它的整個文化的存亡關頭，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亟須注意。

主席發言：

諸位先生！我們現在離散會還有幾分鐘，我請裴德爾森（Pedersen）博士答復英國代表團提出的問題，問丹麥代表，關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之丹國貿易限制條例，自報告書於是年二月底完成後，有無新消息可以示知？

裴德爾森博士發言：

就我所知道的，除過俄國，很少的國家採取一種如此嚴厲的節制輸入手段，就像丹麥一九三二年的條例。此條例我在我的備忘錄註（二）中，已陳述過了。條例的目標有二：凡就近觀察丹麥政策像我一樣的人們，都會看出，第一個目標，是減少輸入的總量，第二個是替換輸入的來源，某國若減購丹貨，丹國必減購某國的貨，而求此種貨於不曾減購丹貨或減購極微的國家。關於第一個目標，在我的備忘錄中，我已聲明，直至那個時候，還不能由統計表裏看出這條例實行的成功，已到什麼程度。但現在我可以說，不但減少輸入的總量，沒有成功，並且以一九三二年三月比較一九三一年三月的輸入過剩，且大形增加。此中理由，我想是輸入商因為須將他們一九三一年已經輸入的數量，和一九三二年預計輸入的數量，開具一覽表，由銀行代呈於輸入部，他們所用的預計輸入，一定比他們能够轉銷的數量大得多。就是恐怕遭輸入部的駁減，先為自己留有餘的地步，輸入部

果然駁減，然留下的數目，似比平常應有的數目還大。

註(一)參看二二八——二四四頁。

輸入不減反增的第二個理由，我想是因爲丹國人對於新策略能維持多麼長久，毫無把握，於是輸入商當此策略適用的期間，務在可能範圍內保持大量的輸入。只因輸入部初次批准的輸入數量，其價尙難恃輸出以抵償，於是輸入部變其政策，對於將來數月的輸入數量，加厲的削減。這就是說製造品之輸入，在將來三個月內，只能當去年這三個月輸入之一小部分。我不用說，從此輸入業上要發生出大騷動來，同時這個控制輸入策略之第一目標，也要動搖。

關於第二個目標，這個策略，比較有效。許多輸入的來源，已轉移到別的國和英國，這是實在情形，供給丹國輸入的國家，昔以德國爲第一，現在德貨的輸入，減少得多了，而英貨的輸入，仍維持其原狀。這個控制輸入策略之原則，是以與各國維持原來輸入與輸出的關係爲常軌，就是說維

持一九三一年九月發生的金融恐慌以前的關係。結果，許多的輸入來源，都轉移到英國，因為丹麥輸出於英國的貨，就價值及數量而論，都保持在差不多在與昔時一樣的水準上。

在結束以前，我還要對這種策略的影響說幾句話。就此策略在丹麥國民經濟上的影響說，我應當指出一件事實，就是限制外國製造品的輸入，如織品，靴，鞋，及同類的貨物，可使丹國的生產能力，得供較好的利用，這就是我所稱有益的影響。但一面有害的影響，也顯而易見，其中有如下述的情形，——當這種策略在一長期間——假設一年——繼續實行的時候，不但所有的能力得供較好的利用，即工業設備亦必增加，因所需的外貨日減，丹國現在所有的製造廠，不足以供消費的需要，因為有現行的策略，國內經濟將有一新發展，設一旦廢此策略，則新發展的經濟活力，必至衰落，假使無另一種限制的策略——如足以禁止輸入的稅率——以代之的話。這就是說，倘使這種策略若用之稍久，再想取消，是很難的。我說或

可用稅率替代，但諸位可想而知，要抬高稅率足以與我們現行的輸入限制之效用相等，仍是很難的。

我還要指出由這種策略發生的另一個重大影響。當丹國對於本國不能生產的輸入品加以限制時，這種物品，在丹國的價格，必高漲至在國外的價格以上，這是很明顯的。此種現象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將給輸入者以很大的且不應得的非常利潤，或不得已而限制此種物品的消費。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還不甚注意，因為在事實上，已往的輸入，尙未曾限制，但設使這種策略，行之有效，且能維持於一長期間，此種結果，殆無法避免。

所以設我們對於被限制輸入品之銷售者，不許其收穫逾分之贏益，我們就要接觸着限制物品消費的問題，因為這種策略的施行，使物品不自然地減少。

這些情形，都將由這種策略的實施發生出來，釀成重大的騷亂。但我以為要在一長期間維持這種策略，將不可能。現在已激起來很大的反抗。本

來這種條例，要切實施行，一國的輸入，無論巨細，要受監督，要經許可，即非不可能之事，也是很困難之事，有常識者皆能見及之。這是一件宏大的事業，我不信他們能作得恰好。雖然，這不是因為施行者權能的缺乏，却是因為與此事自然連屬的困難。我更以為此制若能廢除則甚善，因為我恐怕他國都仿行起來，益擴大其範圍，則整個的世界經濟，皆將蒙其不利。

主席發言：

我提示明日早晨，我們再來，對於鐸爾東博士提出之第一問題，作簡短的討論。今日演說記錄的譯文，當在明日討論開始以前傳觀。

第三次研究會議，——星期二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開會，羅誥教授
主席。

主席發言：

我們現在繼續討論鐸爾東博士提出的問題。

克爾夏格爾教授發言：

商業政策，猶如關稅政策，皆只能作一般經濟政策之一部，我與意大利代表意見相同之點甚多。經濟計畫問題，可以在國際及國民兩方面分別討論。經濟計畫，發端於國內，與貨幣政策有一種密切的關係。商業平衡及國際支付平衡之細差，乃各國限制國外貿易最重要原因之一。再則，貨幣膨脹、足以破壞一切商業條約，形成一種『達冰』政策。經濟計畫，又與財政方略有密切關係，例如不求賠償問題和各國戰債問題的解決而求恢復健全的國際關係，我們確信為有可能性嗎？我們試想，有的國家，每年的支付，比它全國所存的現金還多，而其應支付的總數，比全世界所存的現金，大至六倍以上，這種情形，真能助成健全的經濟平衡與常態的經濟關係嗎？

返回到較低的稅率，是不可能的，但我不信那條向較低稅率進行的路，

是要經過商業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我看那以限額輸入爲目的協訂，及地方集團互惠的締約，就是初步的組織。假使有人認爲惟一可能的決案，就是自由貿易，那麼，他就不得不承認那條向自由貿易去的路綫，還是要經過比較自由的國際貿易，要經過各個集團協同的組織與比較自由的經濟關係之建造。最惠國條約，已逝世了，或可說正在彌留的時期。以限額輸入爲目的的協訂及地方集團互惠的締約這種辦法，將創造出許多的例外，使最惠國條約，或不久幾於掃地以盡。

同業聯盟，現在與商業條約的關係，極爲重大。他們常常引起限額輸入的條約，例如在鋼鐵煤炭等實業裏面。再則，在許多情形之下，他們已較關稅政策的勢力强大得多，卽如最近在美國的關稅會議中，許多脫拉斯的委員宣言，謂在目前的情況中，關稅對於同業聯盟，視從來乃爲關係最少之問題。雖然如此，但是同業聯盟，由補助關稅政策而進於替代關稅政策之程途，現在還很長着哩。

最後，讓我把我在此看出的一點意思說出，現在的會議，表示出自由主義與干涉主義兩間的激鬥。由這兩種意思發生的急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僅從經濟的觀點上尋得出路。我們接觸着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憲法問題。這種種的問題，顯出我們討論的範圍，並顯出我們所可得到的一切成績的範圍。一切自然科學，——說句亞里士多德的話，——都要在形而上學裏得到究竟。在那個程途上，我們不能希望一個人以自己的見解，屈服別一個人，但我們可以希望達到一種較好的互相了解。果能如此，已算很大的成功。

蓋奔博士發言：

我想說的，就是這一個問題：我們應斷定稅率決不能趨於低降呢？還是認為有低降之希望呢？

在北美合衆國，——這是全世界認為高稅率之領袖國，——就一九三〇以前兩年的關稅情形尤其是就一九三〇年以來的關稅情形看來，在主張減

輕稅率的同志們，並不認爲前途絕望。

讓我指出幾件作美國關稅現狀之基礎的事實。第一件，當美國稅率被一九三〇年之關稅條例提高時，有一本請願書，簽着一千多經濟學家的姓名，——實際上就是美國全國的經濟學家，——力勸總統勿署名，於提高稅率的條例。他們並不要求自由貿易，但他們以爲美國應當起首減稅的時期，已經到了。

第二件，一個比經濟學家的意見更富有意義的事實，表現出變遷的可能性，就是一九三〇年提高的稅率，被幾種據領袖地位的工業，也極力地反對起來，汽車製造業在阻撓新稅率運動中，極形活躍。因幾個供給輸出的製造業，覺悟到他們的利益，要受一九三〇年高稅率的妨害。

第三件，我們應當迴憶的，特別是自歐戰以來，美國的實業，大量地移徙國外。現在歐洲有美國公司四百餘家，其中許多在最重要的實業裏面，露出崢嶸的頭角。這些公司，在歐洲建立工廠，並分設支店。他們就是因

外面的關稅情形，所以移徙。這種事實，在美國關稅情形上發生的影響，就是凡移徙國外的美國大工商業，將不肯再作美國高稅率之熱心擁護者。

這三個集團，——經濟學家，供給輸出的主要實業，及移徙國外的實業，——直到現在，却沒有組織起來，共同反抗一九三〇年稅率的提高。待營業狀況比較略復常態的時候，大約種種與增加關稅相衝突的利益，（不僅經濟學者，）將有一種組織的端倪，在美國出現。

還有一點，應當注意，就是美國的關稅問題，漸漸與政黨問題，脫離關係。反對保護稅率，昔時為民主黨的政綱之一，民主黨因在最近選舉中，與在目前的爭論中，努力地護得了一種地位，於是共和黨中之主張改善關稅者，從此也可說，『讓主張改善關稅的同志改善之。』

歷史上相類的事實，若推論起來，未免太廣遠了。但美國現在的情形，

與拿破崙戰後的英國情形，真有驚人的類似處。諸位當然記得在一八二〇年中，英國王黨的某大臣，居然實行減稅。我想在美國也可以有類似的減

稅舉動，——假使我們沒有最近的恐慌的話。也許十年或二十年後，美國的地位，發展到與英國一百年前趨重農業利益的地位相同，這並非不可能的。美國的農人，仰關稅作他們的保護，久成習慣，且因美國漸漸失了農產輸出者的地位，農人將作農產高稅率的後盾，於是英國穀物條例之爭執，將再見於美國。不過這是一種頗饒意趣的猜度，在紛紜變化的世事中，沒有一種歷史上見過的情況，和盤再托出來。尤其是倘使像我們在這裏所聽得的全世界都向一點趨進，或有意向着一種解決的方法趨進，即連合關稅區域及閉關自守的國家，構成較大的稅區單位。那麼，美國也自然不能循它演進的常軌上走。但說到我們現在的觀點，——說到輕減稅率之可能性，——在美國的立場上，我已說明其有可能性之種種理由，而對此可能性完全不解者，信未之察也。

鐸爾東博士說送到本會的報告書，現出三種區別。但還有一個區別，在會議的討論中間現出，就是有些是着眼於將來，提出新的可能性，或新的

組織，有些只論及現在的恐慌。有一種嚴重性的危險，是考慮將來的政策時，不免爲現在環繞我們晦暝的空氣所籠罩。我們或猜想逃出現時的困難，走到統制的國民經濟上，只有很短的路程，其實比較要長些。我信得自由競爭的體系，其彈性比較宏大，且將顯出一種能持久之生活力，似乎幾個發言者尙想不到。計劃的國民經濟，其初步離不了艱難與錯誤，不過反動的力量與經驗的過程，都是需要的，且將使我們得到教訓。

我喜歡聲明一點，在此次會議開始時，我聽得有今年秋季舉行經濟會議之宣告。我因對此舉關心甚切，故仍惜其舉行期之不早。目下有一種經濟的危急，經濟史家從沒有見過比較更大的，就是信用的大恐慌。這個恐慌，已瀰漫世界，急待國際的救治。但關於美國政府對召集此經濟會議之邀請，如何接受，尙未得到消息，所以要知它在歐洲會議裏面，將持若何態度，是很難說的。我相信美國當有充分的明智與善意，看到它自己的利益，就在制止國際的燎原之火。但它自己的屋宇，正在焚燒，要它想到以救

別人家的火爲自救的前提，也不容易。美國的輸出，現在不及一九二九年三分之一，它的國外貿易額，總計起來，就說退回一九一三年以前的原狀，尚有遜色。照現在進展的程度推定，從今年年終起美國國外貿易的數字，在將來的四五年中，還要不斷的退減，這還不算美國所遇到的唯一的嚴重情形。世界上物價的體系，信用的體系，美國也不能離開，一定要感受他們破裂的反響，這是它確已曉得的了。現在的問題，也並不在『美國的國外貿易總額，是否只占其國內生產總額百分之十，或差不多是這樣呢？』美國已開始覺悟世界恐慌的衝動，世界信用的收縮，沒有一次與它不接觸的。

還有一點，美國對於一大問題，不但有理想上的關切，並有實行上的關切，這問題就是和平問題。現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所苦的恐慌，當然要溯源於歐洲戰爭，並且還有武力戰爭後的猜忌戰爭，讎視戰爭，相繼不絕。我們感覺到要恢復經濟的昌盛，須待世界返於和平，或至少到看見和平漸至

的時候。我深信將來的盧桑會議，當能給和平以有力保障的允許，那就把美國參與歐洲經濟問題的關係，可以保證泰半。

賁罕穆博士發言：

現在時勢的嚴重性，已不待鄭重地聲明了。我們都知道有二千五百萬人或至三千萬人，現在沒有工作，世界上半建築的業務，陷於停頓，各國的輸出，按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實際上都減過了百分之四十。假使我們向事實的正面看去，直可說一片烟霧中沒有一縷兒光明，我真看不見任何一點光明。我看前途，假使沒有一點救濟的舉動，似乎還要一天比一天更壞。在德國和別的國裏，人民正談論着國民的自給化，人民正在說，債務不會償還。農國國民，自然能够生活，農人憑他的田地，就够生活，但大工商業的國民，將幹什麼呢？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看不見有領導者，能帶他們到某種決定的路上去，像經濟計畫這條路。我們有很富教益而又饒趣味的例證，就是俄羅斯與意大利的例證，我想這是值得細心研討的，但是

若說別的國民，也可向經濟計畫這條路走去，這種提議，在我個人視之，却懷疑甚大。假使我們觀察目前衰敗現象的原因，現在已普遍地承認了其最大的一個，是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美國信用之大膨脹。在這個技術進步生產異常改善的偉大史期，天然的結果，應當是物價漸降，使生產改善之利益歸於消費者，乃竟不然，聯邦準備銀行，乃在這個經濟體系裏，不斷地膨脹信用以保持物價的高度，物價於是堅定。然而製造家生產家却由此得到日巨一日的利潤，因為他們的成本，雖然沒有增加，他們生產品的售價，雖然也沒有增加，但是他們由每一個單位的勞力所得出品的單位，却增加了。

一九二九年，信用由大膨脹而崩潰起來。物價的跌降，不是緩緩的來，在一九二九年內，居然是一落千丈強，並且因為全世界都算金本位與國際貿易相牽連，於是全世界都感受物價跌落的影响。我想這話是現在公認的了，即前星期的泰晤士報，亦接受了這一點，所以我們現在可認此為毫無

疑義的事實了。這就是經濟計畫！——一種深思熟慮務維持物價於不墜的企圖。

當一九二六及一九二七年間，尤其是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間，各種的組織，如『圍場』，『同業聯盟』，都設立起來，以保全諸生產者的利益，——保持錫銅咖啡及其他種種物品的價格。在一個時期間，也得了成績。這些貨物的生產，繼續着前進，於是積貨日多，及破裂之聲，一旦暴發，令人設想若無前此一時之成功，其害尙不至如是之烈，蓋積貨當不如是之多也。惟狃於一時之成功，恃種種組織爲保障，生產愈進，積貨愈多，迨一旦恐慌降臨，勢必愈厲，這就是經濟計畫！

有的國民，對於他國的競爭，設立科學方式的種種稅率，人人都承認這種方式，只有使衰落的現象，愈趨惡化。這就是經濟計畫！

有一個聯邦農部，收買餘麥，擲去幾百萬元。有一個坎拿大的合資壟斷組織，虛擲了金錢，而又因麥產過量時維持麥價，加重市面的恐慌。這也

是經濟計畫！

我說我不信所謂經濟計畫，我知道人們怎樣地辯駁，人們要說我所指的經濟計畫，不過是部分的計畫，並不是整個的計畫，惟有整個的計畫，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對於這樣的答辯所要說的，就是這種思想，並不是什麼新鮮的，在法國和在別的國家，早就試行過。當十八世紀之末，國家厲行干涉一切的計畫，遇着一種反動力，於是一個大解放的運動，開展起來。新式的生產，比較適合的組織，纔得了可能的機會，引起了工業的革命，造成了我們所處的物質進步的現代，這都是由於對經濟計畫這個舊思想的反抗得來的。現在有些人民，却正在努力企圖這種舊思想的復活。

人們一定還要答辯說，我們不能把鐘點倒轉，我們有獨占事業，有職工組合，有同業聯盟，有關稅壁壘，我們已邁進得遠了，我們決不能倒退的。對於這種論調，我有兩層答覆，第一層，最有效的，就是我們能倒退起來。我知道很清楚的一個地方，——奧斯特拉利亞，——在那裏，工資率

的強硬性，職工組合的雄健，獨占事業的操縱力，皆任何他國所不及，這些勢力，都破壞了。惟這些勢力終於破壞，而奧斯特拉利亞乃有再生之慶。這樣的事，原可以做到的。我的第二層答覆，就是在這個恐慌的中間，當事事益趨惡化的時候，當歐洲中部的暴動，革命，戰爭，等危機，勢將一觸即發的時候，要談起採用一種經濟計畫，不是應付目前事實的辦法。當你的家屋正受着颶風摧毀，還談得到整理家屋嗎？

因此，我對於鐸爾東博士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這個關稅政策，難以與經濟計畫，合為一體，因為稅率一經設定，就有從此發生的利益，所以不易輕減，而一方面經濟計畫，有時却不免有減輕稅率的需要。但這不過是學理上的一點爭論，我個人的意思，對於經濟計畫整個的思想，尤其是在目前的狀況之下，並不贊成。

說到稅率，我想現在的稅率，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稅率，和輸入的限制，及限額輸入。有許多國家採用此種手段，勉強維持其金本位，保護

他們的貿易平衡。絞絕歐洲的商業，就是此種手段。他們有一種恐怖，以爲若不這樣做去，將陷於狼狽狀況，他們的資本將流出國外，他們的國民將宣告破產。我覺得假使通貨的大收縮，與成本的大節儉，確是維持金本位必要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實際上却不能暢行無礙，（看來似乎不能）那麼，我爲他們悼惜。我覺得他們不如就完全離開金本位。這一轉移，在相當的範圍內，可以贊助貿易的恢復。他們恐怕資本流出，但匯兌漸漸跌落，即足以妨礙資本之流出。且經過一時期後，迨人們悟到英國所爲，有仿效之可能，（我可不是以此驕矜）即離開金本位，讓匯兌降而又降，而却不至使通貨膨脹，——英國未曾使通貨膨脹，——那時資本自然會漸漸回轉本國。

這就是我對於第一類厲行異常高度保護稅率以保障貿易平衡者貢獻的意見。

說到第二類，就是加於製造品的稅率。我贊同一種見解，謂對於製造品

制定之稅率，無大關係。在大製造廠林立之工業國，這問題更無足重輕重，當此種稅率變動時，其量有增至一倍者，但大部分却無嚴重性。我不爲製造品負擔關稅的問題，自尋苦惱。

第三類，實際上乃一重要而有長期性之問題，卽加於農產之稅率是也。這又是很重要而且很困難之問題。我們曉得歐戰以後，分明是一個農業革命的時代，農業已機械化了，藉物質配合的發明，新麥種的選擇，及其他類似的方法，新世界可以出大量之麥產，比較歐洲舊式生產的成本，價便宜得多。於是歐洲農夫，遇着新世界大機械生產的競爭者，源源而來。歐洲各國，爲保護他們的農村生活，爲保全他們的農民，把加於麥產的稅率，愈提愈高，他們把輸入的數量，愈縮愈小，所以現在倫敦及羅特爾丹姆的麥價，一跨特要二十六先零，巴黎柏林的麥價，一跨特要八十先零。農業生產方法之改良，於茲二百年矣。但是最近十年內，則有一日千里之勢。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因人民需要這些比較粗糙的食料，本

來有限，於是供給世界這種食料的人民，越無用的多了，農業上用不着的人民，只好去製造那些增加生活舒適的物品及奢侈品一類之物。英國近數年來，因得了海外廉價食料的供給，微微得了一點便宜，若法國德國意國却沒有占到便宜。誰把便宜占了呢？消費者出錢日益多，有時所得的物品且愈壞，農夫及農業家的地位，也不見得較強，他們譬如落水，僅僅能把頭顱露出水面，雖然有強大的保護，是為他們而設的。由農業機械化可取的利益，却有些國家不願接受，這是根據一種非經濟的理由，即保存農村生活與農民。但雖然如此，而農村生活與農民，仍走着崎嶇坎坷的路徑，因為不願利用近十年來技術進步的好處，所以把便宜枉丟了。這是一個有長期性的問題。

什麼是可做的事呢？我到了第二個問題的第二部分了。要知道奧達瓦會議有無在不列顛帝國統治下造成一種經濟統一的希望，這許是一個有興味的問題。我只能發表我個人的意見，我以為沒有一件重大的事，可以作得

到的。據紙上紛紛的談論，可想見他們將來爲表示並非『一事無成』起見，也許在乾枯的菓品上，協定幾條優待的稅率，也許創造一個永久的帝國祕書廳。但什麼事都做不了許多，因爲有兩種理由：第一，就是帝國各殖民地，自歐戰以來，都公然地藉高率關稅的保障，培植他們的製造業，他們對於大不列顛的優待，有如以下情形：他們把一杯好酒，遞到大不列顛的口頭，但他們又給外國人遞去兩杯，於是他們說，『看看，這是我們對於大不列顛的優待。』他們的對象，是保護他們的工業，所以對於大不列顛與他們工業競爭的出品，稅率之高，實足使他們的工業，躲藏在壁壘後面，發展起來。他們的工業家，不肯許那種稅率有很可觀的輕減。一年前坎拿大的某總長曾有一種切實的提議，允許對大不列顛製造品，給以減稅百分之十的優待，可是他的意思，是假使坎拿大的普通稅率，定爲百分之四十的話，大不列顛的貨物，可以照百分之三十六納稅。——百分之四十對外國貨物，百分之三十六對大不列顛貨物，這就是對於大不列顛的優待

！——這種優待，當然是一種不具體的敷衍而已。這就是第一種理由。英國殖民地，因為保護他們的工業，不能讓出什麼地步，值得費商量的時間。

第二種理由，有點技術的性質，就是大不列顛帝國大半的出產，都有輸出不了的剩餘。我可以取一種貨物，藉資說明，我的意思。就拿麥產說罷，坎拿大與奧斯特拉利亞兩地輸出的麥，合起來是大不列顛消費不了的，這有什麼意義呢？假使大不列顛對他們宣言，『我們對他國輸來的麥，要提高稅率至百分之百，或至十倍，或禁絕他國的麥進口，我們專讓坎拿大與奧斯特拉利亞的麥輸入。』這於坎拿大與奧斯特拉利亞毫無益處，當他們兩下相互的競爭不停時。因為他們兩下輸出的麥合計起來，總是大不列顛消費不了的，無論如何，一部分的麥產總要輸出他國，假使坎拿大與奧斯特拉利亞的生產者能由大不列顛得到他們在別處所不能得的優待，他們定然儘量的向大不列顛輸入，於是英國市場上坎拿大及奧斯特拉利亞的麥價

，將同時跌落在世界麥價的水準上。因為坎拿大與奧斯特拉利亞輸出的麥，合起來總多於大不列顛消費的需求，只有一個方法，使他們可以都得到便宜，就是他們兩下若合起來，作一種壟斷的組織，以敲剝大不列顛的消費者，那就可以利益均沾，但在政治關係上看來，那是辦不到的。

因為這兩種理由，我看不出奧達瓦會議能作出什麼重大的事來。

這樣的觀察，領導我到另一個觀點。我希望一位中歐的同仁，把這一點加以充分的說明，這一點就是輸出的過剩，使這曾經提議的丹牛波聯盟，成爲不可能之事了。奧大利，捷克斯拉夫，匈牙利，西哥斯拉夫，魯馬尼亞五國的聯盟，是不可能的，至於布加利亞，離可能性更遠。要勉強這樣作去，你們須拉攏一個大國，或是德意志，或是意大利，因為若沒有德意志或意大利這個丹牛波聯盟的諸國的麥產輸出，只有過剩，而聯盟的對象，却就是農村與農人的保護。

我不願費本會許多時間，談起構成一英國幣制疆域之可能性。有許多技

術上的問題，包含在內，我不信在事實上從那裏能得到許多的好處。一個英國幣制疆域，當然不能說就是自由貿易的疆域，以英國幣制封鎖起來。但無論如何，他國的利益，不能與大不列顛的利益，完全符合，我想他們若把自己的通貨，束縛在英國幣制之中，未免鹵莽。在事實上，我想他們不出此舉。

爲作一結束，我可以把英國一個很誠懇的週報義可諾米斯特中幾句話敘述出來。該報提出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發的問題：『什麼事是能做得到的呢？』該報的立論，乃是完全站在英國的觀點上，這也是當然的。它的大意，是說：『我們不要害怕那個在過去時代曾經我們適用而收效可觀的最惠國條約，將遭變動。英國有力的意見，所主張的變動，不過是這樣的：因爲我們既有了保護制度，我們不妨把最惠國條約，僅作爲調劑輕重的權衡。大不列顛依然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爲什麼不許大不列顛給某國貨物一種優遇，與某國對大不列顛貨物所施的優遇一樣呢？在理

想上，爲什麼大不列顛不能對他國——就說丹麥罷——說：『我們許你們的貨自由地進來，假使你們讓我們的貨自由地進去。』不過那是一種理想，這種理想，恐怕不能實現，因大不列顛內部政見的關係。但是要一個國家對於無論何國的貨物大開門戶，與要一個國家對於某一國的貨物大開門戶，這兩件事是截然不同的，卽如以百分之十的稅率作基礎，設想大不列顛宣言，『無論何國，若許我們的貨物以最高度百分之十的稅率輸入，我們也讓他們貨物，以最高度百分之十的稅率輸入。』這並不是不能實行的事，我知道有幾個大國，已經向大不列顛政府提出互惠條件，雙方意見，已多接近。假使大不列顛就遵這條路前進，——我想英國輿論，亦當對此表示歡迎，——這種接洽的作用，當能遏止那一片行將淪沒世界的潮流。

摩爾達拉教授發言：

諸位先生！我們的同仁斯特法尼教授與亞摩羅蘇教授對於國家干涉經濟

生活這個問題，業已在概觀的立場，發表過意見了。但還有一個具體的問題，列在本會的議程上，是要指出關於國家干涉的事實，尤其是有對外影響的干涉，影響於國際貿易的干涉。在這個範圍內，我要把意大利的政策，在作預備性質的幾點觀察以後，揭其概要。

我們可以說，意大利不能與別的國家脫離經濟關係而獨立，乃天然限之。它的大部分領域，都是重巒疊嶂，土地生產力甚薄，地下礦產，亦甚缺乏，人口稠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有從他國尋求大量物質，大量食料。為支付輸入品的代價，我們還要輸出國內的產物。假使我們要他國對我們的貨物開放門戶，我們還要避免過度的保護政策。

再則，意大利因它的地理關係，常負着國際交易的媒介任務，不但在經濟上，並且在智識上。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同昨日自由主義的意大利一樣，充分地準備着工作，為掃除國際關係上現存的障礙。——這種傾向，已有一個顯著的表示，就是意大利的法律，關於客籍的待遇，務取寬大主

義。

歐戰以前的稅率，有兩種對象：第一，爲意大利的工業，設立和緩性的保護。當時意大利的工業，與美英法德相競爭，有兩大弱點：一是幼稚，二是燃料與金屬的缺乏。

第二，它傾向於保護幾種農產，因它被海外農產國的競爭所威嚇。這種保護的作用，在國經濟活動上，其實爲力甚微，因爲有許多存在的國際協定，並許多與他國締結的商約中含有最惠國條約。

歐戰以後，這雙層保護主義的波浪，起於美國及中歐新建的幾個國家，於是把意大利也捲入漩渦。承認意大利是受他國對於意貨進口的限制及對於意僑入境的限制所逼迫，不得不謀自衛，這是分明的公道。

還有一點，戰爭明示我們過於依賴他國供給的危險。意大利政府認爲應當告誡國人，對於國民生活需要的貨物，宜培植本國的生產業。

一九二一年的稅率，由一個屬於自由派的某部長提出，雖不免是一種保

護政策，但比別的國家，尤其是比較美國的保護程度，終屬和緩。事實上，因為最近十年內，與他國締結的通商條約，——條約曾經列表，分送本會同仁，——使這種保護政策，和緩到很廣大的範圍，按一九三〇年工業出品負擔的稅率計之，在意法德三國，都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在美國提到百分之四十，在西班牙則尤過之。

還有一件應指出的事實，就是意大利的支付平衡，與我適纔所說的幾個國家不同。因美國坎拿大及奧斯特拉利亞對於僑居的意民，厲行限制，意僑由國外匯回的款數，大形縮減。這宗匯款，曩時在我們的國際支付平衡上，實補助一重要部分。因我們支付平衡維持的必要而增加關稅的收入，這不能不說是正當的。

最近兩年來普遍的經濟恐慌，對意大利更有重大的影響。一則意僑儲蓄減少，寄回之款愈少，再則遊覽意大利的外國人減少，意大利所得他們揮擲的金錢益少，同時這個恐慌，減少了我們的輸出，在這些輸出品中，生

活必需品只占比較很小一部分。

再進而言之，我們看着外貨在我們的市場上有加無已的競爭，不能不限制輸入以維持我們的支付平衡與通貨安定，於是有幾種關稅，曾經加重。麵粉房屠宰場需要的原料中，國產應占百分之若干，亦曾經法定。

一九三一年英鎊與其他通貨的貶價，使我們愈感覺保護國內生產之必要。因為貨幣貶價的國家，或採用達冰手段的國家，都能以較低價格，在我們的市場與在別的輸入國的市場上，競銷他們的貨物。國家預算的入不敷出，其結果使政府對於未受國際協定束縛的稅項，更進一步地加重。這當然不算保護的策略，乃係財政的策略，因為就這些負擔重稅的物品說，即我們工業上需要的原料，也在其內。一種策略，使我們的工業，比較他國的工業，立於不利的地位，很難當起保護二字。

由我所說的話，可知意大利輸入品負擔的稅額，比一九三〇年要大些，但這是各國共同的事實，雖英國的稅率，也在百分之二十上下。

就全世界保護政策的程度而論，意大利商業政策的目的，永遠是對於國民生活及國民防衛必要的貨物，給以和緩性的保護。這種保護，被許多商業條約及最惠國條約的適用，減去許多的力量。在最近數年，種種避免不得的障礙，攔住我們貨物輸出及人民移徙的路，結果還只有增加關稅，且因維持通貨安定及國家度支平衡的必要而關稅益加。

至於特別優待的關稅及互惠的制度，意大利可說是從不採取的。這種制度，在概觀上，是禁絕的。或者在意大利與奧匈最近締結的商業條約中，不無這種例證，但這是無關重要的例外。

我們接到質問，要我們報告關於意大利鼓吹抵抗外貨的消息。意大利並沒有這種的鼓吹，並沒有抵制外貨的舉動。意大利固然有購用國貨的鼓吹，但這不是一樣的事。即如日本人在中國遇着抵制日貨的運動，英國的人民也受着消費國貨的激勸，這是兩種完全不同政策，在他們的實行上不同，在他們的作用上亦不同。

在意大利公家需用的物品，若國貨與外貨價格相等，條件相同，則國貨有優先供用之權。並且在私人方面，多購國產少用外貨之宣傳，亦甚形活躍，但我不信這種宣傳，能在國外貿易上發生重大影響。

結束起來，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國際經濟政策，永遠屬於防衛的性質而不屬於進攻的性質。

我們又接到一種質問，是關於意大利企圖壟斷外國市場的消息。意大利在它的立場上，實在沒有過錯，它並沒有幫助國內的實業侵略外國的市場。我們並不知有國家發給輸出獎金的例證，除過在最近數月內，發過米產輸出的獎金，因世界市場上糧價的大落，所以給米產輸出一點補助，不過這筆補助費還由他們生產者自己供給，並不動國家的公款。

在此種關係裏面，我還可以指出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意大利對於絲產的輸出，絕對沒用過一點獎勵的手段，雖然在恐慌的期間，雖然絲產久已為意大利輸出品的大宗。

關於輸出的貸款，我只能給一個例證，就是對於向蘇俄去的輸出貨物，發過貸款，我再不知別的。

還有人問，關稅在意大利團體制度的國家內，占着什麼地位。在國際的立場上，團體制度的國家，大概與自由主義國家，地位不變，它不能急遽地變更它的政策。意大利的關稅政策，受天然環境的決定，而今日團體制度的意大利所處的環境，與昨日自由主義的意大利所處的環境，許多情形，仍是一樣。不過無論若何，總是由國家決定保護之可否，並決定保護之限度。

但有可注意的一點，在原則上，自由主義的國家，宣告對於生產中任何部門，不施特別優獎，團體制度的國家，則宣告它以全國國民的利益爲前提，要對於生產中最有用的部門，施以鼓勵。實行上自由主義的國家與團體制度的國家，在許多地方，都走着一條道路。

且在團體制度的國家，各方面的利益，都有他們的代表。這種有組織的

代表機關，對實行一種稅率的作用，容易討論，且容易預計。用這種關稅的武器，要使全國各部分經濟的活力，互相調和，比較容易得多，因為把他們知道得比較清楚。

我們再想不出別一種方式的干涉，因為團體制度的國家，是把國際貿易，完全付之於私人自動的。假使我們在一方面一觀蘇俄的組織，我們便看見在它的商業政策及方法上，有一整個的變化，這種變化，能使國家享有國際商業的獨占權，在意大利却絕沒有這種情形。團體制度的國家，在它節制與調和對外之經濟關係的工作上，所有可用以活動的工具，仍與自由主義的國家無異。

蓋奔博士發言：

關於美國輸入的稅率，可以讓我提出一點小小的正誤嗎？摩爾達拉教授所給的數字，是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二九年，我們輸入稅的比率，乃係百分之四〇·二，至一九三一年，乃提至百分之五〇·九，——增加了百分

之一〇有奇。但有應當聲明的一點，就是納稅的輸入品不過占美國總輸入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三一年，美國免稅的輸入，達總輸入的百分之六六·七，換句話說，美國總輸入的三分之二，是免稅的，這三分之二的輸入，大部分係原料品，其納稅的三分之一，大概是製造品。

勿爾斐爾斯博士發言：

諸位先生！在昨日的議席上，似乎在意大利會員與德意志會員之間，意見大不相同，意大利的斯特法尼教授與亞摩羅蘇教授，都是極端的樂觀者，德國諸人，却是極端的悲觀者。

但今日聽過摩爾達拉教授的演說，我覺得我可以顯示兩方意見的歧異，不過是表面的，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根本無涉。

在我們所討論的國際貿易的立場上，意大利的意見，可以這麼解釋：意大利為團體制度國家的利益起見，不取我們認為於國際實業國際貿易有危害的策略，例如區別的稅率，及輸入的限額。它的目的，不是造成一個自

給自足的經濟體系。摩爾達拉教授已經說明，關於國際貿易，即法西斯蒂制度下的意大利，事實上仍遵着自由主義的政策。如此則意大利的樂觀，不能伸展到國際貿易的範圍內，到區別稅率的手段上，到過激保護的政策上。而這種手段，這種政策，不幸就是我們正在過渡的這個時期內，國際經濟關係上最普遍的現象。

我們聽說在意大利國內，資本主義體系裏的種種困難，都掃除了，這是團體制度國家的策略使然，即如在勞資兩間的關係裏面，許多饒有意味而關係重要的事實，我們都已明瞭，但這並不是我們今日所討論的題材。

本會議所討論的，乃是國際貿易。就是在這個立場上，我們對於各國互相應付的策略，表示一種悲觀的態度，意大利與德意志在此點上，似乎同情。我從意大利方面，沒聽得一句話，能使我們設想那曾經伯克爾拉特教授指出的種種策略，獨不利於其他需要輸出與輸入的資本主義國家而無妨於團體制度的國家。

根據我們所聞，團體制度的目的，是一種經濟計畫，可是我們所看見在國際關係上出現的事實，却完全是與經濟計畫相牴觸的。國家與國家，相牽引而又相抵抗，並沒有一種共同的計畫，普通的情形。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上施行干涉，談不到『計畫的』倒可說是近乎無政府的措施。再進一步說，我倒很贊同賁罕穆博士，當他用滑稽的口吻說到美國及其他幾個國家的情形時，他說『這就是經濟計畫！』我不知道在意意大利發生的情形，是否有點不同？維持物價於一定水準的策略，我以為不算一種經濟計畫，乃一種保護，施於某某集團而應利於其他集團。這些『計畫的』策略，沒有開關達到一種新秩序的途徑，倒加重了現在的恐慌。

在我們這裏的討論中，我不憚再三地絮聒說明，與我們有關係的唯一問題，就是國家在國際貿易上的舉動。在這個立場上，我們現在不是要指陳自由貿易之利，以對抗保護政策之害。我們差不多都確信保護政策已經降臨，不肯匆匆告辭的。這裏的討論，乃色彩不同的干涉主義者之間的討論

，有色彩濃厚些的，有色彩輕淡些的。

又應注意者，保護主義者與干涉主義者兩間的辯論，或可達到意見相同的一點，公認某種干涉策略所生的影響爲有害，卽如限額輸入，或區別的稅率。我們可惋惜的，是廢棄能維持長久的條約而專用時時可以更變的條約。

保護主義者與干涉主義者，不至於冒被人指爲空談學理無補事實的危險，像自由派的樣子，儘可努力以求趨於一致，不要離開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因爲資本主義體系的原則，無論在何時須得尊重，卽在全世界正在過渡的困難期間，卽在保護主義及干涉主義的國家，亦當如是。

卽如最惠國條約，應當是國際貿易體系內一種必要的根據。我個人的意見，以爲一切區別的稅率，卽使藉種種有力的理論爲根據，如義可諾米斯特週報的理論，也是沒有價值的，因爲一種事實，已經伯克爾拉特教授揭出，就是國際貿易上，有在任何局勢任何狀況中，不可不尊重的原則。

賁罕穆博士勸德國放棄金本位，這恐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如此，則國際上資本主義體系的原則之一，將歸於淪沒。

我覺得我們意大利的朋友，一定贊成這種顧慮。他們並沒有提出半點的主張，一面有害於國際貿易，一面又是團體制度國家所不可少的。摩爾達拉教授已老實地聲明，意大利有種種正當的理由，急切願望國際貿易繼續發展。我們應當知道意大利經濟學者，都持的這種態度，這是重要的一點。因為在我們國內許多稱讚法西斯蒂制度的人們，也不免受着一種印象，以為要採用團體制度，就含有企圖破壞國際關係造成自足自給的體系之意義。據我們看來，意大利的同仁，毫無這種思想，他們已給我們說明建設團體制度的根本思想，及他們在國際貿易上的見地。

維克爾斯先生發言：

我從曾經傳觀的文件及今天所聽的演說，得到一種印象，就是許多人來到這裏，或為的是向放任主義的墓墳上，誦其誄詞，或為的是彰示他們對

於放任主義復活的信仰。我想這種態度，從來沒有如賁罕穆博士的演說中表示得強烈，也從沒有他人的演說，觸動我如此強烈的反感。我以為事實當這麼說明：營業永遠是被干涉着，我們應避免採用帶色彩的字眼干涉營業的原動力，就是營業的本身。干涉營業，有兩種方法：有時直接干涉，有時藉國家來干涉。我從來沒有聽見並在這些傳觀的文件中沒有看見，說國家在某種情形之下，反對着營業的志願而干涉營業。在我所習見的種種情形之下，——除過一種或兩種特別情形，為政治上的顧慮所牽涉，其範圍甚小，我們可以置之度外，——凡國家干涉營業之處，都是營業逼迫國家來干涉它。

據我看來，似有兩種平行的主持機關，在營業上作用，——你們可叫作干涉。在政府方面，上有立法權及行政權，下有政府各部，各部差不多包括一切的事務，並且範圍日廣，即如在英國有海外貿易部，其職責在搜羅消息而傳播之，並以種種手段，供給貿易上之便利。在私人方面，有資本

與勞力一般的組織，還有各種營業的專門組織，如德國的鉀業組合，還有與政府方面傳達消息機關相符合的私人組織，爲的是促進貿易，如商業公會。

在我的意中，這兩列的組織，政府和私人，是完全平行的兩條線。各列下層組織，只專以促進貿易爲職志，而不能用以限制貿易。各列的上層組織，可以有限制貿易或便利貿易的作用，完全按照使他們感覺興奮的政策。既然如此，我喜歡把我們常常聽見『國家干涉工商業務』這句話中的含義，就此結束，我承認這不是我們要干涉與要不干涉的問題，乃是有計畫的干涉與無計畫的干涉的問題。有些人們，以爲假使能任憑所謂自然法則者自由運行，必能使供給消費之物品，達到最高度之分配。假使我們承認，從來這種法則，就沒有自由運行過，現在還是不讓它自由運行，那麼，人們應當各顧自己的利益，憑自己的力量以調節自己呢？還是走別一條路，纔會達到調節的目的呢？這個問題，當然只許有一個答覆。於是我們

到第二個問題上了，這個問題，比較更爲切實，因我們將採用我們所稱爲計劃的經濟，——我所謂計劃的經濟，就是一種不能避免的干涉，干涉的目的，別有所在而不在使個人取得贏利。——可是這個干涉的權力，應當受私人組織的支配呢？——在一定限度內可以的，——還是應當受國家組織的支配呢？——在一定範圍內也可以的，——或者有一種可想像出的新興組織，來支配它呢？一種新興的組織已有幾個模範存在，但係國民的而非國際的，我們用普通名詞，略加指示，已足使我們的眼光，特別向他們注射，但是因爲他們出乎本會議應考察的題目各觀點以外，我不願再發一言，涉及他們。

當我聽見勿爾斐爾斯博士說到計畫的批評，我甚感愉快。我想無論對於將來的什麼計畫，倘欲使之有用，須按照消費的目的做起，不要像以前總是按照着生產的目的。許多人，以爲現在世界經濟的紊亂，根本上由一種事實造成，就是不知道調劑有餘的狀況，一面機械的組織，一面生產者

的心理，——這是尤其重要的，——仍然受一種推進力的支配，而這種推進力，只適合運用於貧乏的世界。例如當美國出品暢銷的期間，美國人民的生活程度，——至少可說物質消費的程度，——已提到一個高度，在歷史上像那樣大的一國人民，都享着那樣高度的生活，可說是空前的。他們同時還要輸出，且輸出遠超其輸入。他們既消費不了他們預先積貯的大量貨物，又不肯節省他們生產的材料，從來還沒有像在這個時期，把生產的機器那樣殘酷地摩擦，又那樣闊綽地替換。雖然如此，他們還有把許多勞力用到不生產事業的時間，即如公園浴池及其他種種之建築，他們作這些事，全是取諸他們所生產的貨物。我們聽見人說，『美國人的生活，在他們的手段以上，他們對於所用之物，不付代價。』這話的意思是說在美國交易界盛行賒購麵包吃者可以不付現錢，不過，他們雖可以吃不付現錢的麵包，却不能吃沒有造成的麵包。一國人民的消費與生產，已增長到那樣的高度，並且不憑藉外資而是全靠他們自己的生產，那麼，若說『他們

的生活在他們的手段以上，『實在難看出這句話真確的意義。

這些事實，與一樣真確一樣重要的金融方面的事實，——就是反射到信用恐慌及信用崩潰的事實，——其間的連帶性，我從沒有聽見圓滿的說明。無論怎麼看來，這總算是一個太大的題目，非我們暫時所能考察的。我們現在是尋求立刻有效的藥方，以救濟臨時的恐慌。自動調節的機構，假使曾存在過，現在已破壞了，這是公認的。只有從三條路中任取其一的辦法：或建立一種國際主義，此國際主義，或由審慎計劃而成，或用一種新式自動調節的機構運行之。或給各地方以對外經濟自主之權能。或實行閉關自守主義。

我個人以為國內各地方之對外經濟自主，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願意不願意，那倒是另一問題。我覺得恐慌之現象益劇，則各地方對外經濟自主之現象，益可必其興起。前此有一件很惹人注意的事實，說起來與此點亦不無關係，就是美國之麥，巴西之咖啡，有由兩方生產者商洽互換之舉。這

種現象，甚是奇特，雖然沒有很大的成績，也沒有許多做效者，可是這個例子，足以表示出來經濟的必要，到了危急的時候，能把國際上各地方的集團，逼迫着使他們互相調劑其需要，盡力地自己維持自己。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各地方對外的經濟自主，是不能免的，它乘着國際主義的失敗，將愈形發展。

我誠懇地希望那幾句對於奧達瓦會議結果的晦氣預言，——諸君曾聽過的，——不要實現，我贊成菲薄該會議者所持的異議，但我不喜設想英國人人都像賁罕穆博士那樣悲觀。並且關於他的批評裏的一點，我要認爲是一個例外情形，諸君聽見說不列顛帝國要作一個經濟單位，是不可能的，因爲它有必須輸出的過剩生產，假如說一個地方因爲有必須輸入的過剩生產，所以不能作一個經濟單位，這話我倒還能了解，但是一個地方，超過了自給自足的程度，倒不能作一個經濟單位，這其中真有我絕對不解的道理。對於這點，我希望將來還能與賁罕穆博士討論一番。

我還有警告的一言，我覺得有一大危險，就是把從別的境地所得的想像，搬運到新的狀況之下，而不加以反覆的考察。鐸爾東博士向我們說，『關稅或好或壞這個問題，討論起來，是沒有用處的。』固然，不過我有一個提示，這種語意，究竟只有一種相對的價值。在希望自然調節的經濟裏面，關稅壁壘顯然是不好的，他們可以比作山嶽，並且比山嶽困人更甚，因為山嶽還有高低的不同，在一種舊式的自然調節的經濟裏面，國家都被山嶽包圍着，人們只可以盤旋而上，盤旋而下，這顯然是用盡方法，造成一種最難堪的疆界。但你若向地方經濟自主的路上走去，那疆界上的山嶽，却是可人意的，用一系列可調劑適度的山嶽，作成一條疆界，這倒可稱美滿，換句話說，關稅在如此一種經濟狀況之下，可成一種最便利的工具，以實行我所指出的計畫。對此計畫最大的阻力，當然是最惠國條約了，許多的替代方法，曾經提示，但是沒有一個能適應這樣一種關稅的需要。我只有在向諸位告辭時，寄託一種可資啓發的思想，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經濟

裏面，關稅可算是有用的，而它的用處，或不免受最惠國條約的限制。至於反對方面的意見，實因我們自昔至今，都習染一種觀念，以爲關稅是一種不能避免的病患，所以他們認最惠國條約，就是和緩這種病患最有力的手段。

第四次研究會議，——星期二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點鐘開會，愛森曼教授主席。

主席發言：

現在仍當繼續討論各種曾經提出的問題。

馬德家祿教授發言：

諸位先生！我要說的話，將限於答覆鐸爾東博士提出的前兩個問題。

我想我們都承認國家在經濟生活中干涉範圍之廣大，我們於是被導着問我們自己，若維持現存的一種干涉體系，一種無秩序的，被衝動的，無目

的的，或多或少帶偶然性的，甚至被財閥政治支配而反對公共利益的干涉體系，是否有什麼利益呢？或採取另一種合理化的，有限制的，有方法的干涉體系，其中並包含着關稅政策係計劃的經濟中之一部的意義，是否比較好些呢？

我的答覆如下，假使我們顧慮到決定關稅政策的原素，其性質是變化無常的，我們便只可把關稅政策，作為一般的經濟政策之一部，一種有體系的經濟政策之一部，即計劃的經濟之一部，然則什麼是這個體系的其他部分呢？

第一就是生產，我們由生產裏看出的是什麼呢？

在差不多一切的國家裏面，我們看見生產組織，只有兩大部分：一是自由的，一是控制的。自由的部分是農業，控制的有組織的且差不多被壟斷的部分是工業。同時在農業裏面，生產帶着無政府的性質，在工業裏面，生產是被控制而有計畫的，至少也可說有部分的計畫。

假使我們回頭來一看物價，我們就看見這個矛盾的種種結果，而生產有受一個中心團體或國家領導的必要，是很明瞭的。

一種加重經濟紊亂的原因，是經濟的國民主義化，一種新重商主義，驅策着生產增加，各國都是如此，生產各部門都是如此，毫不顧自然的及社會的狀況。

既然如此，我很想知道若用一種有組織計畫的經濟，在有限的程度之下行之，有限的意思，即國家的干涉要合理化的意思，這樣是否可以成功，把由過度工業化的瘋狂所得的結果，制止而救濟之？瘋狂一語，並非過激之辭，倘我們就目前一切事體陷入的混亂狀態，觀察一下。我又想知道，若用那手段，是否能達到一種國際分工的理想？這種理想，在適用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時，從無實現的可能，雖然這種理想，是被主張自由者唱出，又被他們認為有實現的可能。

假使我們研究運輸與交通的體系，我們看不見在差不多一切的國家，合

理化都是必要的嗎？若有經濟的計畫，不能救藥此中顯著的紛亂嗎？若在某種情形之下，把運輸與交通的組織，完全委之於國家，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委之於私人企業而採用租讓的手段，及限制國家的干涉於部分的控制，以維持公共的利益，照這樣組成一種較合於現在經濟狀況的運輸交通的體系，是不可能的事嗎？

說到金融的範圍，我不願站在理論方面，提出金融的恐慌與其他經濟的原素孰爲因孰爲果的問題，但要向：在這裏仍有控制的必要否？有幾個國家，雖守着傳說的中央銀行組織，但他們的國民，不是現在也疑議起來嗎？都不知該用怎樣的組織，可以使國民公共的意思，能影響於這些銀行的金融政策。

我在這裏聽見說計畫的經濟的破產，以美國信用膨脹的政策爲例證，但是我們看見英國用着收縮信用的政策，而所得的結果還是一樣的。不幸這兩種方法，不特不利於倚他們爲重的國家，即全世界的經濟生活，都受他

們的荼毒。我們可以不用遲疑地斷定，在金融的範圍內，也惟有藉計畫的經濟，與公共團體的控制，或可得到一點結果，不像目前的恐慌，因為金融與信用這等因子，乃此恐慌場面上重要的角色。

我現在說到信用的問題，尤其是關於公債問題。假使我們看着這些由下層信用機關汎濫的債票，不能使資本的利用，受一種制度的控馭，如國聯採用的制度，假使我們想想最近債務國的破產，停止了債款的付償，債權者當受若何影響？我們不是又得到一樣的結論嗎？在信用的範圍內，在國際與國內雙方的立場上，計畫的經濟，不是一種有效的救濟法並且在必要時一種預防法嗎？

同一的理由，不能適用於國內國外市場的體系嗎？說起市場上的紊亂，較在其他範圍內並不輕減。

我充分地覺悟，在經濟計畫這個問題上，有不易確定的一點：這個經濟計畫的對象，應當是造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就像俄羅斯呢？還是

恢復國際經濟的體系，像意大利呢？我們意大利的同仁，已確實地對我們表示，團體制度的目的，在恢復世界的貿易。

問題就是如此：組織自足的經濟單位，或恢復世界經濟的體系。這個問題，領導我到鐸爾東博士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上，他問『由國際的協同，回轉到較低的稅率與較自由的國際貿易上去，是否可能？』

我承認我從幾次國際經濟會議所得的經驗，使我對於國際協同回轉到比較自由的貿易上去的可能性，抱着悲觀。無論若何，我們當考慮這種可能性的時候，不容加入什麼條件，不要說，假使我們能除去了致提高稅率的原因，我們就可希望比較自由的貿易，比較適度的關稅政策。

農業的保護，實在是歐洲衰落的重要原因。但是農業保護發生的原因，就最近百年來說，其要素却在歐洲以外，在海外幾個國家的農業狀況。因為這種狀況，不是暫時的，又因為歐洲的經濟復原，還要靠着他種要素，——經濟的及政治的，——而這些原素，都被世界經濟恐慌，捆成一束。

我不信在迫近的將來，能把我適纔所說致提高稅率的原因，掃除得了。

再則，在引起過度的保護政策之種種原因中，必須把幾個國家裏面通貨不安定的危險，也算在內。

有人提議說，中歐各國，應當追隨着英國放棄金本位。其根據的理由，就是放棄金本位，不會定然引起物價的騰漲。答覆這句話，倒很容易，在貨幣的立場上，一次宣告破產，是可能的，二次行之，便是欺騙。英國自從歐戰以來，僅第一次破產，但德國已經過一次破產了，它還當再來一次嗎？

但對於維持物價的論調，還有一個答覆。若說物價的水準在英國並沒有增漲，那是因爲有兩種互相衝突的要素：一種使物價在國內提高，一種使物價在國外低落，雖然很像是矛盾的思想。這兩種趨勢互想爭衡，所以英國的物價，多能保持着以前的水準。或者還有別的要素，我不知道。但是設想全世界的物價，得到什麼幸運，停止跌落的時候，能保英國物價的水

準，依然不動如今日嗎？

所以若激勸已經宣告過一次破產而現在還受着困難的國家做效英國的前例，很難說是對的。

我現在要說到另一個助長稅率的要素，就是戰後賠款與協約國的戰債。這個要素，無疑議的在造成今日世界恐慌的工作裏面，擔着一重要部分的任務。

雖然如此，我對於貨幣，交易，賠款，與戰債諸問題，却傾向於樂觀。我相信可得到一個解決。但關於農業這個要素，我却懷疑甚深，它是歐洲衰落的主要原因，現在已到亟須設法補救的時候了。

適纔有人提起最惠國條約，我聽見這樣的用語，不禁詫異，因為最惠國條約，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或者在商業條約中，有把它插入的時候，但在實行上已不復適用，因為它造成貿易上不公平的條件。

舉歐洲輸出穀物之農業國與輸入穀物之工業國兩間的關係，作個例證：

靠着最惠國條約農業國，由它的收穫裏售出它所能售出的穀物，實際上等於毫無代價的贈送，結果，它的支付平衡，與他的預算案，都是入不敷出，它的通貨，受着顛覆的恐怖，這就所謂公平交易的經濟狀態。照這樣能够繼續下去不致使中歐諸國陷於破產嗎？我也不願再提說別的情形，同樣地足以促他們破產的實現。

在事實上，最惠國條約，只能在經濟與財政的變動沒有摧毀了世界經濟平衡的期間，工作起來，今日它已不能繼續工作了。

伯克爾拉特教授勸我們轉回到比較自由的政策上，尤其是恢復商業條約中的最惠國條約，我很驚異他說出這話，設想我們明天就轉回到比較自由的主義，那陷溺中歐各國的恐慌，就會消滅嗎？我已經指出來用這樣辦法將適得相反的結果。假使恐慌不能消滅，我們能希望歐洲的經濟狀況，有點改善嗎？若不能復興現在已經消歇的市場，歐洲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家，把他們剩餘的生產，還能推銷嗎？

我們把數字檢查一下，就看出在僅僅兩年之久，中歐諸國的輸入，減少了一半。即就魯馬尼亞說，它在一九三一年的輸入總額，僅當一九二九年輸入總額三分之一，魯馬尼亞並沒有增加它的關稅，它倒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現象未發生以前，把關稅輕減了許多，這就是說，在此兩年中，國家毫沒干涉而貿易却減少了三分之二。我們的麥價，異常墮落，僅當法國的批發價四分之一，我們消費的能力，因此大受摧殘。我們農村的人民，今日還能活着，這可以說有點神祕不測處。但他們不過是勉強對付地活着，諸位知道他們生活的狀況就夠了。

假使依我所說，轉回到最惠國條約，不是一種解決的法子，那麼，這個恐慌的問題，怎樣會解決呢？

第一，一種理想，擬用關稅同盟的體系，結成一個歐洲關稅聯盟，不過這只算一個烏託邦的理想。地方的關稅同盟，或許是一種救濟的方法，但有一個前提，須不受政治上顧慮的障礙。我現在不提及其中的細目，我只

說有不可勝計的政治上的顧慮，阻撓這種地方經濟集團之構成。這就是爲什麼倫敦幾個金融機關提議的丹牛波關稅同盟組織，及經在巴黎商洽，僅決定造成以五國互惠爲基礎之經濟關稅協定。這又是爲什麼卽此範圍有限之協定，亦遇到許多困難。——不僅經濟上的困難，還有政治上的困難，阻撓它的實現，將來還要繼續地阻撓多時。

另一種解決，或可求之於國際集團優待稅率，或歐洲優待稅率之設立。假使優待稅率，限於若干國家的一個集團，就我們仍要遇着政治上的困難，與上述的一樣，因爲我們要與國際利益相抵觸。

設想甲國允許乙丙兩國一種優待，這種優待的利益，就不免影響於政治，因爲甲國可以收回優待，脅制乙丙兩國。

優待的理想，惟有推廣到整個的歐洲，纔可以實行。但這樣作去，還有困難處，事實上這些困難，已經有了，我不知他們還存在否？因爲英國的意見，——我援英國作個例證，——似乎已改變了，但一年前英國曾領導

着一種抵抗運動，在日內瓦反對關稅優待。可是這個國家，在與它的殖民地及屬國的商業關係中，並不遲疑地施行優待稅率。凡是知道這一點的人們，自然覺得它的反對，似乎有失公道，這還用我多言嗎？

一位英國的同仁，恰巧曾引出義可諾米斯特週報裏贊成以互惠體系為基礎之商業制度的論調，我們很喜歡聽見這話，因為假使能垂盼到互惠的制度，或者就會更進一步，覺悟到優待的意思，在政治的觀點上，比較互惠的危險性要少些。

在事實上，基於互惠的貿易，與基於地方經濟聯盟的原則的貿易，有同一的危險性，都能導入政治的立場。經濟聯盟，遲早必變為政治聯盟，基於互惠思想的經濟協定，到底也要變為政治的協定，兩者皆將導回歐洲於大戰以前的地位。

若問有什麼最好的形式，可以模範將來的最惠國條約呢？我不應說這個體系須得破壞，但我以為須得變通，使它較有伸縮性，有應當加入的例外

，即暫時對於一定的國家一定的貨物施行的例外待遇，若在恐慌時期，還應有比關稅同盟與地方經濟協定所能容納的例外更多的例外。至於這種條約的實施，還須受國聯的節制。

但是反對者必說，這不過是一種減痛而不治病的藥物，一面儘管適用，一面人人對於前途的究竟，都在懷疑。不過這種境况，依曾經指示過的一點說來，却是極其簡單，資本主義正在絕命，而社會主義尚未產出，這是曾經說過的。我的意見，以為經濟計畫，此時可以登場，不要轉回到自由主義的體系。人們固然可以舉出事實以證明自由體系的恢復，是有可能性的，因為在奧斯特拉利亞，國家社會主義，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而卒至於破壞，即其明徵。不過它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體系，完全以工資的剛硬性為基礎，而並不以超脫國家節制的其餘要素之剛硬性為基礎，並不是以由獨占造成之一切集合式的私人利益為立場。

即私人利益的剛硬性，亦可破壞，美國法律反對脫拉斯，使我們曉得國

家權力在脫拉斯及獨占事業上的信用。

在這種情況中，我不信轉回到歐戰前的經濟自由主義有可能性，即轉回到戰後十年間和緩的經濟主義，我認爲亦不可能。反之，若以經濟計畫的體系，施之於國內，並在一定範圍內，施之於國際，我們當能安穩過渡，到一種新經濟的秩序中。至於此新經濟秩序的性質，我們却不能預斷。

我不信資本主義已滅亡了，因爲我不信經濟體系的滅亡，經濟的世界，如受着電力的作用，它是一切舊經濟體系的殘餘的集合，同時却含着新的萌芽，或即發展成將來的體系。團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今日固已存在，我們所應作的，就是把目前存在的制度的力量，加以審度。

我相信現在是向一種新經濟秩序方面過渡，在此新經濟秩序裏面，公共團體或較個人爲有力。但我們不是要在這裏建築出什麼體系以模範將來，且關於此點，博恩教授的演說，已把問題提到實行的基礎上面，使有效的討論，更易進行。

我希望當我稱贊經濟計畫的時候，諸位明白我不是稱贊一種經濟體系，不過僅爲趨向一種新經濟體系者指示途徑而已。

柏克爾拉特教授發言：

請許我說幾句關於我個人的話，因爲我很想把我昨日的話引起的誤解，加以晰辯。

馬德家祿教授說，他不信最惠國條約能作有效的救濟方法，但我昨日實在沒提議以最惠國條約作單獨的要素，但把最惠國條約包含在其他的國家策略裏面，在貨幣的範圍及法律的範圍裏面，並且要它以歐洲各國間和平與安全的博大情感爲憑依。最惠國條約，不過是整個政策中之一細目，故只可如此觀察，如此判斷。

再則，馬德家祿教授說，陷營業於破產者，是物價不斷的跌落，這是完全正碯的。但物價跌落的根源，究在何處呢？就是在整個信用體系的破壞，尤其是在此體系中貨幣所占的部分，在銀行信用的凝凍，其結果就是到

處的通貨緊縮，於是物價跌落，直至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於是一切債務者因之破產。個人與國家雙方一致，債務國爲維持其支付平衡，採用種種手段，於是趨於日甚一日的經濟分化，經濟敵對，限制輸入數量，限制匯兌，一方面強迫輸出，這個無端的環子，漸漸地把我們套在裏面。

依我的意見，要結束這種局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使國際貿易得到較大的保障。現代的信用體系，——我們可以喜歡它，可以不喜歡它，也真有許多理由令人討厭它，——根本上與國際貿易結合爲一，不能分解。假使我們不給國際貿易一點活動的地步，要使信用體系復原，是不可能的。收縮信用的運動，進行不止，物價將繼續地跌落，世界將分裂爲許多地方經濟自主的體系，其在政治上發生的影響，我寧願含糊不言，因爲政治區畫的地圖，將因此地方經濟自主的體系，完全更變。

因此我感覺爲和平的利益計，爲經濟的昌盛計，都須得由歐美諸國協同努力，建設一種半自由主義經濟體系的基礎。

我很明白，我們不能返回到舊時的狀況，我不過指出一個陷阱，我們現在都冒着顛覆其中的危險。我們無法控馭，使世界陷於政治的及經濟的紊亂中，我們又不能在新原則的基礎上，把它再建築起來，因為這些新的原則大部分還沒有成立。

在這個聽候最終解決的期間，爲利用這點光陰計，把昔日歐洲經濟狀況，能恢復到什麼程度，便應當恢復到什麼程度。

這就是我的思想的原質，昨日就是這種思想領導着我發言，我不願無論何人只就整個內的一部分觀察，因爲如此，將使我的演說，留下不正確的印象。

齊梅恩教授發言：

鐸爾東博士在他的觀察的起點，已說他覺得處在一個爲難的地位，因爲他在這裏，是一個國際人，但當他前在國聯時，他却表現出他是一國民的分子。我覺得我處在一個更爲難的地位，因爲我同時是一國民的分子，又

是一個國際人，我現在代表着一個國際的團體，而同時又和英國委員會的幾個朋友，共同代表着一個英國委員會。

我要從國際的觀點上說幾句話，因為當已經聽過了許多國家的狀況的分析，若有人出來，試把這些狀況，總合起來，並且不避冒昧地從國際的立場上，或從國聯的觀點上，作幾句積極的提示，我以為這是有用的。我這樣作去，我要尊重我們國人的個性，且有時還可以拿他們作我的批評的鵠的。

鐸爾東博士在他的分析中說區分所有的備忘錄，有三個方法，我喜歡加入一第四個方法。但這個區分，關於備忘錄本身者少而關於討論者多。有些人分析目前的恐慌，謂純係經濟的原因，有些人則尤特別着眼於政治的原因，雙方的原因，都表現出他們的活力。經濟原因，不是惟一的，這是無庸疑議的。但我個人更有很強烈的感覺，覺得政治的原因，直到現在，還沒被人充分地重視，須得加力地唱出，我不信我們會言過其實。若提起

第一件，一九一四年事變的結果，破壞了信任。第二件，大戰的結果，形成社會主義，如博恩教授所言。末了一件，軍人突然地貢獻了一種新發現，說經濟學是戰術的附屬品，凡讀過軍縮會議籌備會專門委員會報告書的人們，沒有不想見世界的經濟組織，已經軍事化到什麼程度了。讀過那些議論人們，不禁感覺到現在日內瓦的軍縮會議，差不多盡說的是多少兵，多少船，以及相類的種種，都不過只講到這個故事的一半，還有一個經濟的軍縮，也在企圖之中，我們還沒有看見開端。經濟的軍縮，憑着政治的協約，——如博恩教授所說的各大國間的協定。——而政治的協約，却又憑着國際聯盟的原則與克洛柯非戰公約的原則之適用，這就是說，憑着和平有絕對的保障，法律的統治權在世界上有絕對的保障。若沒有法治的世界，我們只有繼續地在經濟恐慌中掙扎。

我覺得這是應當說出的，即就現在說，我認爲一種政治上的改善，並非不可能之事，或者迅速就可實現，雖目前恐慌的嚴重性，亦不能作梗。於

是我要在嚴格的經濟問題上，提示幾點：

第一，我當指出來我們自戰後永沒有一種關於經濟的決定。威爾遜總統在他的十四條宣言中，包含着一條，（第三條）提出減削經濟的障礙，建設貿易條件的均衡。這條提議，在巴黎被人置於不論之列，因為人們的事務太多，有幾個委員會在那時貢獻了許多積極的提示，可是都沒有照辦，這個問題，從此就擱起來。

現在我們已經對各個國家的經濟原則，費了許多的討論，我們已得到團體制度的寫真，我們今日早晨，還經過一條長途，從羅馬說到倫敦，更一直說到滿徹斯特，我們還得到許多折中性體系的提示，並且最後還有馬德家祿教授的混合體系。從國際的觀點上看來，我覺得要調和這些體系，沒有不能超越的困難。亞摩羅蘇教授已對我們說過團體制度實施的手段，它的對外關係上，與比較偏於自由主義國家的制度，並無大異。現在許多國家，即一面仍保留着滿徹斯特派的體系，一面也都設置各經濟組織的

代表機關，經濟委員會，及國民委員會。

我喜歡重提起一種建議，就是意大利委員會在最近國聯大會曾提出的，並且經沙爾特爾君 (Salter) 以英國委員會團名義繼起贊助的。這個建議，是要每年召集一次各國國民經濟委員會代表會議，讓法西斯蒂的委員會代表與滿徹斯特的委員會代表相見一堂，這於他們在他們國內的行動，有什麼妨礙呢？他們對於國際的目的，藉此就可合作起來。這並不是講學性質的建議，事實上已曾有過，在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中，俄國的代表團也在那裏，當時有一項決議，期在使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於他們各個國內的問題，能協力解決。

關於最惠國條約制度，——它是我們的老友，——我可以再說幾句話嗎？我喜歡贊助我們的德國朋友，擁護這種制度。說到底，這最惠國條約，曾作歐洲貿易生活的基礎，——歐洲國際貿易關係的基礎，——從一八六〇年以至一九一四年。若因現在有人提議，就拋棄了它，似乎是一種非常

危險的舉動。法國的備忘錄，已表示出來，法國曾努力地脫離最惠國條約，可是在最近幾年內又不免或多或少地轉溜到最惠國條約上來。並且自歐戰後，我們得到很大的利益，就是因為美國在戰前拒絕用最惠國條約的方式，在戰後則已採取了，並對列國施以均等的待遇。不過美國稅率之高，致其他的國家，都不肯相互的低減稅率，因為他們恐怕如此，則是無意中使美國享受了便宜。但設使蓋奔博士的預言，幸而得中，那一帶的壁壘，將有許多層的磚石，拆落下來，那麼，最惠國條約，在它的嚴重時期，一定效力更大。

我今早聽見賁罕穆博士稱讚互惠制度，深為驚詫。英國政府對此問題，當有一種決定，它或決定採取與各國單獨磋商的制度，或決定老實地維持着最惠國條約制度，繼續以同等待遇對一切國家。假使它要走入互惠制度，就須得把我們所訂的一切商約，宣告廢除。這些商約，於補助財政上收入的利益之外，給我們許多他項的利益，我想我們將發現把許多有價值的

東西，擲在故紙堆中。這些東西的價值，我們直到現今，還在日用而不知，因為我們享受着這些東西，多少總覺得是自然而然的。

在另一方面，從國際的觀點上說來，我不禁對馬德家祿教授，感覺很深的同情。他說，我們既在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之間，容納了優待的制度，偏對於世界上其餘的國家，尤其是對中歐諸國，却以拘執強硬的態度，保持着最惠國條約，似乎有一點不合理論。當他在國聯大會裏，指出這種情形，反對英國殖民地的要求時，我曾聽過那一場辯論。並且我以為在英國殖民地代表方面，援引威爾遜總統宣言的第三條，並要求國聯的絕對同等待遇，未免有點太好強了。這個同等的待遇，當然不適用於一個帝國內的各部領土，一國的領土，向國聯要求與他國同等的待遇，那便是要求同時利用互相衝突的兩種制度了。

雖然，我還可指出一條路來。不錯，最惠國條約的體系，已受了很厲害的損傷，在目前的恐慌未發生時，它已受了損傷，而目前的恐慌，更使它

差不多成了殘廢。通貨的緊縮，各國間的妥協，及其他類似的情形，皆足使最惠國條約失其作用。但若建立一國際權力，恢復最惠國條約的原狀，一定是可能的。就在日內瓦設立一國際商業委員會，與國際共管委員會的規模大小相仿，獨立資格亦相若，以在商業界被公認有一定資格之人民爲構成分子。這種委員會，對於公平貿易，應有制定章規之權能，它在貿易問題上應有的貢獻，將不亞於一八七五年國際法研究院對於仲裁問題上的貢獻。海牙會議，假使不用一種有系統的努力，規定章則，也就不會有一點結果。

經濟範圍內所需要的，當然是在劃清界限及調節適度上着手一種開闢新路的工作，若各國只互相怨尤，彼謂此違反公道，此謂彼手段卑劣，於事毫無所補。假使此種委員會成立，將漸漸造成一種實行的法典，它可以對一切與最惠國條約——馬德家祿教授所擁護的，——違背的舉動，示以範圍，限以時期，附以條件。它又可以決定大不列顛帝國在對殖民地與對他

國兩方面，應適用最惠國條約到若何程度，並決定大不列顛帝國所要求的地方協定，——即斯干地那維亞各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之間的地方協定，——是否可行。

我這種提示，期於有裨實用，雖然我也知道，目下不是給國聯這個機構上增加片段的時候。但可靠的事實，就是在貿易的世界裏今日所需要的，無過於紀律，主持紀律，要一種較高的權力，俾各自作法各自為政的各國及各生產者一律遵守。

我現在要講到一種很難窺測的事態，就是奧達瓦會議的一方面觀，人們還沒有討論過，就是英國報紙上對於這個問題，也是茫然。這個會議可說是大不列顛帝國溫帶領土與熱帶領土將在奧達瓦舉行的婚禮，據我所聞是如此。——這就是說王冠下之各殖民地，——帝國內非自治部分，——將被導入於優待的體系。大不列顛帝國大開的門戶，自一九一九年來，一寸一寸地封閉了。依我所了解的方法，就是在帝國各部分之間，成立一種以

優待作基礎的協定。我閱過了國會對於殖民地職官投票的議事報告書，我甚驚訝衆議院中沒有任何黨的一個議員，提起這個問題，或看見這問題中的國際牽連。不用說的，大不列顛——我再把別的殖民國加入——所以被無殖民地的各工業國，允許在地面上占據如許廣大的領土，正是因為他們對於後者一切，都許給以門戶開放，因為門戶開放，已成了公認的原則，並且一般人的感想，都以爲世界將漸漸趨於完全的門戶開放。國際共管的整個原則，將陷於嚴重的危險，假使一個殖民國封鎖了門戶的話。我們聽見有些提議，說國際共管的委託，當付於某某國家，這句話含有受委託國當由此得到經濟利益的意思，可是在大不列顛帝國，我們自然知道，這倒是我們一個責任，並且我們或者有點過於迫切，想解脫了我們所受的國際共管的委託，因為代管這些地方，既易滋事又多耗財。但是根據商業平等的整個原則，對於非自治的殖民地供給的原料，應予以同等的輸入便利，這却是國際關係上最重要的一點，我想我們應當在這裏對此點加以注意。

還有一個問題，一九一九年在散日耳曼簽訂的條約，從一九二〇年起發生效力。這個條約，替代了一八八五年的柏林條約，本應在這個條約批准十年以後，召集一個會議，對於亞非利加中部自由地帶的整個問題，作一番考慮。這種會議，並沒有舉行，這個問題，就任其懸擱。這個整個的問題，將來伊於胡底，比那在獨立自治的各國之間最惠與優待問題之前途，一定重大得多。

大不列顛帝國的非自治區域，注重他們地方經濟利益的傾向，日有增進，我們有幾處非自治區的領土，已在他們的財政策略上，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獨立的資格。印度確是如此，所以有些人們，以為大不列顛帝國是要自己完成一個自由貿易的集團，而對外則持封鎖主義，實係完全錯誤。一種難免的危險，就是在一個區域的各部分之間，也都發生特別優待的關係，但是因為這些部分的數目增加很速，他們就會漸漸地自覺而轉趨於慎重。坎拿大與西印度之間，已曾締結了正式的商業條約，這樣看來，博恩教授

所指民主主義的原則，正在大不列顛帝國的財政策略上運行，並且造成許多複雜的情形。這又是一個應努力以國際協力制定通則的理由，局勢愈紛糾，我們各地的恐慌愈險惡，我們的企圖愈覺必要。無論前途的希望如何黯淡，我們總應試行建設一種範圍較闊大性質較永久的權力，以解決這些問題。

是時滿都教授對於本會議應遵循之研究方法，發起一種討論，加入此討論者，有荊霍爾提督，加拉夫勒西教授，蕭特威爾教授，滿寧教授，加爾特爾先生，陶恩畢教授，國際文化合作院院長及主席 註(一)。

註(一)參看原序一四——一五頁。

姚欽先生先代弗蘭特郝達教授聲明，最近因故，未能接受本會議屬其作一特別報告委員之申請，繼演說如下：

我喜歡諸位許我說一句話，是與代表德國委員團柏爾柯希特來塞爾教授繳到的佳作報告書有關係的話。作者宣言奧大利與匈牙利百分之百係純一

的民族，並無少數異族雜居其間。讓我指出那散日耳曼及特利亞聾的條約，與捷可斯拉襪加波蘭巨哥斯拉維亞魯馬尼亞各國間的締約，其中都有關於少數異族的條文，其條文的意義，亦大略相同。

布爾諾條約，——我曾有幸得參加此約的協商，——是捷可斯拉襪加與奧大利兩國締結的，其中有關於少數異族的條文，並且有關於教育的幾條。在事實上，爲履行這種條約於是在維也納有許多國立學校，用捷克語言講授，這是戰前所未有的。即德國的出版物，也稱布爾諾條約，有彌補和平條約中缺陷之功。

主席發言：

諸位先生！我們還要聽博恩教授及鐸爾東博士的結束報告，並對於各種提出的方案，加以商決，但刻下爲時已晚。

我提議明晨再開一最後研究會，諸位當然明白，明日的會，須準於上午十時開始，爲的是多留一點時間。假如可能的話，就在十一時開行政問題

討論會。假使我們同仁還有具體的提議，要送繳提綱委員會，請現在即行送繳，我們明早更可省幾分鐘的時間。

蓋弈博士發言：

我對於提綱委員會，有一小小的提示，我以為大綱的平衡概要，既經揭出，自然要接續着發揮，但我有值得貢獻的一點意見，就是把各國關稅如何制定，作一比較的研究。我們在這裏有一個保護派的集會，可是從許多不同的國家來的。各國制定關稅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一種稅率，能使經濟上的種種利益，得到大平衡，或發生大衝突。在有些國家裏面，這種衝突，直可說是自動地發生出來，因為它的來路，並不是盡如人願的行徑，且很少顧慮到消費者之需求。我想研究過去，不如研究現在，研究過去，或多困難，若用比較的方法，研究現狀，如關稅如何制定，其行政上之組織，如何構成，其實行之效果，是否即立法者之所預期，我想就這種問題，研究起來，當為同仁所深願。看各國對這些問題，如何應付，當是很

有興味而且很有價值的一件事。

主席發言：

蓋奔教授的提議，當送提綱委員會。

下午七時散會。

第五次研究會議，——星期三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開會，羅誥教授
主席。

主席讀過一封由斯特法尼與亞摩羅蘇兩教授寫來的信，註(一)發言如下：

註(一)參看二七〇——二七一頁。

在團體制度裏面，像意大利現在的制度裏面，僱主與勞動者兩方，各自團結爲分立的組合。

這些組合，合併爲一個團體，每一個團體，代表一種生產業務，一種生

產業務的團體，對於由其業務發生的生產與分配的諸大問題，謀解決的方法。

這種組織的價值，在能把各生產業務內兩種原素，——資本與勞力，——聯合起來，成功了一個各生產要素互相補助的完全組織。

這種互相補助的完全組織，在生產與分配兩方面，都可利用。

關於分配方面，問題十分容易，因為由僱主與勞動者之間發生的糾紛，當由兩方面的自由商洽以求解決，如遇困難，則由團體的集議與決定，可以了結。

但是這種組織，在生產範圍內亦可利用，可是這裏面的問題，就比較困難了。

直到現在，人們對於生產組織，只提出兩個重要體系：私人企業的自由體系，與由國家代表共同生活而組成的社會主義體系。

團體制度的組織，創造出一種第三體系之可能性，在這個體系裏面，生

產由生產者自己計畫，自己組織，成一個單純的形體，即所謂團體，亦即職工組合之組合。由這條道走去，私人企業體系中的利益，還是照舊維持，因為組織生產者，還是生產的關係人自己。可是在另一方面，那無組織無政府的生產在自由體系的形態下所結的惡果，都避免了。

在這第三種體系裏，生產的危機，不是受國家限制而是受生產者限制，不過生產者不是各自孤立而是結合組織的。生產仍是個人的業務，不是國家的業務。其異點只在僱主與勞動者都是組織中的分子，後者在生產中有他們的股分，有他們的利益。

總之，團體制度是生產者自己組織生產與分配的制度。生產者乃合僱主與勞動者而言，他們雙方相結合而成團體，受國家的最高控制。惟其如此，故一切成敗利鈍的結果，仍歸於生產者而非歸於國家。國家只為保障一般人的福利而施行干涉，特別是關於帶政治性質的問題。

是時有些爭論，隨之而起，陶恩畢教授乃指明斯特法尼及亞摩羅蘇兩

教授的書函在本會議中所負的職責，謂此係他們的憲法之一部，本會議應作如是觀，不應對此發表意見或付表決。一個重要之點，是要認清這件信乃係斯特法尼與亞摩羅蘇兩教授個人的貢獻，毫無束縛整個的會議俾遷就於一種特別政策或一個特別觀點的意義。

布各勒教授贊成陶恩畢教授之言，一面既稱贊適經宣讀的信件謂其在討論上宜視爲一種附益的珍貴貢獻，一面却惟恐這個印像，引起一種觀感，以爲這件信足以代表討論的結局。其詞如下：

我們由意大利所見所聞的，皆使我們感覺興味，但我們要洞悉團體制度的利或不利，尙待更親切的探討。主席認這種制度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一種折中主義的制度，我們甚願確切明白國家權力在這種制度中占的什麼部分，我們須得深入到這個問題的小節細目裏，加以詳悉的探討，然後纔能說決定取捨的話。不久將開匹沙會議，就要討論這種制度。我希望我能參加這個會議，因爲這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但我不願我們對團體制度或他種制度，予以附和，或迹近附和，方不致使我們研討的結論，等於這件來函的結果。

在法國內，『團體主義』這個名詞，惹人疑忌，我們寧用『工團主義』，或如彭古爾先生所稱的『職業同盟』這類名詞。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喜歡陶恩畢教授說得透徹，他說這封信並不是我們研討的結論，不要讓報紙上說：我們的會議，經過三日的討論，所得到適用而積極的唯一結論，乃是對於某一種制度的辯護，而這一種制度真確的成效，我們究竟還不知道。

這封信對於將來努力探討的工作，實在算一個有價值的領導，但決不可看作一種結論，否則其他代表團的信件，將立刻紛至沓來，那時本會議須逐件施以相當之應付。

我請求我們對此信件保持含蓄態度。

此議經衆贊同，於是斯特法尼及亞摩羅蘇兩教授一函，當僅被視為個

人之貢獻。

討論之總結束。

鐸爾東博士發言：

經過最有興味的兩天討論，我們現在走到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要把一般的印象表現出來，或有可能。淺見的觀察者，或譏評本會議沒有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沒有表決過議案，沒有尋出解決世界恐慌問題的方法，沒有把已經開始的工作告竣，這樣說來，實屬一種誤謬的見解。正好像一位信口雌黃的某君，據他在國聯理事會所得的觀察，他說，『國聯沒有作過一件事不曾推宕日月。』

一種會議，像我們這種性質的會議，其真正價值，就在我們經過個人意見的交換，經過合作研究大綱的建立，如我們的用語所劃定的範圍，又經過種種方式的私人接洽以後，能够把這種組織所以構成的目的，極清晰地指示出來。

我們接到的題目，是『關於國家在經濟生活中之干涉。』我們的討論，已明白表示出來，我們對於這個題目的廣大範圍，已有正確的認識。尤其中肯的，是博恩教授的提示，他希望凡在這裏有代表的各個國民組織的機體，把本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干涉的研究，擔任起來，由這樣詳細的考察，可以得到一種珍貴的比較研究。本會議的籌備者，爲限制我們討論的範圍起見，所以持提出關稅問題。可是我們大多數的同仁，認爲單獨討論這個問題，不切事實，亦無用處，就是這個意見，領導着我尋求一種方式，把本會遇到的種種問題，包括起來，所以我有以下的提議：關稅既係一種事實，若要把關稅當作整個國民經濟計畫之一部，是否有益呢？這樣的觀察方法，設已被採取，我們若尋求其他部分的要素，以期與關稅問題併爲一體，成一整個的計畫，是否有用呢？若一系列的國民計畫，在諸不同的國家實施起來，其經濟政治雙方面的影響，在國際關係上又應若何？這個提議，使我們得到許多有益的貢獻。

不論那一次，凡是一些學者的集合，爲討論一種概括的提議，人們可以預料，這些人會把許多時間費在討論字義上。我們亦然，當我們說到『計畫』，便引起許多議論，推求『計畫』的意義。什麼是計畫呢？即如北美合衆國之麥，巴西之咖啡，互相交易，此種國際交易之組織，可否認爲一種經濟計畫的例證呢？又如巴西把咖啡付之一炬，山谷裏煙焰蔽天，百里外的行人，可以嗅到咖啡的芳香，這可否也認爲一種經濟計畫的例證呢？又如美國的火車頭汽機的燃料，不用煤而用麥，這可否也認爲一種經濟計畫的例證呢？人們可以給『計畫』不止一個定義。一個蘇維埃重要的組織者摩洛托夫（Molotov）最近對資本制度與蘇維埃制的異點，下了一個定義如下：在資本制度下，每一個工廠有它的計畫，但出此以外，是無政府的，在蘇維埃制度下，有一個一般的計畫，但在各工廠裏面，是無政府的。人們對於字義的問題，加以注意，不爲無益，但過了一定的限度，就須拋開文字的辯論，而以事實的實際，現存的制作，過去的經驗爲依據。

英國諸位代表，給我們不少的貢獻。可是關於我現在所考察的問題，他們並不一致，在『計畫』這種問題上，不但詮解名詞，要多費唇舌，即感情作用，亦易生齟齬。假使蘇俄也有代表加入本會的話，我相信他的感情作用的表現，與賈罕穆博士一樣，但趨於另一方向罷了。賈罕穆博士站在老滿徹斯特派之觀點上以觀察此種問題，其同事維克爾斯君則不如此。我因想起一位老者，在他書房的牆上，永遠掛着一個美人圖影，相傳古代曾有那麼一個女人，也許從來世上就不曾有她，但這位老者每遇見一位麗人，他便遠遠的走開說，『不行！她不如我夢想中那位佳人，我願不認識她。』研究經濟學者，往往以虛擬的過去爲理想的極則，依我的意見，倒是在現代制作的光明之下，考察這種問題，比較收穫得多。因爲現代的制作，是不能破壞的，且除不能用作純粹理論的基礎外，却不能捨棄的。此類制作，如獨占事業，職業組合，司法組織等等，一面不要忽略了這些制作的存在，一面在可能範圍內，從事變通，以期提高將來經濟生活的水準，

這比借用韋爾斯的『光陰機器』作挽回過去時間的夢想，實在有利得多。只要站在可能性上，謀現代制作的改進，以求更適合於吾人的需要，這當然較勝於破壞了這些制作，倒退入一種質樸簡單的生活狀況。縱使質樸簡單到與愛丁樂園可以比賽的程度上，只令我們現在比較複雜的世界，處之益感不滿。

關於本會前途的工作，有極端重要的一點，就是盼望我們意大利的朋友們，不但惠賜我們一種關於團體國家概念的研究，並且把團體內種種制作目前的運用，作一精確的研究，更把意大利最近經濟生活的發展及變化，作一種附帶的研究，賜給我們。其他各國的同仁，也可作類似的研究，把本國的計畫，告知我們，並把本國現存制作隨着經濟政治的勢力而改進之方向，指示我們。

我現在到了第二個問題上，我聽到蓋奕博士的演說，感覺很濃厚的興趣。我希望他對於美國關稅問題所抱的樂觀，將有事實證其不謬。即保護派

中我們所稱爲和緩保護主義者，亦似應與蓋奕博士一致承認美國關稅壁壘之嚴峻，超出經濟理由之所許以上。很有興味的一件事，就是待看他的希望是否確有依據。可是在這種問題上，蓋奕博士也應承認：人們固然可以保持些希望，但是人們卻不會擔任些搜尋的工作，因爲人們不能對這種可能性加以調查，倘按照科學上的意義，解釋『調查』這個名詞的話。我們只好等政治前途的開展罷了，在那裏與別處是一樣的。

蓋奕博士又指出一點，『在關稅作用之下，工業移徙國外。』這是很可作爲有用之研究的一個題目。蓋奕博士以爲美國實業家移徙他國，乃一種政治上重要的因素，將使美國傾向於減輕關稅，我對此樂得表示同意。同時又有人對我說，美國徙入他國的工業，仍受美國資本的維持，他們很願美國關稅的減輕，但不樂他們僑居國關稅的低降。我還相信在一定情況之下，他們還是擁護他們僑居國內高度稅率的最堅決的分子。不過兩種傾向，互相衝突，已不可掩，我想這種情形，很可供富有興味的探討。至於探

討的工作，仍望美國的朋友出而擔任。

其他問題，凡我提議研究的，都經過了很有趣味的討論。關稅聯盟及以優待稅率作基礎之地方協定兩個問題，博得我們重要的貢獻。馬德家祿先生的特別注意之點，及他的演說，都顯出他對於現狀的實際，有清晰的見地，不限於理論方面的推究。我不敢確信，從現在就可對於優待稅率，作深刻的研討。或者在這一點上，也與在別的問題上一樣，我們仍須等政治事態的發展。我設想關於中歐的種種問題，尤其是關於丹牛波流域諸邦的問題，將隨着最近將來的政治會話，立即提出研究，而奧達瓦會議，對於大局現狀，也要發生影響。或者從今年一年之後，對於問題的原委，已得到比較廣博的知識，然後重開討論，也是可能的。人們對於優待稅率及地方協定之發展的可能性，無論意見若何，但大半對此項問題發言的人，都承認地方協定的制度，若得完滿的組織，必能把現在國際商業冰結的周匝，

此由現代思想及趨勢使然，——略打開活動的途徑。或者經過有限的

嘗試，這種協定可以逐漸推廣。

最惠國條約，乃一技術的問題，我們對此，曾有重要的貢獻。勿爾斐爾斯博士曾把德國的觀點介紹我們，賁罕穆博士及齊梅恩教授指示我們幾種可能的作用。人們常說，每次修改最惠國條約的時候，須公開地先把得失衡量一番，這句話很切理，英國的意見，則以為若把最惠國條約切實地變更，一定要引起一切商業協定的推翻，這樣作去，將使我們已得到的重大利益，一朝喪失，若求與此種相當的利益於將來一國與一國單獨新訂的商約中，或者很難再得。再說，世上倘使只有一國保持着低度稅率，而他國稅率相競提高，則最惠國條約，對於這個比較傾向自由貿易的低度稅率國，不復有利益之可言。不用懷疑的英國近數年來仍適用着最惠國條約，但英國所望由此博得的利益，遠不如昔日了，我們在英國得了一種印象，即在我們自由範圍縮小的條件之下，我們與別的国家屢屢磋商，不斷地磋商，而磋商的結果，就是我們若對於以公平態度待遇英貨的国家，讓開一步

，這一步讓開的權利，便自動地成了其餘多數國家的權利，連與我們並無交易或幾乎等於沒有交易的國家，都包括在內了。在這裏，我們對於法律性質的部分，覺得大有研究的餘地。

『門戶開放』主義，與上一問題相同的不止一點，在經濟觀點上與政治觀點上，都應當作深刻的研究，繼之以討論。『門戶開放』這句話，有時不過是法律上的假定，是水月鏡花，這種論斷，據一位注意遠東局勢者所發表的意見，證明是不誣的，他說，『無疑的，日本在滿洲要實行門戶開放，但是這個門戶，要被日本人擁擠得沒有別人插腳的餘地。』這就叫門戶開放，這是不韋的。

第三個問題，關於生產組合，諸位的演說，論及此者甚少，但我不禁要指明這個題目，是國家在經濟生活上干涉的一部分，現在尙綽有再加說明的地方。

其他問題，臨時發生的不少，但我覺得一一排列出來，可以不必。

我要再說幾句話，作個結束。若說我們此次會議沒有得到一種積極的效果，自是實話，但我們爲達到目的於異日，業已畫定路綫豎起標竿以利進行。

我確信我們對於種種問題的重要性，及對於在本會派有代表的各國中的思潮，從經過這幾天的合作，得到了更深刻的了解。我相信這個會議，——就它與實際相關的性質看來，是從來未有的一種會議，姑且把方法問題置而不論，——只是將來許多會議的前驅，將來的會議，當有比較更多的國民組織，前來參加，將來的會議，當有較長的時間，可以利用，把以科學方法對經濟問題政治問題討論的結果，集合起來，把不同的國民團體所供給的要素，會萃起來，以便進行另一工作，即學識廣博的人認爲在自己責任以內決不可規避的工作，再申言之，即關於這些重要問題，務須左右全世界的意見，因而影響於各國政府及各國內地諸領袖機關所採用的政策。

博恩教授發言：

主席要我以簡單的說明，作討論的起點，我覺得很有榮施。我不敢諱言，我曾審問自己，還是應當把沒有冒犯性的概括問題，提起討論呢？還是應當把實際的利益問題，提起討論呢？但後者決不能得到全體的同意，我只好採用前者。

大多數繼我發言的同仁，都贊同我的意見，這是使我驚訝的一件事。但細加思索，我纔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這並不是一件偶然之事。我們互相了解的順利，實出望外，——自少在消極方面是如此。我們的會議，也像其他許多的會議，受着環境種種刺激的創痛，失業和經濟恐慌的黑影，布滿了大地。就到恐慌以後，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問題，仍然要提出來。一日有國家，一日有經濟生活，即一日要發生他們雙方相互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無論何時提出來，總非解答不可。

在恐慌時期，人們應付這個問題的態度，絕非依據純粹科學的態度，可

是要觀察這個問題，還須用依據純粹科學的態度纔行。在大多數國家裏面，人民對領導他們的政府，很不重視，但一種出奇的現象，是他們又像深信政府有挽回劫運的魔術，於是遇到恐慌發生，他們便高聲呼籲政府的援救。

政府樂得干涉也罷，不樂干涉也罷，可是遇到恐慌，總免不了干涉。現在許多人們，認『恐慌之源，在國家控制之缺乏，』這句話，是一個定論，因為他們看見國家往往在恐慌中試行控制。依歷史觀說來，這是一種謬見，我想沒有一個人把戰爭爆發的原因，歸咎於滿徹斯特派自由主義之厲行。我記得，——假使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此派的主義所擁護者，倒是和平的政策，自由貿易的政策，各國民以善意互相對待的政策。人們可以說這個主義並沒成功，但人們不能在戰爭裏面，或媾和條約裏面，尋出實行滿徹斯特主義的一點痕跡。無疑的，威爾遜總統就是完全贊同滿徹斯特主義之一人，他的政治哲學的表現，便是滿徹斯特主義哲學之復活，但

是他只在紙上應用。再說，國家的干涉，十年以來，甚形發展，在恐慌期間，尤大肆擴張，我却不信它得了許多的效果，我不信操縱價值的制度，在世界的部分已告成功，我更不信以限制輸入貿易企圖增進輸出貿易的努力，博得愉快的收穫，在這一點上，我們全體一致，對於國家的干涉像現在所施行的，認為毫無用處，這種局部枝節的干涉，幹不出一件有益的事來。關於計畫的經濟，我們最近曾發了許多議論，我在國內，宣傳這種主張，已逾六載，但如沙漠中傳教，沒人肯聽，沒人肯聽，我倒轉喜，我倒感覺一種滿足，就是也沒有人來反詰我一句。我於是這樣說，『我們現在已走到計畫的經濟裏面了，但是一種無方針之計畫的經濟罷了。』這就是世界大部分自那時通行的政策。

依我的意見，若僅就目前的恐慌，把這個問題作片面的研究，是不彀的。一個恐慌。需一個救急的藥方，這種情形，在一個學識宏博的人視之，倒很覺得簡單，可是他在再造世界的大業中所能擔任的最要職務，就是不

要對言大而夸的任何人，僅以寬恕的態度向他說，『總須做出一點事來』。倒要聲明『或須做出一點事來，但切不可如何如何地做，如何如何正是決不可做的。』我所以感覺愉快，正在看見一種設計，被採納了，這種設計，就是爲把各國國家干涉不同的方式，——戰前的及戰後的，——所得的結果，成敗的原因，及釀成結果的要素之性質，以不偏不倚的精神，從事研究。所以我曾說過，僅僅指定國家經濟關係的界限，是不够的，須得把國家性質的問題，徹底研究。國家與它的憲法，若嚴格以文字繩之，離開很遠，這是觸處皆然的事實，但亦因統治之人而異，要了解德國憲法的運行，不止要研究這個憲法，還要知道什麼是德國實業的聯盟，職工組合委員會，土地聯盟，以及其他組織強固的集團，這都是在憲法背後作用的力量。

蓋弈博士在我們的討論中間，貢獻了一種有用的意見，他勸我們以科學的眼光，研究那『狼狽相輔以分利』的藝術，我確信在他的國內，人們把

這種藝術很能用得適當，但他們公開用之無慚色，我們依樣用之，却惟恐人知，且不敢急進。

許我再貢獻一種提示嗎？我以為就各國分別研究，還是不夠，要完成一種有用的工作，同列中須有一個中心，這不僅是形式上的需要，並且代表這個中心的人選，須得一富有經驗者，能與各種研究委員會，商榷题目的選擇及研討的步驟，務期薈萃他日公開辯論的要素，我以為這是極端有用的準備。

還有一個出現的問題，便是差不多人人都提說『計畫的經濟』。『計畫的經濟』，其中含有許多的意義，我相信我們同仁都贊同我這一句話『計畫的經濟若只作局部的應用，便毫無意義。』它只能使他應用不到的部分，重加困難。

丹麥的工業，其組織強大者受着局部的控制，遇到極大的困阨，至於小工業方面，其中包括許多小規模及中等規模的企業，雖與無政府狀態為鄰

，却很能舒展自如。大工業既不知有競爭，彼此都知道對方手中的牌，能把自己的經濟調節到如意的地步，但作出來許多大謬的事，他們有一種名貴的藝術，就是把自己的損失『社會化』。他們偉大力量，能够使全國被其影響，贏益則據爲己有，損失則散之衆人，於此可見計畫的經濟，用之於一隅，毫無益處。那麼，若要漸漸地建立一種計畫的經濟的體系，使它至少在理論方面，可以與自動調節的舊體系較量長短，是否係一件可能的事呢？

我們從來沒有親眼看見那自動調節體系的自由運行，卽革命人物中主張自由競爭最激烈者，也明白若無政府博大的干涉，自由競爭是不會收效的。卽如滿徹斯特派，想分裂英國大地主的土田，造成農民的私產，還是仰仗着國家的干涉。我記得泰晤士報曾評論這種態度，謂係社會主義的嘗試，人們在那時候，把自己不贊成的一切計畫，一切方法，都加以社會主義之目，今日則大不同了，今日的人，似乎沒有一個對於資本主義，仍抱着

信仰，便是資本家自己亦然，這是我完全了解的。試問一種體系，並資本家亦不能從中取利，還有什麼用處呢？

我們總想把兩種不能比較的事情比較起來，我們一方面總設想有一種自動調節的交易制度，——在理論上沒有缺點的，——管理着經濟生活，其實這個制度並不會存在過，也不能存在。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相信有一種計畫的經濟制度，也經了委曲詳盡的籌畫和第一種一樣，但是還沒有實行，我不知道除俄國外這種制度的存在。俄國用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能解決些問題，因為今日組織生產，並不是一件難事，困難之起點，就在人們要組織銷售的時候，但當消費上的統制，施行於一個生產不敷需要的國中，要按預定的計畫，領導整個的經濟，原是很容易的事，尤其是把所作一切開罪於人的過失，一概不計。凡不受指摘的過失，便沒有認為過失的必要。

在我們西方的世界有兩種計畫的經濟，方法不同：第一個是從生產着手

，控制資本的活動，我們在這裏未曾討論這個問題。另一個是以控制消費為基礎。我相信我們能構造一種理論的體系，站在第一種或第二種的方法上面，但在實行上，却免不了縱橫交錯的一點。總之，在多半的情況之下，的困難，不是覓得一種方式，是要知道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手段，在若何限度內適用這個方式。

我曾自己表示，是對於現代營業家一個很苛刻的批評者，近來營業家墮落得不堪了。但這並不是一個信仰政府對經濟定有辦法的理由，許多的政府，無聊得實在可憐，他們連自己預算案的平衡，都不能妥適地建立。即在辦法比較容易的時候，我不信一種概括計畫順利的進展，就是成功的保證。物價構成的體系，極端的複雜，當我們不願把它完全剷除的時候，實在不容易把這個統治權，付託於國家的某一機關。

我和鐸爾東博士一樣，希望再多得些消息，不但關於團體國家的組織，並且關於它值此困難期間在經濟範圍內所已得的效果。在大多數的國內，

要創設些必獲實效的機關，是不容易的。我不敢確信一種受中央官房人員統制的經濟，比較受一般營業家領導的經濟，貽害較少。我很願承認由其統制所犯的錯誤，總會較少，可是倘有錯誤的話，一定是比較嚴重的錯誤。

我不提倡舊制『任他作去』的恢復，只要是獨占事業存在的地方，就斷不能不加干涉。

將來恐慌時期告終以後，就是劃定國家干涉的界限的時候。我確信這種界限，非堅定不移的，在世界無論何國，沒有見一種新定的單純的經濟制度，能把別的制度，完全驅除，即在歐洲最足代表新時代的英國，其封建制度，（即如在農業範圍內最近猶實行的）還保持在現代商業生活的旁邊，一國如是，他國亦然，

意大利做的一樣好菜，名作『和炸』，其中有各種的肉，各種的菜，混合在一起。將來的經濟制度，當是一種和炸，其中的作料，將應時而變，

但總是一個參合的制度，而參合的內容，且因地而殊。

在我們所討論的種種問題的底裏，有一個根本問題，曾經馬夏維里第一次在意大利提出，見於『君主』的末了一章。他在這部書中，建設他那『共和國由人造而成』的理論，他的思想，依下面他說的話，可知大概。他說，『由觀察人類的行動而着手一種政府體系的設計，是有可能性的。』他算是發表這種實用意思的第一個人，許多思想家創出種種夢想的共和國，惟他一人是尋求政治的藝術。但是在這部書的末章裏，他忽然懷起疑來，他反問自己，『若專憑觀察與理解這種手段，要建設一種政治的體系，究竟是可能的事嗎？說到究竟，人類的事業，不是受着偶然與幸運的支配嗎？』但他在結論中，又說幸運是個婦人，常用狡滑手段，但在狡滑手段的背後，又有自然的力量，自然的必要，自然的秩序，帶着固有的法則，人類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志，能使此種法則爲自己服役，於是便博得幸運的青眼。

我相信他的話對於我們討論的經濟問題，也有一部分的道理。計劃的經濟，假使我們認為可以武斷行之，便毫無用處，誰要統制自然，須得先學習服從自然的法則。假使我們以這種思想的態度，着手我們的探討，我相信在一定限度內，我們可以發現或重見真正的經濟法則，及若何適用此法則於世界的手段。這個世界，不是憑信偶然，却是被理智領導着。

亞摩羅蘇教授發言：

對於適纔所講的話，我的答覆，就是我們初不過想提出一個原則的問題，能把團體主義作概括的討論，並指出這種制度在實行上如何運用，這是饒有興味的事，再觀察足以表現他的特徵的唯一方法，即如何把種種變化導入經濟領域的方法，這更是饒有興味的事。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提議把團體主義的研究，列入下屆會議的議案中，於是我們就能研究關於這個主義的種種法律。一面又可研究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展進的種種趨勢，及此種趨勢在國際經濟生活上所發生的間接影響。

我們請求本會特別注意處，就是上述幾點。

誠如人們所說，在國際的領域內，沒有一個最高權力能強迫厲行，以是之故，就要在理由上施展作用。正在構造中的新經濟，將在各國相互的關係上發生影響，就是在這種問題上，我們希望下屆的會議加以注意。這就是我正式請求把團體主義這個問題列入下屆會議議案中的原因。

主席發言：

亞摩羅蘇教授的提議，送交提綱委員會。

加洛愛彌利約斐里先生發言：

諸位先生！我先請原恕我最近兩日未能到會，就我所負團體行政部代表的任務論，我應當以最深的關切，追隨着進展的討論，傾聽諸位名流願把自己由科學與經驗得來的光明貢獻到本會的演說。

團體行政部對於國際的科學思想在現代生活大問題上的貢獻，用着最深刻的注意，我們的部長卜戴 (Bottai) 先生，他自己便是一個聲價甚重的博

學者，但他仍徵求一切博學者的意見，他確信在實行與經驗的旁邊，研究與科學當帶來指示正路的光明。

這就是爲什麼前幾天在費拉爾（Ferrare）開團體大會的時候，有些外國博學者也被邀請來參加討論，名流如宋巴爾（Sombart）馬那賴斯舉（Manoilescu）諸先生，在該會均有所貢獻。

在該會閉幕時，團體行政部長邀請諸位外國碩學，研究意大利制度，在這種制度的範圍內，任其隨意調查。將來由科學得到的結論，無論出於何國學者的見解，將一律被擔任意大利團體運動領導的行政部，加以聚精會神的重視。

因此，我敢對布各勒先生負責地聲明，外國若有願研究意大利制度及其發展與效果的人們，將得到團體部所有的同情及贊助。我再對鐸爾東博士說一句保證的話，我們的部長，將竭力使外國人時時有考察我們制度實施的機會，所幸已有團體消息公報，用着法德英三國文字出版。

我現在有個提示，願請本會裁酌。在討論關稅政策中間，繼摩爾達拉教授精彩的講演之後，齊梅恩教授曾揭出各國經濟委員會之重要性。意大利團體的國民委員會，表現出這種趨勢最充分的發展，且普遍於全國。齊梅恩教授的意思，——假使我沒有誤會，——是請本會相信，各經濟委員會若能合作起來，必大有貢獻於國際關係的利益。我應當感謝齊梅恩教授，感謝他智識上的贊助，因為他這種建議，就是我們的團體部長在日內瓦所提出的，初則他提到一種關稅息戰運動的會議中，繼則以更充分的說明，提到最近開過的國聯大會。

這個建議的目的，在使各國經濟委員會相互的接觸，日益加密加勤，使各方的經濟力量，各處生產者的組織，日益接近，而永遠總在各國家控馭之下，一言以蔽之，把意大利特別適用而有效的團體制度，導入國際的範圍。

或者在這條路上，可以得到彼此合作與互相了解的實效，為以前許多經

濟會議所未曾得到的，在卜戴部長的建議以前，各國經濟委員會代表已在日內瓦聚過一次，至於他的建議，已受了國聯大會的贊同。

我再舉一個證據，國聯經濟組有名的主任沙爾特爾爵士在他最近出版的『現代經濟問題』中，曾提及我們團體部長的建議，並認為關係着極大的利益。

因此我敢向本會提議，在下屆會議的議案中，加入應用手段的研究，務成立一種國際經濟合作，即在各國已設或將設的經濟委員會之間，成立一種連索。

主席發言：

斐里先生的提議，當送交提綱委員會。

主席爲本屆會議閉幕致詞：——在討論議場情形的公布手續以後。

當本會議的工作告終，惟一的決議，就是請求世界文化合作社擔任這個公布，我們已一面把準備下次研究大綱的任務，交給提綱委員會了。

在這種情況中，我只有宣告本會議工作的終了，同時申謝惠臨參加本會議的同仁。這些工作，我們不用疑議，當有最恆心的作用，使各人各國凡留心於我們所注意的不幸問題者，都得到相互的了解。

我宣告本會議閉幕。

午後十二點十分閉會。

德國備忘錄，——關於商業政策與經濟制度。

博恩大學教授伯克爾拉特撰。

附註：

左錄的報告書，係抽取自一本很完全的備忘錄，題曰『關於商業政策之政府的國民的及國際的方略』。曾經柏林的國際關係委員會送交於本會議，這件公文，包括四篇及一篇補充：（一）歷史觀的緒論，題曰『商業政策現狀的歷史觀』，柏爾克希特來塞爾教授所撰。（二）影響於德國商業狀況之本國的及外國的種種策略，共分三章：第一章題曰『戰後德國商業政策的演進』，席柏爾柯博士所撰，第二章題曰『影響於德國商業之他國現行的商業策略』，蒲林斯博士所撰，第三章題曰『世界商業關係現狀的試論』，勿爾斐爾斯博士所撰。（三）『目前在國際商業上作用的種種策略之因由』，勿爾斐爾斯博士所撰。（四）伯克爾拉特教授關於現行種種策略及方法在商業上之作用的報告書。

(五) 補充的報告書，題目『德國發展輸出貿易的方法』，席柏爾柯博士所撰。

現代的恐慌，不但其週期性引人注意，即其形態而論，亦值得研究。消解恐慌的努力，若要成功，我以為最重是要靠着一種舊思想的復興。這種思想，現已消失殆盡。我說的舊思想，是指着人們對於國際經濟政策與國內經濟制度兩者相依爲命的感覺，這種相依爲命的性質與作用，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它的基礎，有兩個重要的原素：第一個是資本貨物與勞力的交易，自一世紀半以來，已把各國密切地聯在一起，於是其中任何一國的經濟生活，骨子裏都變成國際的了。

投入外國的資本，是爲着鼓勵輸出的貿易，爲着增加本國的收入。人們常看見外國的資本投來，爲的是剝取原料勞力與工具。消費品的輸入，在許多國成了生活必需的。開發本國的生產，要獲厚利，常需輸入原料。改善技術的組織，增加勞力的效率，往往非購用外國的機器不可。反過來說

，輸出的貿易也是不可少的，因為要僱用勞工，開消輸入的貨價。末了，用不着一國不一定需要外國的工人，也是常有的事。但歐洲的老工業國家，根本上是資本制度的國家，被這種關係聯得最緊。這種關係，不是割不斷的，但須承認，割斷此種關係的代價，便是物質生活水準的低落，社會狀況中及經濟組織中的革命。

國民經濟生活，與國際經濟生活相依爲命的基礎的第二個要素，是一般的不安現象，使各不同的貨幣制度，感受靈敏的作用。原來幣制的性質，根本上就是國際的，其含意就是一國經濟中或一國貨幣中發生的變化或紛擾，要引起他國內相當的變化或紛擾。

在所謂自由的經濟體系裏，包含着無限制的私有財產，締結契約的權能，個人的責任，以力量的自由發動造成經濟生活上自動調節的組織，這種相依爲命的關係，需要些特別制作的創造，以供國際商業政策的應用。這種體系的維持，就是在世界諸領袖國家內一種自由經濟秩序的運行。國民

投資與外國投資的自動分配，按照着生產與贏益顯著的可能性，各種實業之間生產工具的分配，按照着供求律的變動，這兩項分配，非在安全與穩定之中，則不能實現而有成功。這種安全，這種穩定，在戰前到處是有的，因為從十九世紀之初直到二十世紀之初，被歐洲殖民的各地，或被歐洲領導財政的各國，都只得接受了歐洲人的法律思想，——其源實出於羅馬，——並遵守差不多一律的各項原則，這些原則，限制着私有財產，保護着個人權利，以對抗國家的干涉。

在實行上，各方面視線集於一點的原因，可以歸之於一種事實，就是在歐洲各國內部的政治局而，換言之，即與資本主義直接或間接有關係之各集團的最大勢力，要求如此。有的國內，就私有財產在城市階級與中等農村階級之間分配的情形說來，絕對的民主主義，不過在理論上接受了，其實個人在享有的權利及締約的權利上，完全是自由的，國家的干涉並不存在。此制行於法國，法國只有中小的私產與規模不大的企業。在瑞士荷蘭

丹麥等國，情形與法國略同。但在大工業國家，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占較強的成分，資本主義及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法定秩序，倘有左右國家及立法的勢力，這是已現於美國的事實，即英國亦有之，因為資本主義能使封建的及宗教的貴族勢力，供自己政治上的利用。這種情形，直至歐戰，始改變了。有幾個歐洲拉丁民族的國家及海外的幾個國家，其國內財富，實在分配不均，無產階級，為數既多，成羣甚大，然一種準自由的經濟體系與法定秩序，尚能維持穩固，仍多虧掌握實權的人，與其說是國家在政治機關上任用的居間人，不如說就是資本主義及它的代表。在歐洲中央及東部幾個比較獨裁的國家，官房政治，雍容坐鎮，一定沒有資本主義的趨勢，至少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所含的工業商業的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的，他們所不忍捨棄的，寧可說是國家主義的理想。雖然如此，政府却保護他們國內的資本家以抵抗外國的競爭，並抵抗國內社會主義漸漸滋長的勢力，他們確信國民的昌盛，對於武備對於財政上的威權，都有重大的關係，而國

民昌盛的憑藉，却是經濟的自由，法律的保障，尤其是工業的資本主義。這些經濟的基礎及資本主義的法制的基礎，在不同的國內，從前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現在還是的，但這些基礎，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結果，資本主義，保不住這些基礎的維持。

不過在自由經濟的法定的基礎與人們對於安全及穩定的信仰之間，存在着一種類似性，也許是真實的，也許是偶然的，然即此可見一種國民的及國際的健全經濟體系所不可少的條件，還須於此中求之。

此種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及各國經濟狀況之類似，經種種國際協定而其度益高，尤其是經商業條約的締結，這些商業條約，不但促進國際商法的畫一，並且贊助國際商業立於相對安穩的法定基礎上。

大戰以前，在十年又十年接續不斷的長期間，人們建立了一種商業通融的制度，使一切利害相連的國家，差不多同時都訂立了關於關稅及減輕稅率的長期商約。在這種制度裏，協定的關稅，被最惠國條約化繁為簡，最

惠國條約，差不多適用於全世界，爲世界商業建立了一種畫一的基礎。以是之故，雖有保護關稅，而國際商業，保持着頗能自由的資本交易貨物交易，因爲有長期的穩定的公道的關稅協定，作交易的護符。這種協定，供大多數國家國外貿易的利用，沒有任意的輕重厚薄，足以破壞商業關係經常的平衡。關稅的壁壘，只要沒達到一種罕見而且未聞的禁止程度，其阻礙國際交易，並不如那關稅立法中不可解釋的變動與區別之甚。

資本主義的世界，這樣地建築在一種商業政策上，建築在一種相對畫一相對穩定的法律體系上，——尤其是關於關稅，——在和平中已達到了生產力的異常高度。

這種狀況，又得了一種事實的保障，即金本位幣制，以英鎊爲基礎，統制經濟的世界，保證貨幣價值相對的穩定，尤其是保證國際交易的穩定。這就是說，它保障着物價的固定，物價即國際交易的價值的母數。利率及物價在世界市場上相互的作用，若要和諧地進行，須在一種擾亂沒有可能

性的時候，此種擾亂的原因，即貨幣的膨脹與緊縮，及由此膨脹與緊縮引起的種種結果，例如資本流動的變化，及其他類似的情形。生產與交易的進行，若要追隨供求律的自然領導，須不受匯兌漲落在輸出貿易輸入貿易及國內消費上所生的影響。

由戰期間及戰後所得的博大經驗，教我們知道世界的市場，及其貨幣的組織，法律的組織，各達到圓滿的狀態，這是對於各國國內自由經濟制度的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不論採用此種制度的國家，與世界經濟有無密切關係。這種狀況，一旦發生變動，就免不了國家爲保護國內市場所施的干涉，輸入與輸出的限制，尤其是各地方在一定期間輸出輸入數量的分配，國家商業的獨占，爲防遏『達冰』主義而設的禁止性的關稅，國家對於資本出入的控制，束縛貼現的嚴密條例，及對於中央發行鈔票銀行開放信用的限制。這些策略，都包含着國家在私人商業上的干涉，尤其是輸入輸出的限制，在國民經濟的活動上，大有妨礙。

所以在歐戰以前，國際商業的活動，常在貨幣具有通用性與穩定性的狀況中，從容地進行，這是爲維持各國內部自由經濟必不可少的條件。試看凡由商業政策貨幣政策等等的變動所引起的紛擾，往往使私人商業受重大的損失，即使這些私人商業，根本上並不是贊成干涉政策者，然有時不得不請求國家的援助與調劑，像這種事實，足證斯言之不謬。他們的請求，在一種意義上，確有正當的理由，就是在自由經濟的原則上，私人企業，只應對於由自己能力的缺乏及私相競爭的偶然不幸而致的損失，自負其責，至於由國家的對外政策或由政治原因引起的幣制變動，致私人企業蒙其損失，其責就非私人企業所應負了。

這種理由，在去年一年中，益形正確。金本位的破壞，——近來恢復金本位，仍感很大的困難，——使輸入輸出及匯兌事業上的種種限制，成了必要之舉。它破壞了自戰後恢復的制度，破壞了以關稅協定及優待條件作基礎之有利而期長的商約。破壞了這種條約，就是剷去了商業的基本，且

同時對於差不多各國都有的主張干涉反對自由一派之論調，新添了一種力量。

在我們這篇論文的第二部分，——就是現在要說到的部分，——我們要堅執地說，一切國家主義的及干涉主義的經濟體系之適用，與自由主義的國際政策之可能性，是不會並存的。這個論斷，有兩種理由，可以證其正確：

(一)一切控制國內生產及遇必要時控制國內消費的努力，一切藉國家干涉務在影響於營業的財政方針及財政管理之企圖，一定包含着輸入貿易的監督與限制，以及輸入價格的規定。如此，則國際的經濟，應永遠視為在國內經濟制度上一種搗亂的因素，人們將一致努力謀減殺此種搗亂因素的作用，使降至最低度，於是限制輸入，制定伸縮自由的稅率及輸入貿易的獨占，監視外資的出入，設立一種所謂最高政權所定之保護主義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私人商業的國際交易上，受着國家直接的控制。

(二)一切干涉的政策，足以破壞或危及以金本位作基礎之市場上自動調節的平衡者，對於自由經濟政策，便是一種險象。金本位的維持，若當作國際幣制的維持看來，並不依賴種種操縱國際信用的智巧手段，也不依賴世界上黃金的分配。維持金本位的條件，只要物價及不同的利率，到處能表現出一幅商業狀況的寫真，只要一切投資，及商業活動的一切方式，除贏益外，無他目的，再就概括的情形說，只要政治對於市場，不生影響。支付的均衡，乃維持國際的比價（即金本位）一種必要的條件，要保證支付的均衡，就要物價能夠在一切國內，對貨幣的狀況，發生敏捷的作用，就要資本在世界上的流動與歸宿，專由贏益與生產力之計較而決定。同時還須物價與工資的運動，在全世界上能贊助生產能力與贏益上天然不均的調劑，其道在能使各國民所有的質素，例如勞力，在生產力薄弱的地方，比在由歷史或天然造成的富源廣大的地方，維持於較低度。支付平衡繼續不已地簸蕩，一定要動搖到最堅定的金幣，為避免此種簸蕩而用暫時策略

，如國際借款，及輸出黃金，或輸出外資，均不能有濟於事。惟一可能的救濟方法，就是增進輸出的能力，減少實際的工資，或用其他手段在自由市場上減輕生產的成本。一種維持工資於固定水準的政策，或遲或早必至於消滅金本位。

一年半以來，我們看見國民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制度互相摧殘。金本位與國際信用體系的崩潰，自一九二九年後，勢已岌岌，經一九三一年春奧國『信用建設』之傾覆，遂不可免。這個崩潰，大半由於一種事實，即在各債務國家，國際信用的組織，就地理上投資的分配而論，就信用機關之取捨而論，就信用之形式而論，均不復受尋求生產力尋求贏益尋求放款於容易提回之地的視線所領導。這却應歸咎於由戰事及和約所產生之政治性的巨額債務，及直接或間接歸咎於國家的干涉。這些債務的籌償，往往陷負債的私人負債的國家及他們的貨幣制度於破產。

這種情形，因一種事實，益趨嚴重，就是世界貨幣信用一大部分的凝滯

與破壞。這種事實，在最近幾年內，引起世界物價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跌落，物價的跌落，使差不多一切債務人及債務國均受其影響，其結果爲許多貨幣的消滅，自由商業政策暫時的破產。爲避免幣價變動在各國經濟及法制上所生的重大結果，人們曾竭蹶努力以維持幣價，負債過重的國家，對於輸入輸出，設立了種種的限制，這種策略，迅速的動搖了自由貿易中強固而穩定的商業制度。世界商業的恢復，已顯見非一時可能的，藉重世界商業的國家，因而陷於悲慘境地。人們被包圍在循環無端的圈裏，並不能商議出圈的手段。而且當時的困難不止於此，危險的趨勢，又受各國內社會主義干涉主義種種措施的作用，其力益增。在幾個最大的工業國家應當決定內地市場物價的自由力量，受國家的拘束，於是高漲的物價，能在商業活動的重要範圍內，繼續維持，尤其是在勞力的市場上，但在許多生產的部門內，也是如此。所以要維持支付的平衡及匯兌的價格，縱不敢說幾不可能的話，也可以說是極困難的事。雖然輸出商已承受重大的

犧牲，人們仍無以應付輸出價值的縮減及短期債務的迫償，反見得種種嘗試的努力，適足促恐慌之進步，因為陷於凝滯狀態的資本，不肯坐失贏益，就要出國，資本的流出，就動搖了或完全破壞了一切經濟貨幣的制度。奧國就是如此。在許多國內，農業狀況較工業狀況尤為可悲，此種事實，需要國家援助，或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國家干涉，如關稅的提高，輸入數量的規定，及其他種種保護的方略。這種方略的自然結果，就是使國際商業益發破壞。

個人企業與私有財產的創造力勢，不能再建均衡，使世界商業已破壞之部分，恢復原狀。須得制定法律，為商業及國際財政立穩定鞏固之基礎。比較自由的經濟定律及經濟原則，要得恢復而穩定，當回轉到和緩的保護主義，回轉到長期的關稅協定，包括着最惠國條約，回轉到國內與國際貨幣的穩定狀態，這就是說回轉到金本位。以種種不同的貨幣制度為國際的組織，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因其為技術方面與政治方面種種理由所不許

。末了，須把匯兌價的法定基礎，重新地安定起來，不能靠資本家及企業家私人的勇氣和聰明，提倡這些方略，況且他們能領導這種努力的途徑，保不定時常開通着。

這種恢復事業，非世界各大國——尤其是歐洲各大國——站在政治和經濟的立場上，同時協力合作，不能行之有效。這是對於和平，對於合法的穩定與安全，對於商業條約，對於保護稅率，對於最惠國條約的原則，對於金本位，無一不適用的結論。要把這種恢復事業的一切條件，一切因素，結合起來，就要把那些非出於經濟要求的要求，排出國際信用範圍之外。此等國際債務，在經濟方面本無正當理由，不但債務國非破壞他們的商業與貨幣，無以應付，就是世界自由經濟原則的復興，也須以消滅此等國際債務為先決條件。除此而外，人們沒有別的方法能穩定國際金融的狀況，國際金融狀況不得穩定，人們永不能回轉到純粹經濟的舊制上，惟舊制能使資本的運用，匯兌的業務，均不受擾亂，不受干涉，不受限制。

假使人們看着那唯一能夠對各方面利益保證其自由而合理的合作之一種經濟，其法律的商業的貨幣的信用的各項基礎，在國內及國際上並無再建之可能，人們將在此經濟紊亂中，竭無用之力以謀穩定支付的平衡，及目前的幣值。這些嘗試，及各國爲鞏固國內市場仍將努力的其他嘗試，都只能使關稅不斷地增高，使輸出輸入數量的規定不斷地加密，使匯兌業務上的法律細則益繁，使政府的保護主義愈厲。

這些方略，勢將把世界分爲閉關經濟的許多地帶，或者一國自爲一帶，或者因關係之密切而數國併爲一帶。這些劃分地帶的國家，其從前與國際市場國際交易關係尤爲密切者，至此時感受孤立之不利必更速。不利的狀態將顯露於各國經濟的結構中，形成種種的擾亂，擾亂起而內部種種的方略，必立隨其後，如國內商業上法定的細則，國內各種工業上國家的補助，及其他極端干涉的種種方式。加以私人企業中的失意，衰憊，經理乖方，亦使國家干涉成爲必要，私人企業中這些缺點，當歸咎於國際商業下法

律基礎貨幣基礎之破壞而發生的不定狀況，及歸咎於資本的短絀，於是國家不能不竭力以謀營業之進行，並不用私人企業的贊助，結果就不能不藉財政的手段，藉消費的限制，對於經濟建築的維持，謀保證應需之資本。

依我看來，在這種情況中，要維持生產力現在的水準，這就是說，維持現在生活舒適的程度，很少可能的機會，尤其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的國家，因歐洲正是國際經濟關係的網絡籠罩甚廣的地方。一種干涉的經濟，只能得到不幸的結果，如果它——就像今日這樣的，明日還不免是這樣的，——只是把種種救急的方略，及種種偏僻的方略，湊合成一件鑲嵌物，而並無計畫與原則的統一性，只是把這些方略，納入一種本不適用的經濟制度中而適用之。其實適用這些方略的各國，其自身的組織，就缺少統一性與調諧性。干涉主義即在順暢的物質環境及適當的經濟秩序之中，亦不見得能滿人意，況今日國民經濟，到處是站立在本國與外國的財政關係上，站立在外國原料及食品的輸入上。那麼，干涉主義的制度，若與世界商業是

隔絕的，換句話說，若與它自己的經濟基礎是隔絕的，怎麼會運行呢？

但不能因此便作一結論，說：因為金融市場及世界商業所受之不定狀況的壓迫，因為規定輸入輸出數量的制度，不利於國際商業，各國將完全隔絕而陷於孤立。假使世界關稅的戰爭拖延日久，各國就要為取得一定之國外市場而奮鬥，為取得一定之輸入品而不憚用直接以物易物的手段，不惜用締結優待商約的手段及其他類似手段。但設使一個國家既有它的特產，又能傾銷於世界市場，惟其輸出品仍不足以抵償其必要之輸入品，這個國家，一定沒有在關稅戰爭裏保持地位的好運。交易上所有的可能性，並不能使我們希望足以維持在歐洲大多數工業國內現在的經濟水準，換句話說，現在的生活水準。

今日的問題，並不是如何組織一種干涉主義的經濟制度，包括着貨物的交易，優待的稅率，輸入輸出數量的限制等等，也不是如何組織一種穩定的經濟制度。這種的組織，要有可能性的話，惟有全世界服從一個干涉主

義的政治權力，換句話說，惟有全世界一致地社會化。這不僅是因為有些國家實行着自由經濟制度，同時其他國家又適用着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其間無建設一種相當畫一的經濟秩序之可能，而這種經濟秩序，定要站立在一種有組織的政府作用之上，定要站在對於原則的意見統一之上，並且因為社會主義，業已分門別戶，其應用亦當然互異。

人們可以隔絕世界的一小部分，或從來與世界經濟比較疎闊的那一部分，（即如蘇俄，）採用以獨占統制輸入輸出的手段，或類此的手段，尙不至動搖全世界的經濟生活，或獨立地帶的經濟生活。

但蘇俄在它組織獨立經濟體系的嘗試中所遇的困難，也許一部分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的反射，這種反射，阻礙了蘇俄輸出貿易的發展。反過來說，俄國內廣大市場一部分的封閉，也許對資本主義方面恐慌的延長，應當負責。無疑的一點，就是一定的銷場之部分的消滅，若波及於以國際關係為經濟生活基礎的國家，必使這些國家及全世界的交易與發達，重受

壓迫，或完全陷於癱瘓狀態。

奧國備忘錄，——關於國家與經濟生活。

領事事務研究院及高等商業學校教授克爾夏葛爾撰。

經濟生活中國家干涉問題之重要性，三十年以來大有變化。歐戰以前，有幾個黨派，——即如社會黨，——的大綱，在理論上包括着生產的國民化及社會化。這種國民化的界限問題，已成科學式的討論的對象。但在事實上，人們自相質問的，不過是究竟把最大城市中煤氣電燈的管理權，交給私人企業較好呢？還是交給自治區的公共機關較好呢？究竟把鐵路放棄於私人組織的公司較好呢？還是使受國家部分的或完全的監督較好呢？若說到國家及其他公共機關在經濟生活中的干涉，就經濟世界的意見概括看來，還是傾向於一種有節制的自由主義。

就另一方面看來，間接的國家干涉，完全都接受了，或者只有英國是個

例外。歐美人在自由貿易中只看出一個烏託邦，他們把保護他們的工業和農業，認爲他們經濟政策中最重要任務。

根本的變化，在歐戰期間釀成。爾時人們曾以宏大的努力，務擴張國家的監督權到生產和消費上，在一切交戰國，此種監督權，甚至擴張到與社會主義理想爲鄰的程度上。在許多年間，生產不復受私人企業的保護而受一種新經濟制度的保護，這種經濟制度，乃出於國家的命令，受中央官廳的監督，同時受工業領袖人物及國家公務人員的指導。

歐戰以後，在協約各國，此種中央官廳，不復存在，其他戰敗的國家，經過了一個通貨膨脹時期，由通貨膨脹引起生產消費的合理化，與戰爭期間的合理化相似。加以各種的因素，都向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路上不息地進行。中歐的革命，是社會主義者的勝利，許多社會黨員，做了總長及內閣總理。這個革命，在歐洲產出三個，博爾希維式的國家：赤色的匈牙利，赤色的巴維亞，赤色的蘇聯。後來只有蘇聯存在着，它的影響，被於許

多其他的國家。再則，一種老經濟指示出來，在狼狽時期，比較在經濟和平國家昌盛的時期，愈感到國家干涉經濟活動的需要之迫切。末了，不要忘了一重要點：人們當能看出國家在一般經濟上的干涉，並不專藉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制度的助力。一種新制度，我們可稱爲法西斯蒂制度，不但已經構成，並且已經實行於意大利。人們還提出其他種種制度，見於大部門的科學著述中，如西班牙教授所著的『宇宙主義』，德國國民社會主義派發表的『一種無贏利的經濟制度』。

一切袒護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的論調，一切對於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抨擊，或理論的，或實行的，及國家在干涉嘗試中所遭的一切不幸，均不能取消一件歷史的事實，就是我們正在過渡的經濟恐慌的蕩動所引起的國家干涉，比較在戰前五六十年間所有見諸施行的干涉方略，擴大得多，重要得多。了解這種運動的直接原因，定然是一件富有興味的事。

對於經濟生活上國家勢力增長的重要原因，若用一番調查工夫，便顯見

是貧困，這貧困在歐洲的大部分尤其在中歐，算是大戰所賜的。在許多國內一大部分的人民，沒有穩定的收益來源，甚至沒有維持生活的充分工資。奧匈老帝國的破裂，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分崩，害及他們生產內一切範疇的存活，因之危及連千累萬人民生活的憑依。

工作便是生存問題，這是很顯明的。曾爲他們祖國不計犧牲了多少鮮血多少金錢的人們，所要求於他們祖國的，是保障他們最低度的生活，尤其是在戰後。失業是由國家的矯揉造作發生的結果，因爲國家喪失了充足的經濟源泉，數十萬人民靠着不自然的收入生活，換句話說，靠着賑濟，其他雖靠着工資生活，而工資所由出的工業，也是以不自然的方法創造的。在一定程度之下，各國的狀況，大概相同，由於戰債，賠款，及其他內外公私債的償還，財富的分配，決定了收益的調劑，而這種調劑，又成了直接稅收入短絀的原因，因爲在歐洲各國，直接稅是以累進率作基礎的，於是增加消費稅，致一般的生活水準，被消費稅壓到無地再降的限度上。在

這種情形之下，由資本化的儲蓄中所挹出的天然蘊藏，歸於烏有，若恐慌一露端倪，國家干涉的必要，愈形迫切。在最近數年內，銀行及工業，差不多每過一個恐慌嚴重的時期，便不免乞求政府的援助，爲的是避免將來更嚴重的危迫，致增加失業，促成一般破產。可是政府除過賦稅關稅而外，並沒有經常的財源，政府對生產各部門允許的援助，其直接影響，便是賦稅不斷的增加，及自由貿易中由關稅提高引起的紛擾。所有這些事態，偏在一個時期表現出來，而這個時期以內，正需要一種健全經濟的積極發展，纔可作收入增加唯一的穩固基礎，一九三一年恐慌的根源，就在這裏。在許多國內，大銀行受國家的監督，成爲必要了，匯兌事業上的限制，在歐亞美競相效尤者殆三十餘國。這些方略，決定了一部分節制商業平衡及支付平衡的手段，卽限制輸入限制支付的手段，此種手段，使人回憶戰爭期間的經驗，鬚髯也不過如此。一方面的限制，引起另一方面的限制。國家對於一部門生產，允許援助，挑起來別的生產部門的同等要求。我們

的時代的一種特色就是徐爾慈德萊蒲齊爾 (Schulze de Leipzig) 教授所謂『欲望的民主主義』，換句話說，民衆向國家要求一定水準的生活，並不顧及經濟的條件，及現成貨物有限的貯蓄。世界的恐慌，一部分應歸咎於資本及貨物失當的分配，這是不含糊的，但這種失當的分配，也是戰事的結果。再則，民衆對於被經濟需要強迫設施的限制，並不尊重，亦不願尊重。許多國家，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部分的影響，把政府在可能範圍內一切施展的效用，估價太高。他們突然地看着自己陷於非解決經濟問題不可的地位，毫無籌備，毫無有組織的章規，設使在一個安靜的時期，人們很可研精殫思，謀建立一種計畫成熟的制度，且得到圓滿的結果。末了，一定計畫的厲行，種種極端重要方略的斷然適用，還有他們先決的條件，而此種先決條件，人們却沒有完成。也真困難，要得到一般人對於經濟需要慷慨犧牲的同情，尤其是在幾個新造的民主國家裏面。我們看見一種普遍的，政府被經濟方面的要求包圍得不堪其苦，並無滿足此種要求的可

能。消費的需求與生產的可能性之間一種穩定的平衡，是一件沒有的事，至少在世界現在的經濟狀況裏，可以這麼說。我們在許多國內，只看出組織的缺乏，不僅在國內的經濟生活上，即在國際的經濟關係上亦然。當前的問題，是尋求逃脫這種局面的出路，這種局面，早已對國家干涉所有的進展，宣示不滿。還有一說，驟然地回到完全獨立的經濟上，無疑的要引起完全的破產，引起無政府的經濟狀態，反之，恢復經濟自由的第一條件，就是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互相關聯的狀態，這種狀態，比較許多國家自戰爭以來所陷入的狀態，要强得多。

我們第三部的探討，是對於由國家干涉經濟生活最具體的新條例所發生的問題，並在兩方面的利益上，加以研究。起首，我們看出各國內國家與一般的經濟關係，並沒有時常按照着最有利的方式規定，他們的關係，是往往間歇的，且過於鬆弛的。所以在許多國內，大多數經濟部門，沒有直接參與立法的代表，除過在法西斯蒂制度中，容或有之，及在博爾希維克

制度中，亦僅限於一定之範圍。幾種建設，如德國的『帝國經濟委員會』，其勢力並沒有達到人們創設時預期的程度，又如奧國的『職業議院』，只算一種設計，仍在擱置。我以為有個問題，值得最深刻的討論，即『若委任經濟的代表加入現在已有的立法機關，或使他們自己組成立法的團體，是否有用呢？』第二個問題，是由國家與營業界兩間的關係所發生的諸大困難。這些困難，基於一種事實，就是國家對工人與僱主的鬥場，實在不得不出而干涉。國家實行干涉的時候，往往就是干涉作用，不免使一方面認為含有惡意的時候。我覺得根本的辦法，是尋求一種組織較良的方式，建立工人與僱主之間一種直接而不斷的合作，這種合作，可託庇於國家保護之下而達到一定程度的獨立資格。第三項，優勝的經濟平衡，能自動地贊助國家的工作，減少干涉的必要。所以世界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歐洲經濟的發展，對於國家與經濟生活兩間關係的發展，有極端的重要性，這是十分顯著的。尤有不容抗辯的一點，就是國家在干涉經濟生活時所採用

的一切方略，愈節約，愈具體，愈有系統，則較諸一切概括性及臨時性的方略，必愈優良。卽就是依照自由主義及主張極端自由貿易者的觀點，——這個觀點，我不能無條件地接受，——若有一種組織，至少在暫時能保證經濟均衡狀態於一定程度，就是仍在自由的道路上走，似乎進行要順利些，總比在國家監督與無政府狀態兩者循環不斷的經濟變動中進行，要順利得多。再進一步說，一切應用的方略，若能輔助以國際合作的力量，其效率必更大。但是這種合作，若不由各個國家分擔任起創造的及重要的工作，仍不能有用，這是一切國際事業的通則。我們若要坐候一種神祕不測的變化，那就只有付之妄想而已，但我們若能集中共同的努力，當能得到寶貴的結果。

丹麥備忘錄，——關於在國際商業上有作用的種種限制。

柯賁哈根歷史及經濟科學學院祕書岳爾根柏得森博士撰

柏得森博士送到的備忘錄，內容分爲兩章：第一章係在國際商業上有作用的種種方略之敘述，其中尤重要者，如輸出上之獎勵及貸款，反對外貨之宣傳，稅率，（對內的及對外的，）有關本國貨幣之方略。第二章說明前章所述種種方略之理由及動機，同時並指出此種方略所生之影響。因限於篇幅，此處不能登載全文，僅錄其第二章。

柏得森博士送交本會議一小冊書，是他對於丹國一九二九年以後經濟狀況的論著，於一九三一年發表的。這本書在柯賁哈根都城克里斯顯斯加德路十二號歷史及經濟科學學院出售。（全書五十二頁，定價丹幣一克倫半。）

我已把有影響於國際商業的方略鋪敘過了，人們要看見，直到現在，這些方略沒有重大的結果。

種種動機，——我曾約略提及，——散見於我上章的鋪敘中者，爲說明

便利起見，可分爲兩項：（一）商業的見解。（二）爲鬆緩物價體系內一定因素之剛硬性及資本勞力之固定性而施展的努力。這兩項的動機，在種種曾經採取的方略上都有壓力。

商業的見解，特別在反對購買外貨的宣傳中表現出來。由商業平衡的不能與本國對外債權的消滅所引起的驚惶，實係此種運動的原因，且使一般人民對此種運動，認爲適當。

鼓吹此種運動的人們，時時在他們的演說與文字中，發揮財富不在生產量與消費量而在金錢的理論。人們爲擁護那些限制輸入的方略，常常說，不購丹貨而購外貨，就是自窮其國。

我所說的第二項動機，其實比第一項更重要得多。資本主義的——如人們所稱的——根本思想，即物價與生產要素之十足活動性。假使這種思想成爲事實，無論什麼貨物價格的低落，立刻就得到一種調劑。這個低落也許因爲生產者對於需要情形，估計錯了，也許因爲一個競銷國的生產費減

少了，例如因通貨膨脹貶損了勞銀的實價，也許因為技術上新起了一種變化或其他種種異常的現象。但無論係何原因，一種物價的跌落，將立即轉移資本及勞力於他種業務，虧得有勞動者之互相競爭，勞銀自然會與生產所能達到之價格相調諧，利率自然會與資本及市場之暫時狀況相適應，資本與勞力能自由地從此區轉到彼區，從甲國移到乙國，失業與無所用之能力，當是沒有的事。金融界的變動，當不至惹起平衡破壞的現象，僅能使物價有相當的升降而已，對於物價與生產要素之分配兩者的關係，當無妨礙。

可是這種情況，永遠就沒存在過，將來亦永不能實現。工資永遠是固定的，利率由長期的契約決定，物價或因實行上的理由，被習慣來決定，或由生產與分配者之間的協約來決定。勞力常常是穩定的，一部分由於不喜紛更的心理，甚形普遍而且很近人情，一部分由於金錢與知識的缺乏。從一種事業遷移於他種事業的途徑，又被成就新職業的困難塞住，投入一定

業務內的資本，永遠帶着或多或少的不動性。在昔日勞力的工具比較簡單生產的單位比較微小時，伸縮的餘地，比最近時代要寬些，一種工業即受了別一種工業的更替，對於資本的主人，尚不至有多大的不便和損失。

既然如此，一切在供求兩間或在其一方的變動，若發生於這個商業世界的任何部分，當然要破壞這一部分的經濟狀況之均衡，要增減用人的數目，要成爲凡受此種變動影響之企業家或大賺或破產的源泉。

當自由的理想支配着各大國的政策的時期，人們總相信上天或自然的意志，是要個人自己當着利害之衝，至於人們因擾亂而受的痛苦，只有待慈善家來爲之減輕。

國家可以保持這種態度，因爲在技術的理由上，經濟力量的活動，照這樣是比較自由些，因爲民衆對這樣態度，比較順從，比較忍耐些，更因爲他們受了人的教訓，說不幸的命運，是不能避免的。一種新理想，隨技術的進步，民主思想的進步，民衆教育的進步而產出。護持這個理想最出風

頭的人，就是馬克思與其餘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建立了勞動者被剝削的理論，由這個理論，提出下面應用的結論，就是工資並不是受着天然律的支配而是受人類權力的支配，勞動者若能組合他們的行動，就會在國民財富中得到較大的部分。他們與個人主義的社會觀念，——即表現自由思想之特徵的觀念，——挑起戰來。他們宣告自由競爭制度的罪狀，要求一種計畫的國民經濟制度，使適應需要而生產，不得以博取最高度贏益的貪心，鼓勵生產。

這種理想，人們可以猜到，是不能有助於工資制度之伸縮性的，即生產企業中脫拉斯與加迭爾的組織，亦不能有助於工資制度的伸縮性。

這種思想，就他的全體看來，是半革命性的，曾受社會各方面的排斥，除過勞動階級的一部分。同時發展了一種新觀念，即國家觀念，連同國家性質與國家職責的觀念。按照這種觀念，國家對於經濟力量的自由活動，不該置身局外，國家的責任，倒是看護公民的幸福，它應該照管疾病者，

衰老者，失業者，它應該設法使社會得到一個相當程度的穩定，即就非干涉私人企業及國外貿易不可的話，也應該就這麼辦。末了，『社會的國家』這個意思，已具體化了，在歐洲大多數國家裏面，關於社會問題立法的發展，便是由此而出。雖然這種理想，與社會主義者的革命理論，適相牴觸，可是在大體上看來，大多數的勞動組合及民主社會黨，都對它表示擁護。

在申論以前，應先把幾種事實，置於心目之中：

(一)現在仍支配各國——除去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築在個人創作之上，把生產的重要原則，樹立在贏益上，於是均衡的破壞，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

(二)工資既成了固定的，勞力既成了穩靜的，若要均衡恢復，須得無所用力者經過多年的失業痛苦，和企業家經過許多的破產。失業的救濟費，使國內所餘的富源枯竭，它侵佔工業的贏益，其結果是使失業者益增。信

用的架構，是以企業家提供一定之收益的能力為基礎，所以也或多或少的傾覆了，它的傾覆，拖着信用的緊縮，生產的更加弛緩，於是又新添一批的失業者。這些原因，在一個無端的環中，不斷地相牽。

(二)在戰期間和在戰後，就重要性有加無己的種種搗亂分子中間，我們可以舉出以下幾個：技術上根本的變化，消費中根本的變化，尤其是政治力量的影響。同時各商業組織，表示他們維持自己金錢上需要的決心，並表示他們維持的能力，一面在社會所有各階級裏面，人們對於貧困，對於逆境，忍耐順受的心理，日益薄弱。

這種事實，既不可掩，那麼，為掃除破壞均衡的表面原因，如物價的跌落，於是採取種種方略的國家日益衆，這似乎很自然的，很合於理論的。要把工資和一定貨物的市價，維持到一定的水準，就只得如此，要避免商業的沒落，社會的痛苦，及由斯而生的政治紛糾，也只得如此。

由物價跌落與物價結構中重要因素之剛硬性所致的均衡破壞，使國際商

業上的限制，有施行的必要，這是我贊成的。這個主張，更得了一件事實的助力，就是這種限制，在恐慌期間，很普遍地厲行。即如丹麥的情形，關於這種主張，我在本備忘錄的第一章內，已作了個素描，我相信若在他國作相類的研究，當得到一樣的結果。

以保護方略救濟均衡破壞的手段，算是沒有成功，因為未獲實效，並且須限制上再加限制，當一次新均衡再見破壞的時候。關稅率的提高，對於與外貨競銷的國貨，非不能維持其市價，然不能保證輸出品工業的安定，這種工業，倒受着原料及半製造品價格高漲的重累。人們為救濟這種困厄，於是對輸出貿易加以獎勵，但獎勵又拖着巨額的支出，此支出的巨款，仍須國民在任何名目之下，受其重負。獎勵的分配，是一種顯然的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一切政治的力量，都施展起來。這種獎勵，還可以惹起他國的報復手段，於是輸出不復能維持曩時的水準，一方面整個的國際貿易，因之收縮。

但還不止此，當物價低落時，國家贊成抬高關稅及頒施獎勵，或用一種彰明較著的方式，或用一種掩人耳目的方式。但若要經濟狀況穩定，須從兩方面隨時調劑方可，就是當物價上漲時，又須得一樣地着忙，降低關稅，減少獎勵。可是照這樣的事實，很罕見的。在過渡時期，贏益增加了，却都資本化了。個人的利益，要求稅率原狀的維持以維持其贏益。工資的數字，也增加了，減輕關稅，則工資成了受不起的負擔，於是國家只好保持稅率及獎勵的原狀，並且若遇物價再跌，還要增加，如此繼續下去，直至國際的商業及世界勞力的分配，都收縮到最小限度。

這種歷程，拖着各國財富的消滅，生活水準的低落，尤其是小國家受害最多，他們的經濟結構，自然比較大國家單純得多，於是依賴國際交易之處亦較多。

一種事實，使這樣局面，更加水深火熱，就是在過渡期間大舉的外債，假使輸出貿易，屈服於債權國種種限制之下，這些外債，便永無償本或付

息之望。

今只就丹麥說，我請先注意一點：它把一種原則，直至最近，還保持着，這種原則，就是使工業及整個的經濟生活，務與外界狀況相適應。我以為此中原因，——除過丹國政治史上的幾個特殊之點，——根本上就在一件事實，就是組合的勞動及脫拉斯化的工業，在丹國的經濟生活中，只算是比較不甚重要的角色。多半的居民都是小佃戶及規模甚狹的營業家，這兩項人對於物價的變動有很大的適應權能。還有一句話，一個小國，要維持國內高度的生活，只有對於與他國商業交易的機會，一點不容放過，這是丹國一般人所公認的。

在丹國所採用的方略，或是為穩定國內市場的狀況或至少是為避免破產而拒絕外貨，也不過在非常迫切的情形之下，纔肯出此。例如當戰後不多幾年，有的國家，實行通貨膨脹政策，於是有幾種貨物，在丹國市場竟落到很低的價格，丹國乃施行上述的方略。但我們已眼見過，這種方略，當

逼它出來的種種現象一朝消滅，它便遭廢除。

很可注意的，是這種非常自由的政策，惟有英荷兩國可比擬的政策，沒有把丹麥擲在比他國更不幸的地位。一般的生活水準，倒比保護主義的國家還升得高，這似乎顯示我們，經濟生活務須與世界市場狀況相適應之原則，雖在恐慌時期，不免爲許多痛苦的原因，但它所賜的一般結果，比他國用保護的手段，作許多無益的嘗試，終勝一籌。所以要說自由競爭制度，在丹國支配着經濟生活，啓發了進步思想，使增殖迅速的人口之生活水準，得以不斷地升高，這却一點不假。

丹國幾種輸出品價格的暴落，原不彀使我們離開自由貿易的傳統政策。假使沒有別的變故發生，我們當讓由物價跌落在國內幾個生產部門內引起的恐慌，自己解決自己，如此，則與新狀況相適應的步驟，或多或少要遲緩些罷了。

他國對我國輸出品紛紛採取的保護手段，稍稍激變了我國人民的態度，

這是我在備忘錄的另一部分內，已曾說過的。

大局完全惡化，就在去年九月間英國放棄金本位的時候。起初，我們輸入的穀物及飼料，是從英國買不到的，其價格之高漲，與黃金之匯兌價爲正比例，至於我們輸出的食物，則以英鎊付價。這個差別的直接影響，就是把生產費與製造品價格兩間的關係，變化得大不利了。

這還不算最嚴重的變故，由英國放棄金本位所生的一般紛擾，逼得丹國及他國採取了一系列的方略，都是摧殘國外貿易的，如增高關稅，限額輸入，匯兌事業上之限制等等。

這種方略，各國羣起效尤，結果使丹國的經濟生活，重受其創。我們有幾種農產，實際上直售不出，其餘的價格之低，至於人們情願停止生產，假使不因把所有的生產費業已投入的話，假使不願損失上再加損失的話。

農田之所出，不能償付所用資本的利息，假使銷場的狀況，在短期間仍無變化，我敢預言，生產率必然要減縮到很難超過丹國人民需要的水準，

輸入減縮的比例，亦必均等，國民將被迫而只求自給自足，他們的境况，將僅許他們維持一個五十來年不曾降到的生活水準。來日難知，丹國只好像他國一樣務求解決幾種易起爭執的問題，如工資的低減，公債的收縮，勞工的遷移，要解決這些問題，免不了發生社會的鬥爭。

在各國對丹國輸出所採的種種保護方略裏面，那限額輸入，對於丹國的經濟生活，有極大的危害作用。關稅的加厲，還能讓外貨漸漸地溜入到別的銷場，或漸漸地造出新銷場來，或漸漸地把生產設法減少，至於限額輸入，猝然閉塞了許多銷場，在物價及國際貿易上實有一種摧殘的作用。它逼迫它所打擊的輸出國，把大批貨物突然拋擲到別的市場上去，於是搗亂了別的市場，惹起來保護的方略。

無疑的，就是這種限額輸入的制度，激起了報復思想，丹國一般的意見，感受此種思想的影響，日深一日。

我相信人們可以概括地斷言，若限額輸入制度繼續發展，則國外貿易及

國內生產，不完全受國家的統制不止，同時將使國際貿易大為縮減。很顯明的一件事，就是輸出若受法律的束縛而與物價全不相涉，則生產者必減縮生產，務使不留下過剩的貨物，在任何價格上不能傾銷。尤其是關於不能積貯在貨棧的農產品，減縮生產，更屬必要，但即就他種貨物而論，一大部分也是如此。

於是生產須受嚴密法規的支配，生產者須自求安全的保障，或者國家須承擔一切損失的責任。這個限額輸入制度的施行，在我們現在社會制度中，顯然是加了一種奇怪的因素，要說它與現在社會制度能以經久並存的話，那就是人們所不解的。

自大戰以還一切——不然就可說差不多一切——關於國際商業的會議，都排擊提高關稅及國外貿易上其他種種限制，但是在參加本會議各代表的國中，人們仍繼續適用這種方法。其實這樣的排擊，原來無謂。據我的意思，我們只應指出一種事實就是各國經濟制度中各部分極度的伸縮性，乃

自由貿易的條件，這種伸縮性，當隨經濟上或政治上擾亂之重要性的程度而變化，要恢復比較自由的交易制度，就要看這種伸縮性，能否達到相當的程度。

不過，我覺得在勞力市場上，或更在諸大規模的企業間，一種自由競爭的制度，難期實現，是顯而易見的。假使我們非要自由不可的話，似乎只有一種變通的方法，供我們採用，就是國家宜對於有獨占性的機構，施以控制。假使有人說，這是不能實行的事，那就無異說，破產的經濟恐慌是不可避免的。假使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中，人們不能保證國家在種種有獨占性的因素上，施其控制，那就只可決心：或是忍受恐慌，或是把整個的經濟生活，屈服在國家或別的權力的嚴格控制之下。

據我所見，我們對兩種解決的方法，應採其一：

(一)我們可以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原則，可是有個條件，即須藉國家的干涉，使物價體系內剛硬性的因素，與新狀況常相適應。

(二)或在生產消費及國際貿易上建立國家的整個統制。

欲衡量這兩種解決方法的重輕：不但要顧慮到經濟的結果，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在國際關係上發生的感應。就我的判斷力所及說來，國家在國際貿易上的完全統制，一定會增加戰爭的機會。

在最近仍通行的制度中：商業的交易，是成立於個人之間或團體之間，而由商業交易所生的糾紛，則由關係人所屬國的法廳解決。在另一種制度中則不然，國家自己將變成交易者，擁在它身後的便是武力。

這種事實，一定要影響到交易的結果。小國比較力弱，自然要陷於很不利的地位，並且在比較強大的國家之間，時有以強力解決紛糾的危險。但就目前看來，世界却向這後一個解決方法進行，這是應當承認的。

法國備忘錄，——關於法國國內市場的保護。

巴黎大學教授裴喀爾撰。

國際高等研究社法國委員會送投。

法國國內市場的保護。

(一) 法國關稅制度的基礎。

欲明瞭法國現代的商業政策，非追溯到一八九二年不可，因為基礎的設立就在此時，但這些過去的回顧，可以簡要地敘出。

一八九二年六月十一日的法律，把前三十年實施的自由制度，決絕地放棄，當此法律未立的前十年，已有幾種關於穀物的保護關稅，使自由制度現出裂痕。

自決的兩限稅制，於是成立，以前訂立的商業條約，連同所包括的協定稅率，漸漸告終，法國自定的稅率，對於輸入品各部門，都有一個最低度和最高度。法政府對於某某國的某某貨物或某某國的一切貨物，能許給納最低關稅的利益，可是法議院永遠有隨時升降最高度與最低度之自由。

在事實上，又締結了許多協定，帶着許納最低度關稅的利益。因為這些

協定又帶着最惠國條約，到後來法國與外國商業關係的大部分，都以最低度稅率爲準。當然在交換條件上，法國也得到相當的利益。

差不多在二十年間，這種制度沒有值得注意的更動，直到人們感覺有變通必要的時候，纔有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法規。這個法規，不過爲加重這個制度的力量，最初的目的，是抵制他國或正用的或側用的種種保護方略。

在二十世紀之初，歐美大多數的國家，都修改了他們的稅則以增高稅率。另一方面，他們把貨物部門，添得很繁，用精密析別的方法，以抵制最惠國條約通常的援用。末了，稅關的手續，一天比一天複雜，對於物品來源指明的要求，衛生方面的檢查，徵收從價稅時物價計算的取證方法，都愈演而愈苛，至於關稅法規適用時，勢所難免的一種武斷行爲，還不上算。

法國於是也把稅率細苛地區分起來，爲是升高水準，尤其是爲的把最高

度與最低度中間的距離，伸展得越寬，以增加最低度的歛動力，使他國對法國在協定上以相當的犧牲，換取法國最低度稅率的適用。

一九一〇年的法規，維持着一八九二年法規的根本原則，立法者並不許以折中兩間的稅率讓人，而堅執着兩限制。但是爲假政府以相當的權能，使與抵制方面種種煩苛或太巧的手段相周旋，於是一九一〇年法規內，有新增的條文，其要點如下：

政府依本法規的明文，對於在我國貨物上徵收額外稅的國家，或待遇我國貨物不如待遇他國貨物的國家，得以行政權的法令，在他們輸來的貨物上，加收額外稅。此額外稅率，可達到現行稅率的百分之百。這種額外稅，並能加於在法定稅則上已經聲明免稅的物品，——如此便等於手續費了。再則，凡對於法國貨物施行種種煩難手續的國家，法政府對於他們輸來的貨物，亦有施行相當手續的權能。末了，假使外國採用的方略，帶有障礙法國商業的性質，法政府得『採用一切適合機宜的措置』，例如他國若

採『達冰』主義或給輸出獎金於在法國傾銷的貨物，法政府對彼得設立調劑關稅。

政府採用某種方略後，雖在短期間應呈請國會批准，然這種充實保護政策的權力，在政府已不爲小了，且國會以拒絕批准彈壓這種權力的事實，亦不多見。

一九一〇年的法規，變動了一八九二年的法規，只是在條文上加長了些，在稅率上加高了些，在兩限的距離之間，加寬了些。這個新制度，原來是一種自衛的方略，（註一）它允許政府締結商業的協定，政府也常實用這個權能。

這就是我們在戰前實行的關稅制度。

註（一）：據官方計算，我們關稅平均的水準，當時從價稅率不過百分之七有半，而德國已達到百分之八，意大利則百分之九，西班牙則百分之十三，俄國則百分之三十六。

（二）戰爭期間的立法與實行。

法國與敵國的商業，一經宣戰，即行禁止，（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之法令。）輸入與輸出上的統制，隨之建立，（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之法律。）政府得禁止或限制貨物的出入，必要時且得相機變通。這種局面，延至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是日即取消禁止輸出的法令頒布之日，但尙未完全取消，後來漸漸地芟除，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始取消淨盡。

在戰期間，法國關稅上種種的變化，益使稅則趨於嚴苛。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的法規，許政府拒絕輸入或隨意變通稅率。爾時被禁止的輸入品，係奢侈品，飲料，酒精，至一九一七年，並禁止一切不歸國家接收的穀物輸入。幸而創設了一種變通委員會，許多苛例，經此會慘澹經營，漸趨和緩，或對於一定種類的貨物，施行一般的變通，或對於他種貨物，規定輸入的數量，或對於特種貨物，加以單獨的變通。直到是年六月十三日的法令，纔把輸入禁止的條例，幾乎完全掃除。

(三) 戰後保護主義的強烈化。

法國關稅的立法，在戰後仍守着一八九二年及一九一〇年兩次劃定的範圍而就中發展，自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一九年之間，頗與此範圍乖離，以後漸漸又恢復原狀了。

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的法律，允許政府提高稅率，但須在三個月內呈請國會的批准。政府實用這種權能的範圍，雖在戰後，仍甚廣大。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的法令，在貨物的大多數部門內，加入了額外從價稅。因這種額外從價稅與從量稅很難構成一體，於是想出另一方法，把從量稅分別程度地提高，（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的法令。）提高程度的分別，由一個委員會按所涉貨物的新價格規定，於是這些分別提高的稅率，常常須加以修改，如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的法令，即此類修改之最著者。別的法令，對於種種貨物，或維持着原來的從價稅，或適用新規定的從價稅。末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法令，提高了一般的稅率，直至較最低度稅

率超過三百與一百之比。

物價騰踴之迅速，致此種保護，轉瞬間歸於無效，保護的平均指數，在一九一九年已降至百分之五，及一九二五年又降至百分之三五，於是接連地出來了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的法律及八月十四日的法令，把當時一切的稅率都升高百分之三十。在這種臨時方略保障的背後，人們纔從事於關稅制度一般的修改之研究。

這項研究，因着手時感到的困難，遂無期地擱置下去，但是法德兩國間由維爾賽和約所造成之商業關係的特殊制度，已屆末期，兩國的商磋，行將開始。

爲給政府在商磋上一切的利便，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律，賦與政府以變更——不止提高或劑平——一切關稅之權。於是把從來公認爲立法機關的特權，轉付於行政權之手。這次法律，同時又提高了一千七百項貨物的稅額。

由於推倒了適合理論的秩序，法政府與德政府開始商榷，兩方簽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協定，其中所訂的稅率，與法國當時通行的稅率大不相同，後來法政府又用八月三十日的法令，變更了法國當時的稅則，而以包含在法德協定中之稅則代之。

所以在一方面國會被擯於局外，既不預協定的商榷，又不參稅律的制定，在另一方面，不是前定的稅則，作商榷的依據，反來是商榷的結果，作稅則的仿本。國會當審查新稅則可否批准之時，若主張變更，必引起與德國第二次煩難的磋商，它選了差強人意的一條路，就是簡淨地畫諾。

與德國締約時經過的程序，當然在別處還要遇到適用的機會。此後其他各國，認法國稅過高提出要求者，也得到協定的低減，法政府於是又變更稅率以求與新協定相適應。一九二八年三月二日的法律，批准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法令，增加了保護農業的新稅額，並擴張了那『鎖門法規』的領域，由以前僅及的四十六項貨物拓展到二百零一項貨物上。此期

間關稅上所採取的種種方略，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乃以一部法典的形式公布出來。雖然這樣的增高加厲，但據專門家的估計，我們保護稅的平均率，當時還未超過百分之十二。

(四)商業協定，——較爲自由的政策。

自和平條約簽字後，締結商業協定的權力，即受法律規定，此項法律，現在還保存着，但解釋不一，這就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法律。它並沒有變更一八九二年成立成一九一〇年益固的兩限稅制，但它把政府只能以最低度讓人的原則變更了。它許在兩限之間、用減輕最高度稅率的方式，酌定百分之若干，但只與『相當的利益作交換的條件』。這句話經歷多年，總被解釋爲有反對以最惠國條約許人的意思，不錯，最惠國條約的援用，是自動的，它可以使一方得到減稅的惠施，而並不使對方得到減稅的惠報。於是許多嚴重的困難，由此條文發生，因爲法國外交的代表與他國商確協定時，仍不斷地要求最惠國條約的利益，同時他們却拒絕最惠的

交互。

若說一八九二及一九一〇的兩限制度，幸成就中活動的制度予以伸縮性，可是自反面看來，它倒更強硬了，因為它失去了一種機能，就是在自由的途徑上可使實行的稅率趨於平等的機能。

在另外的兩點上，一八九二年的制度也受了變更，這種變更的結果，却是趨向自由方面的。原來有兩個定例，一是不許降到最低度以下，一是在協定中不許提出稅額絕對的總數，因為提出絕對總數的結果，不異把這個數目，認為一成不變的了。可是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對於某某國家，已免除了從量稅的分別提高，這無異以最低度以下的稅率，讓與某某國家。另一方面，人們對於許多稅項的數目，都不惜認為一成不變的了。

法國在戰前締結的商約，在戰期間一概取消。所以戰後又須新訂。一九一九年的法律，暗中含有禁止訂立最惠國條約的意義，所以又發生了種種困難。訂約者只得在約內加入複雜的條例，例如在一九一九年法國與捷克

斯拉夫所訂的商約，許捷克斯拉夫得援享法國將來許給別國的利益，但不許援享法國於簽訂此約以前業已許給別國的利益。人們還可在此後法國與他國簽訂的許多商約中，看見這種有限的最惠國條約的適用。有時以最低度稅率許加於一切的物品，有時只許加於一定的物品，有的國家只得到酌定於兩限之間的稅率，有幾項稅率的數目漸漸地成了固定的。數目的固定，尤其是在法國與比國一九二三年五月簽立的協定內，毫不含糊地揭出了。並且得到固定稅額的貨物種類，為數甚多。比國在法國顧主的名單上，位居第二，在法國賣主的名單上，位居第三。它又得到最惠國條約的利益，並且以概括的方式得了，這就顯見得法國把一九一九年法律的原始解釋，業已拋棄。

法比協定，雖經比國國會拒絕批准註(一)，未能實行，但這個草約，已足表示最惠國條約恢復的初步。經過許多的周折，人們把最惠國條約，更引入別的商約裏面，例如一九二七年法德的協定內，有兩國完全互惠的明

文。這個協定，又附帶着許多稅率的固定化，——這種固定化，固然是暫時的，因為就中有個聲明，說假使批發貨的價格，他日超過締約時價格的水準百分之二十，則稅率當隨之變動。

註(一)：這次未經批准的協定，初則用一種暫行式的條約代之，幾次展期，繼續適用，最後乃以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協定代之。

最惠國條約，在我國商業政策中，表現出完全的恢復，於法國與瑞士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之協定見之。在這次協定中，最惠國條約的應用，是『無條件的，無限制的。』

最惠國條約的適用，逐漸擴張，勢必使介乎兩限之間的稅率，漸歸消滅，把我們所有的協定國，引入一種比較有利於他們的稅則，即最低度稅率。在另一方面，因為固定率的稅項，也有漸歸註(一)消滅的趨勢，於是一八九二年及一九一〇年的制度，將挾着它的幾種重要性質，再度出現。一則，仍為毫無介間率的兩限稅制。再則，因最惠國條約的推廣而最低度稅

率有普偏化的趨勢。三則，酌定稅則的主權，乃操於法國的國家。

註(一)：不過當一九三一年，在七千零二十八種物品中，還有五千種左右，作固定稅率的對象。

雖然如此，但因變通稅則之權，在事實上已歸政府，不復屬於國會，人們把一九二七年法德磋商協定的步驟，習以為恆，愈用愈亟，這種步驟，就是爲使稅則與商業協定相調諧而變更稅則。在另一方面，因爲從前業經固定的稅率，若不連續地予以固定，則時感困難。於是保護主義，只得尋求別的途徑。

(五)間接地回轉到加厲的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尋獲了很多的途徑，我們只敘述幾條主要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的法令，把法國麵粉業所用外國麥的數量，限制到百分之三，（這個百分數已經多次變動，）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的法律，把外貨過棧的停留期間，限爲三個月，強制同量貨物再出口的履行。還有種種防止弊混

的法律，我們僅舉其一，即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二日的酒律，其作用至於酒類的輸入大減，因其質料多有不盡適合衛生的嫌疑。

不僅此也，人們還用種種的方式，使輸出貿易，得到真正的獎金，最著者就是對於麥產的輸出。末了，匯兌上有調劑作用的額外稅，由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五，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來，已適用於與許多國的匯兌上。一面輸入貿易額上的收捐，最近從百分之二提高到百分之六。

最後一種間接保護的手段，一經法國採用，隨被歐洲大多數國家效尤的，就是限額輸入。此制自一九三一年創始，經一年之久，已適用於三百餘種物品，其方法係對於法國接受輸入的外貨，數量上加以限制，但與輸入的細則及關稅的定率，均毫無觸犯。

法國不得已而採用此制，爲的是打消固定稅額所生的影響，此種固定稅額的部門，爲數太多，而本國的生產，當初所期望由此種固定稅額可得的保護，經外貨價格的低落，乃適得其反。再則，法國對於外貨的進攻，也

要圖謀自衛，外貨所以拚命地要到法國尋覓顧主，乃是因為現在世界上以穩固的貨幣照常作交易的支付，只有不多的幾國，而法國即其中之一。

雖有這種相當的理由，但限額輸入制度，仍不免受着劇烈的抨擊，就是法國的商業家，甚至法國一部分實業家，都是抨擊的分子。人們說它引起許多的弊端，並且在實施的時候，無論如何，難免一種使人不能接受的武斷。至於輸入的特許執照，原係一種補偏救弊的手段，然此中弊害，仍復不少，若論限定的輸入額，當然是根據已往及現在市場消納的能力而決定的，但試問決定者為誰，則往往係我們國外供給者所組織的輸出機關，這些機關，在我們的市場上已據有偉大的勢力，他們可以在法國組成一種銷售的獨占，使法國人對他們的貨物，出價特昂。

限額輸入制度，不免引起了酷辣的報復，最近意大利對法國的泡沫酒類，（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起，）香料，羊毛品，罐頭等，（自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起，）都限額輸入。丹麥對於法國的酒及酒精類的飲料，

德國對法國的菓品蔬菜，也是如此。

限額輸入制度，就法律觀點上看來，亦有可指摘之處。就國內法言，可藉口者，只有我們關稅法典中第十七條這個根據，其實是極弱而易攻破的。就國際法言，要把這種制度看作一種掩飾的或相對的禁止入口手段，也是很可能的，禁止入口，就違犯了國際條約，因為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之國際關稅協定內，禁止入口的行爲，是在所不許的。

(六) 法國的利益要求着一種自由政策。

由法國十年以來商業政策上一番匆匆的考察，人們得到一種印象，就是他並沒遵循着一種有固定方向的進展。它初則篤守它一八九二至一九一〇年的保護主義，當戰爭甫息，又加厲行之，繼則因與各鄰邦締結的協定漸繁多，於是走到寬大的割讓，已得權力的固定，最惠國條約普遍的適用，而當年締造的保護制度，因以衰弛。但自受了一九二九年終開始的經濟恐慌之作用，法國又感覺經濟上的保護，有厲行的必要。這種傾向，在一

九三二年三月三日法意協定內，有一個最後的表示，把我國的意志，剴切地宣布出來，就是要收回我們的完全自由，要取消既許的固定權利，要廣博地施行限額輸入。

此次保護主義的恢復而又加厲，應以目前意外的事實說明之。這不是法國特別的情形，人們看見其他國家，即從來不肯放棄自由政策的國家，今日都改變了，他們也採用保護關稅了。要法國放棄他的農業保護政策，這似乎是一件困難的事。驟然把關稅壁壘向新國家的穀物開放，而他們的穀物，乃以極廉的生產費得之，勢必使我國大部分的農民，陷於破產。農民既不能迅速地以他種可供輸出的消費品之生產，來替代穀物之生產，若聽其失業，國家又不能不受財政上的重負以資救濟。可是就農業上所施的保護而論，未免超過適宜的限度吧？這是一個尺度的問題，人們儘可爭論。

法國的保護主義，雖甚嚴苛，但就各大國目前所遵循的商業政策而論，却不算例外，也不算過度，尤其是法國保護稅率的平均指數，約僅及百分

之十七。

一種太苛的保護主義，於法國並無利益。實際上，百分之四十五的輸入，都是原料品，我們向外國購入的，大抵是我們土地裏產不出的，銅，煤油，棉花，膠皮等等，若要縮減購入的數量而不至於縮減我們製造業的工業，那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的輸出，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製造品，都帶着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性質。我們的利益，原來在維持世界商業的活動，在希望與我們合作的國民，都能維持其購買力而又增長之。

我們的輸出，乃我們維持生命的要件，因為輸出，就是為取得準備支付的貨幣，就是輸入原料的代價，而原料又是我們所不可缺的。我們的利益，指揮着我們使勿傾向於過度的保護，以故十二年以來，在許多關稅問題的國際會議裏面，法國的代表，總站在自由主張的一邊。當提出國聯協約第二十三條——條文係勸告各國以公平互相待遇——應如何發揮其充分意義的時候，當提出稅關手續應如何刪繁就簡的時候，（日內瓦一九二三年

，當提出舉一切禁止入口手段應行廢除的時候，（一九二七年，）當會商一種國際經濟協作的時候，（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法蘭西總是鼓着全力，以贊成採取公平的與自由的決議。

雖然如此，但對於保護主義的應用及實效，一般人意見紛歧，在法國與在他國一樣，這却不能否認的。目下此種制度，已克服了整個的世界，但此種政策的成績，却不見得若何顯赫。這是因為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在今日似與技術上的新條件已不復適應了，一方面一切事物，都併力協作以固結民族相互的依賴，以促進一切富源的公有，而它在另一方面，還提示各國自足自給的可能，還想使世界成一無數封鎖的經濟團之集聚。

這就是現在法國與全世界的商業政策所難堪而仍忍受的矛盾。這個矛盾，人們當能解決，假使人們能分別着想，當各商國向相依為命的路上疾馳而去，如下峻坂，時虞顛覆，此時若用保護主義以減殺其衝激震蕩之力，豈特在可許之數，亦且在可勸之列。但若用保護主義構成一種普遍而永久

的制度，勢必使經濟生活，陷於艱窘，罹於貧血病態。

英國備忘錄，——關於一九三二年英國關稅政策。

英國協立國際研究委員會送繳。

附註：

英國協立國際研究委員會，用『關於英政府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為獎勵輸出並保護其世界銷場所施行的策略之初試報告書』之標題，繳到印成文書一冊，係為米蘭會議而作，由一研究團撰成。研究團以王國國際事務研究院及倫敦經濟政治專門學校雙方成員組合而成。此冊的對象，乃係為曾經提出討論的問題作為就一方面觀察的根據。茲將團員姓名及其略歷，臚列於左：

(1) 麥克法顯爵士，(Sir Andrew Mc Fadyen) 為本團主席，曾在 1910 充庫藏職員，在一九二二——二四年充戰後賠償委員會祕書長

，一九二四——三〇年爲派遣柏林財政視察員。

(二) 賁罕穆博士，(Dr. C. C. Benham) 係倫敦經濟專門學校商科副教授。

(三) 寇特滿教授印度一等爵，(Professeur J. Coatman, C. I. E.) 倫敦經濟專門學校帝國經濟教授。

(四) 威烈可痕爵士，(Sir Robert Waley Cohen, K. B. E.) 係協爾轉運公司 (Shell Transport) 之行政經理。

(五) 吉特 (Frederic Geidt, M. C.) 係交易所經紀。

(六) 滿寧教授，(Professeur C. A. W. Manning) 倫敦經濟專門學校國際商業教授。

(七) 陶恩畢教授，(Professewr Arnold J. Zoynebee) 係王國國際事務研究院主任，兼倫敦大學國際歷史研究專席 (司特芬蓀捐款——

Fondation Stevenson——設立) 教授。

(八) 維克爾斯 (C. G. Vickers V. C.) 係法院代理訴訟員。

(九) 荊霍爾提督 (Commandant Stephen King-Hall R. N.) 任本團祕書。

(十) 哈爾維女士 (Miss Heather Harvey) 任本團副祕書。

研究團因時間匆促，不克將本會議各成員團體應行考察的綱領之一部分，作一通體的研究。這一部分，就是種種與在國際商業上有作用的方略相關的事實，及此種方略採取時所根據的理由，所被迫的動機，並此種方略實施的結果。所以本團僅決計將與英國財政方針從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二年有關的種種事實，種種理由，種種動機，作一番初試的考察。

報告書分爲四部，包括(一)英政府於一九三二年三月爲獎勵輸出及保護本國銷場所施行種種方略之一覽。(二)英政府代表對於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二年三月英國增加關稅之理由的公開說明。(三)關於英國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關稅制度施行的結果，由各種刊物上搜集的消息。(四)

一幅簡短的參考書目。

此外還有許多英國稅則表，關於異常輸入的法令，（關稅，）關於園藝生產品的法律（保護稅，）關於入口稅的法律，關於預算收入的減少，與國家補助糖業需款的估計，都附帶在報告書之末。

更有入口稅委員會的條陳，及關於一九三二年附加關稅（第一種，——包括四千零六十六項，）的法令，亦附錄於報告書之後，意在使本報告書的陳述，更加明瞭。此種附加的關稅，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夜半開始施行。

研究團的成員，對這個問題的考察，仍有個人的貢獻，他們更就自己個人的認識，把決定英國財政上變化的理由及動機加以說明。此種說明書，都曾經致送於米蘭會議的成員。

意大利備忘錄，——關於國家與私人經濟。

本備忘錄由意大利國際問題科學研究協社送繳會議，其撰稿人如左：
司特法尼，——前財政大臣，意大利研究院成員，羅馬市王國大學政
治學院經濟學及財政學教授。

亞摩羅蘇，——羅馬市王國大學政治學院經濟理論及經濟思想史教授
1. 本備忘錄的作者，認爲把國家干涉經濟的方式分別地考察起來，並沒
有什麼益處。他們相信，若把這些方式，列舉而鋪敘出來，爲綜合討論時
供給些材料，倒是有用的。

2. 這種目錄式的敘述，雖可以引起在實際利益上一種有統系的研究，但
不能得到足以決定新趨向與舊方針之界別的價值。

3. 國家干涉經濟的種種方式，其理論的體系，被人類社會無數經驗的協
作，及由現代事實構成的理論的贊助，已漸漸地臻於完善了。

4. 若把國家干涉的種種現象，看作各別的現象，看作彼此各自作用不相
爲謀的，那麼，就是給以有條理的解釋，也不見得是發現了科學上的祕密

，也無裨於實用。

5. 所以本備忘錄的作者，以爲僅僅沾滯在事實上，沾滯在單方面的解釋上，是無益的。單方面的解釋，既不出常識的範圍，且同樣事實的解釋，若遇境地一遷，情形一變，又要引起冗長反覆的爭辯而終不能得一定論。

6. 就近年以來由國聯或由國際商會發起召集的許多會議而論，足見人們對於種種現象互相倚伏的關係，已有多麼委曲的領會，可是從反面看來，人們又多麼傾向着把已往的宣示，已往的指陳，已往的結論與建議，反覆地申述。這些反覆申述的陳言，直至今日，沒有在各政府的方針上，及事實的總合了解上，發生過一點可觀的實效。

7. 本備忘錄的作者，以爲不宜向各國政府提出具有一種特性的方針，其價值在實行上只是相對的。而比較適宜的舉動，倒是在私人經濟的利益及現象上，努力斡旋，在人們的思想中，——即能就善自爲謀的立場上及可能的範圍內，決定一般私人經濟的利益和現象的人們，即肆用其活力，不

憚與全世界各國的利益相衝突，以致造成危害全球幸福之結果的人們，——努力斡旋。

8. 至 9. (參看五二——五八頁斯特法尼教授在本會議出席演說時提出之二十三點。)

以上就是本備忘錄的作者所認為事實的實際，所認為各負責人的任務，尤其是大公無私的政治家之任務。他們對現在這個結束舊案恢復故物的歷史階段，當有一種真確而總合的理會。

外有斯特法尼與亞摩羅蘇兩教授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羅誥教授——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第五屆會議主席——一函，由羅誥教授轉交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會議，內容如左：

本函簽字人於送過報告書及在本會議進行中發表演說之後，更以得畢陳其結論為榮幸，並祈轉知大會俾此函得列入本會議之文件中。

斯特法尼與亞摩羅蘇兩教授注意之點，是從事實情狀的考察，看出來

自由經濟體系，正在根本的轉變改造之中。因為已經暴露出的矛盾現象，愈演愈多，證明這種經濟體系，沒有自動調劑的力量，以解決理論及實行兩方面新生的問題。他們親眼看見，國家正在監督着經濟制作，國家正在把個人主動的原則向團體的方面轉移，雖尚不合科學的方法，却是邁進不止。他們於是根據着這種閱歷，表示他們的意見：

(一)歸還到一種腐化的經濟體系上去，是不可能的。(二)應贊助歷史的進行。歷史的進行，是趨向於比較有機的體系，國際協作的體系，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體系。

斯特法尼

亞摩羅蘇

魯馬尼亞備忘錄，——關於優待稅。

前任大臣現充布加勒斯特高等商業研究院教授馬德加祿撰

附註

本冊因限於篇幅，不能把魯馬尼亞社會學院送繳本會議的關於『國家與經濟生活』之報告書編入。該報告書舉本會議提案委員會所指出應加研究的各點，論列無遺。

下面所錄的幾頁，乃係魯馬尼亞社會學院的代表送繳本會議一段補充的報告。

世界的經濟恐慌，在中歐與東歐，尤其是在此區域內的農產輸出國，貽害最烈。這些國家，受着價格異常低落的襲擊，毫無抵抗之力，只得忍受，直至種種出品，如穀物，煤油，木材，值不到戰前價格之半，或三分之一。

以低減生產費爲應付之策，也是辦不到的事，因爲在生產未及銷售的期間，信用的恐慌，已破壞了平時商業一切的機構。

起初人們也想到，若要救藥農業的恐慌，非經國際的解決，是不可能的。

，這個意思，已被近兩年來許多國際會議中冗長的辯論揭明了。

在這些辯論中，兩種意思最占勢力：一種是優待稅率，一種是地方的經濟協約。

不幸這兩種意思，迄今無一見諸事實，於是救濟目前恐慌的決議，仍在延宕之中。

所以若把這兩種意思，與這兩種意思所由出現的情形，所受的動力，及其在實現上所受的阻力，歷歷考察一番，並設想此種意思若果實施於恐慌時期，究有何等價值，這是饒有興味的事。

優待的意思，乃是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以經濟協作爲目標的日內瓦會議中發表出來。

歐洲農產輸出國的代表，目擊各農產輸入國都抬高了農產的入口稅，抵抗海外各國的競爭以自衛，於是要求優待的稅率以利他們農產的推銷。

這種要求，在匈牙利魯馬尼亞及西哥斯拉夫對國聯咨詢的答覆中，曾正

式提出。國聯咨詢的對象，即係在歐洲各農業國與各工業國之間，作一番調查，尋求有無經濟協作之可能。

後來在布加勒斯特西那亞瓦爾蘇召集的各農業國會議中，還是優待這個意思，占着討論的中心，作為決議的基礎。

當一九三〇年九月國聯開第十一次大會時，這個優待問題，經第二次經濟委員會決定，提交到一般的討論中。

是時即有反對優待的意思，由英吉利，意大利，荷蘭，斯干第那維亞諸國，愛爾蘭，及海外諸國表示出來。法蘭西雖反對而尚持一種中立態度，奧大利則頗表同情，德意志只表示一種有限而且附帶條件的贊成。

企圖經濟協作的第二次會議，又繼續把優待問題特別地探討，結果在司徒琦 (Stucki) 草案內提出若干條件，人們以為在此等條件之下，優待稅制的實施，有可能性。

不幸反對方面的阻力，還是太强，尤其是海外各國的反抗，特別激烈，

想即速實行，依然無望。

但是這種意思，仍不止地進行。所以歐洲同盟問題研究委員會在他第一次開會時，考察恐慌的貽害，便特別注意於歐洲各農國的狀況，力謀救濟的方法。且知任何方法，欲其有濟，尤須從速。

不幸，又新召集兩次巴黎會議，一個是爲謀一九三〇年農產積貯的推銷，一個是爲歐洲各農國農產輸出的剩餘謀一致的推銷，前一個會議的結局，是對於輸入商作了一篇空洞的勸告，勸他們作南歐東歐諸國的主顧，後一個會議，僅轉指司徒琦草案爲優待稅實施的依據，並聲明若能採取一種便利運輸與信用的制度，足以救濟歐洲各農國正在過渡的嚴重恐慌，則尤爲幸事。

上述的議案，未遑實行，而一種政治上的示威舉動，擾亂了國際經濟協作的企圖，那就是一九三一年三月德奧關稅同盟的計畫。

這個計畫，警醒了政治界的危懼，阻撓了優待稅思想的進步，因爲當時

的德國就是曾允許以優待稅施於丹牛波河流域諸國者。

德奧計畫釀成的空氣，當然有它的結果。

斯時又召集一新會議，——此次乃係世界的會議——於羅馬，將尋求以全世界的決議，救濟農業的恐慌，這就是關於麥產的世界會議。人們相信可以斷言，惟有這樣一種世界的決議，是救濟農業恐慌的真正藥物，且如此方可排除歐洲優待稅的思想，因這種思想，曾被藉助政治作用的手段，即德奧的關稅同盟計畫。

原來是一種經濟的思想，却這樣被政治的顧慮所威脅，險些地歸於消滅，其實這種經濟的思想，對於減輕目下恐慌的企圖，很可以有補助的。但是羅馬會議，却使人們發生一種碻信，人們碻信得：若說『尋出一個包括世界的決議案，並促進歐羅巴觀念的恢復，是有可能性的，』那就是甘作自欺的幻想。

這種事實，當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之間，歐洲同盟問題研

究委員會第二次開會時，隨即表現出來。

當時法國政府繳到一本『建設的』備忘錄，是要『對於歐洲現在經濟界發生的最急問題，務達到一迅速而適於實行的解決。』

在這本備忘錄內，法政府先說出，由本問題的研究，尤其是由羅馬會議中的辯論，顯示出來向海外各國要求的犧牲，微乎其微，幾於毫無意義。然後宣告它自己的主張，是願對於歐洲農產輸出國採用優待稅制的。

該委員會採取法政府的觀點，而加入英吉利斯干地納維亞諸國及蘇俄提出的保留之點。

優待稅實施的開始，似已迫近，在此期間，經海牙國際法院的判決，德國放棄了德奧關稅同盟的計畫。

基於優待原則而締結的德魯商約，德匈商約，均經通知國聯，得其贊同。未幾，法國政府亦與匈牙利魯馬尼亞西哥斯拉夫簽定麥產優待的商約。不幸這些條約的施行，至今仍在延擱中，德國簽定的商約，沒有得到海

外某某國家的同意，——人們認爲這個同意，也是必要的，法國簽訂的商約，沒有達知國聯。

當人們急盼優待稅實施之頃，一種新提議又興，即達爾迪歐（M. André Tardieu）的提議，目的在構成丹牛波流域諸國的經濟協約。

自一九二七年，在小協約國屢次的會議中，即經濟協約這個意思，亦已提及，但尤其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小協約國會議中，人們纔想到，應先就魯馬尼亞與西哥斯拉夫兩國間——兩個經濟架構相同的農國——締造一種經濟協約，然後再由經濟的磋商，擴張到捷克斯拉夫，於是構成一地方經濟協約的核心。

這就是西那亞會議的目的。這個會議，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一日集合了魯馬尼亞及西哥斯拉維亞兩國的國民經濟大臣，兩方商洽所得的結論，即『魯西兩國關稅同盟，是有用的，可能的，適應時宜的。』（第七十六頁。）

此次經濟方面的運動，又被政治方面的顧慮與困難陷於失敗。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地方經濟協約這個意思不久又在國聯第十一次大會裏，被奧國前國務總理邵伯爾（M. Schober）及德國前外交總長顧爾脩氏（M. Curtius）採取了。

達爾迪歐的提議，是注重在覓得一個經濟的基礎，使中歐諸國得據以取獲財政上的工具，以可期持久的手段，恢復他們的地位。

中歐經濟聯合這層意思，在達爾迪歐的提議之前，已出現了，乃係由英國某某界的人物提議的丹牛波流域諸國關稅同盟。因為英國財政界某部分的利益，受着此地經濟關係的反射作用。

法國的提議者，鑒於關稅同盟實施的途徑上，有許多超越不過的障礙，於是僅主張一種地方的經濟協約，以優待稅的意思作基礎，由丹牛波流域諸國互相商洽。

提議者雖具熱心，但法國的反對派，終不甘緘默。他們站在政治的立場

上反抗，這個理由，也很容易明白。在丹牛波河的流域，諸國一致團結的傾向，紛紜四起，常有互相交接而漸就集中之勢。歐戰以前，有個口號，『逼進東方，中歐羅巴。』這種意思這種傾向留下的紀念，時時警醒人們的疑忌和危懼，最近的計畫，如德奧關稅同盟計畫，及其他關稅同盟計畫的謠傳，皆適足造成一種惡濁的環境，致一切的經濟方略，爲救濟歐洲一隅的經濟貧困所必需的，都格而不行。

在倫敦會議中表現的紛歧意見，大半是這種情形放射的迴光。

我們雖指明政治方面的困難，却也不願意把經濟方面的困難看輕，將來爲實現丹牛波經濟協約再從事討論的時候，自然還要遇到經濟方面的困難。

經濟方面的困難，是從丹牛波各國的商業地位與集團計畫的關係而來。我們試把一九三〇年的輸出考察一番，捷克斯拉夫輸出於集團內各國者占其總輸出百分之二六·八，奧大利占百分之三六·三，匈牙利占百分之五

三·六，西哥斯拉夫占百分之三六，魯馬尼亞僅占百分之二五·二八，魯馬尼亞輸出於奧國及捷克者占百分之一六·〇三，輸出於德國者占百分之一八·八〇，輸出於意大利者占百分之一二·八八，輸出於法國者占百分之八·八七。再看看這些國的輸入，捷克斯拉夫由集團內各國購入者占其輸入總數百分之一〇·九，奧大利輸入者占百分之三六·九，匈牙利輸入者占百分之四六·四，西哥斯拉夫輸入者占百分之四三·四，魯馬尼亞輸入者占百分之三〇·四。雖然如此，假使我們再進而把魯馬尼亞與其應結為團結之四國的商業平衡，考察一番，我們便看出在一九三〇年的總輸出差額五·四七七兆萊之中，其他四國的輸出差額，總計不過一七四兆萊。

假使我們考察魯馬尼亞輸出的大宗物品，我們便看出魯馬尼亞輸出於集團內各國的穀物及穀物的副產，不過占此項總輸出的百分之二四·九，畜類則占百分之七五·四。關於魯馬尼亞的大宗輸入品，乃係棉麻等紡織品，至於由這幾國購入的，不過百分之三九·六的鐵，及百分之四一·六的

鐵貨而已。這些數字，給我們指示的什麼呢？

這些數字，給我們指示的，是丹牛波擬議集團的各國，就他們的商業利益與集團的關係說來，應當序列如下：匈牙利，奧大利，西哥斯拉夫，捷克斯拉夫，至於魯馬尼亞，只應列在末位。

就另一方面說，匈牙利，魯馬尼亞，西哥斯拉夫，皆被迫而為他們的出口剩餘，尋覓銷場於本集團之外，而魯西為尤甚。若以魯西二國相較，則魯之地位尤為不幸。因為我們輸出的百分之九十的穀物及穀物的副產，與百分之七十五的燃料煤油及煤油的副產，都要往本集團以外的市場上去。至於我們的畜類出口，其百分之二十五輸入於意大利及法蘭西，百分之七十五銷售於本集團以內，在一九二九年，我們的畜類出口，百分之九八·二四都銷售於本集團各國，我們於是看着輸出額的大減。

在一九二八年魯馬尼亞匈牙利西哥斯拉夫三國輸出的剩餘總額以重量百啓羅為單位計之，則小麥有二十五兆，大麥有十兆二十萬，玉黍有四十一

兆。

捷克斯拉夫及奧大利並不全取給於集團內其他三國。假使捷奧二國所需要的都由此三國供給。則我們可於輸出方面，增加一百八十兆啓羅克蘭姆的玉黍，不過這點增加，對於我們大量的剩餘，也算不得什麼。

以上不過指陳了幾件重要的事實，我現在再指出一點，就是歐洲的這一區域，特別與德意志的重大利益有關，不但是因爲一九二九年德國百分之十的輸出品，都傾銷在這個地方，並且因爲它就憑與這個地方的商業關係，得到五百一十九兆馬克的輸出差額。這件事實，把德國激烈反對達爾迪歐計畫的原因，可以說明大半。

倫敦會議的失敗，對於農產輸出諸國經濟地位的恢復運動，又是一個新展緩，對於他們的本身，就是覆滅的威脅。

這樣可危的前途，不免使西土人民，怵目驚心。丹牛波流域諸國經濟的沒落，影響太大。這些國家，對於製造品的吸取力，既形衰退，他們的輸

入，因之減少，以數字示之，在一九二八年，其輸入爲一〇九五兆，迨一九三二年，則降至六六一兆。

物價跌落，不久就逼得各國要求對外交易的展期支付，這些國家的金融機關，日暮間就要陷於完全崩潰的地步。

在這種狀況之下，躁舉妄動倒行逆施的潮流，很容易地高漲起來。假使人們想一想，現在所有的國家，都在世界經濟恐慌的重壓之下，勉強維其生活，而這種經濟恐慌，直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上進攻，那麼，人們對於這種景象，當然不能等閒視之。

因此，我們認爲現在再沒有一刻的時間，可以放過的，事勢迫令我們作急起直追的舉動。

人們既知道締造丹牛波經濟協約的企圖，遇到經濟方面及政治方面不易打開的困難，那麼，重要的手段，就是仍返到採取優待稅的決議上，循着歐洲保護主義的途徑進行。

事勢的迫切，使歐洲四大國不可不同意協作，以排除海外某某國家的反對，以維護自己國內的農民。

對於海外諸國，應確切聲明之點，就是他們輸入歐洲的穀物，在合計歐洲各國輸入穀物的總量中，不過百分之十五的限度內，得享優待稅率。原來這種辦法，帶着異常的性質，其目的只爲使歐洲經濟上一個重要區域，不至全歸衰落。

對各大消費國的農民必須宣告的話，就是優待稅率的適用，止限於一定的輸入額，決不至影響於國內價格的水準。若怕萬一不妥，人們還可邀請農業聯合社出來擔任輸入的監督，務使由購入價與推銷價兩間差額所生的實際利益，歸於農民。

優待稅制的目的。既係爲丹牛波流域諸國的農民，保障在有相當利益的價格上，推銷剩餘的農產，然則酌定這種稅制時，務使其能影響到農產輸出國內地的價格水準，這是絕對必要的。

準此則優待制下入口稅輕減的程度，應當甚深，使那些得不到優待的國家。雖採『達冰』主義，不能消滅優待稅制的效用。

我們並不否認，人們若採用輸出交抵的協定制度，以輸出輸入的特許權作基礎，也能達到這個目的，且較為準稿。但要實施這樣的制度，離不了
一種複雜的組織，實現此種複雜的組織，似乎已非易事。

我們雖以優待稅制的迅速施行，奉勸人們，但我們並沒有存心把丹牛波諸國經濟協約的觀念，置之度外，開闢較國內市場更廣大的市場，乃是歐洲經濟合理化上切實而有用的方法，人們不能看輕的。

不過今日若使丹牛波諸國構成一個集團，也只能有幾微的價值，即對於人們視爲第一個利在集團的奧大利，也不見得有多大的利益。因爲奧大利在匈牙利魯馬尼亞西哥斯拉夫這三個農國所有的銷場，其範圍縮小已甚。奧大利即受這幾國任何等的優待，也得不到許多收穫。

我認爲應以農產輸出國的經濟恢復爲起點，先增長他們的購買力，因之

造成一種地方經濟協約的基礎。

一種必要的救助，正在刻不容緩，所以優待稅制，遂成了非採不可的一種迅速簡單且有效的解決。

我們已經說過達爾迪歐的提議，其目的在造成一種經濟的基礎，使丹牛波諸國得據以取獲財政上的資藉，以恢復其地位。我們又已指出用歐洲的優待稅制，能及時得到若何效果，因以防遏丹牛波諸國的經濟崩潰。於是我們相信，這一回再不能展緩實行了。

此舉的必要性尤有進者，因為我們明確地看到一種危機，不惟威脅着丹牛波諸國，並威脅着目前社會的秩序。

捷克斯拉夫備忘錄，——由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觀點觀察國家與經濟生活之關係。

蒲拉克政治科學自由學校送繳。

依據國際關係科學研究會會議執行委員會所訂的大綱，蒲拉克政治科學自由學校敢先聲明，爰就自己的意見，僅將觀察所得的幾點，貢獻於不久將能開的會議，諒能引起注意。若編製一冊詳細的報告書，把捷克共和國自一九一八年來一切經濟範圍內的活動，備述顛末，縱遵守執行委員的勸告，力求簡括，其結果也不免以一巨冊奉繳會議。尤其是因為捷克斯拉夫的地位，就許多方面看，都是特殊的。它是戰後新造的一個國家，由幾世紀以來各自爲政的兩個區域合併而成的，其間政治的演進與經濟的社會的狀況，皆大不相同。捷克的領土，其昔屬於奧大利的部分，在歐戰以前，已很工業化了，經奧匈帝國的分裂，此區遂失其昔日莫與抗爭的銷場，至其昔屬於匈牙利的部分，則大半仍保持着農業區的性質。

人們應把每一個特別問題，就此兩方面析而爲二，究竟在我們國內表現出來的種種原因，種種傾向，其屬於一般性的止於何點，其屬於特別性的達於何點呢？一句分明的答覆，往往得之不易，卽如貨幣問題或國家財政

，便是這種性質，而這兩種事實的現狀，便是捷克斯拉夫所恃以保障它所承繼前帝國重大遺產的憑依。

新國家憲法及行政的組織，經濟與法律的統一，——固然還沒有完全告成，——在它的經濟上並非沒有影響，尤其是因爲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之間，新政府係由主張紛歧的各政黨（社會黨及非社會黨）結合而成，這就是以說明：——在國際關係裏面及國內經濟社會情形裏面所有客觀的原因的一面，——捷克斯拉夫的政策，就理想的觀點看來，乃係許多矛盾傾向許多勉強妥協的集合，——不過他國的政策，在一定的程度內，人們也可以這樣說。但人們可以看出一種演進，普遍地都遵循着一定的軌道，即他國在送到提案委員會的精采報告中一致指出的軌道，在我的國內也是遵此而行，這就是說，國家的干涉，到處都是日有進展。

我們的國家，因爲領域有限，（僅有居民十三兆半，）沒有在經濟範圍內作大規模試驗的可能，它應當使它自己的政策，大概與鄰國所採用的方

略相適應，對於多半的事態，我們的國家，只有努力自衛以防止鄰國政策波及的衝動。有一種先事預防的方略，可作此類舉動一個例證，就是捷克貨幣的解脫，自從我們偉大的財政部長拉辛（M. Ráša）倡始於一九一九年，又經他在縮緊的程途上（縮減流通的紙幣）繼續地推進，於是把我們從德奧匈所受的金融恐慌及恐慌所帶的嚴重紛擾中，拯救出來。

我們可以說，捷克的經驗，足以證明：——我們的理論家及負責的政治家對於此所見大抵一致，——一種安定的貨幣，乃國民經濟最堅固最耐久基礎，所以人們不能把經濟問題與金融問題隔開，作一深邃的研究。

我們的國家，藉貨幣的安定，竭力推進一種信用獨立的政策，務擺脫外債的需求。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之間，我們沒有借過一次外債，倒是把一九二六年所借的美債，於一九二八年還清了，在一九三一年的恐慌中，我們償還的短期外債，據專門家的估計，總在捷克幣二兆至二兆半可倫。再說，我們穀不上站在國際債主之列，但我們的地位，以此適形優越，

因爲德國一九三一年支付的展期，對於我們的部分，不過不到十億的捷克可倫，（一半是我們銀行家的，一半是我們輸出商的。）憑着此種政策，我們的可倫，保持着他的匯價，（一百可倫值美圓二·九六，）我們希望這個比價，能維持不動於將來，

我們承受了一部重要而已經發展的工業，不得不保護它的國內銷場以抵制外來的競爭，並且不能不藉許多商約保護它的國外銷場，只是這些商約往往不易改善，尤其是在農業國家，因爲我們一方面既擁有一種强有力的工業，一方面又有一種强有力的農業，又有一個强有力的農田黨，（以共和黨名，）而這個黨又是自一九一八年來在每一個政府的組織中都有分的惟一大政黨。

我們在國際貿易上所採取的政策，自一九一八年來，大概如下：戰後的武裝解除，及迎合新條件以謀工業的整理，引起了政府嚴加條規的必要，因爲這種理由，我們把幾種重要的工業組合起來，並與幾個近鄰國家締結

了輸出交抵的條約，保障我們製造品一定數量的輸出，對抗與約國他種物產的輸入，此類輸入品，大抵屬原料及農產物。但在一九二二年，我們已把國際貿易部取消了，從這時候起，我們的商業政策，就是漸漸掃除我們國外貿易上殘留的障礙，全靠着一九二二年制定的新稅則，以保護我們的工業。這種新政策的進行，一面多虧有對內的方略（縮小特許權利的範圍，）一面又多虧有許多國際的商約。可是在一九二六年，我們已設立農產入口稅，在一九三〇年，因世界農業恐慌的壓迫，我們的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法規，大抵以保護我們的農業為對象，最著者如麥價平準之安定，（着重在採用隨時滑溜的稅率。）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輸出，當然不免日甚一日地感受種種不利的影響，一則由於多半與我們有貿易關係的國家，朝着自給自足政策的方向，愈進愈迫，再則由於大半這些國家的財政狀況，近數年內，日趨險惡，尤其是就輸入者的觀點看來，又如英鎊貶價，顯然使我們的輸出商，也受打擊。

最先着手求與新條件相適應的一事，就是我們的糖業，我們輸出的糖，初則爲總產額三分之二，現在已降至總產額之一半，於是國外貿易與國內貿易之比例，初則二與一之比，現在已落到一與一之比了。結果許多製糖工廠，（四十所左右，）都關閉了，國內糖價，比我們輸出的糖價較昂得多，——這個方法，是使國內消費者贊助此項工業的維持，因此項工業，乃係其他多種工業及一大部分農業的憑依。

一九三一年我們的國會通過一種法案，——許多國家足資我們的模型，——使國家保障輸出商所需的信用，並對於此類信用的保險會社，給以補助。

我們還有一種鼓勵國外貿易的方法，係對於特種貨物的輸出商，若輸入特種貨物時，許其免繳入口稅。

此外還有種種法律，一樣是本諸保護國內工業的意思，一樣是以我們鄰國的法律爲模範，卽如限制外國工人的入口，其方法係一方面使外國工人

須請領特許入境執照，一方面使僱用外國工人之僱主，須向官廳聲明。

讓我們再舉幾個數字，（以捷克幣可倫十倍作單位，）作一結束。我們的國外貿易，在一九三一年，總輸入爲一一·八，總輸出爲一三·一，——係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這五年內最低的時期，在一九二八年，我們的輸出額較強得多，曾達到二一·二。我們的輸出差額，在一九三一年爲一·三，在一九二七年爲二·二，在一九二九年則只有〇·五。這幾個數字，足以把上面所提他國經濟財政進展中所生的不幸結果，使我們感受若何影響，明白地表現出來。

在這種狀況之下，人們很容易了解我們最近的經濟政策的特質，——其實我們仍不過求與我們鄰國的政策相適應，——就是用嚴密的條例，干涉輸入，其方式係一種特許制度，並嚴厲統制匯兌，務在可能範圍內，限制非國民經濟利益上絕對需要的輸入品，以維護我們國際貿易的輸出差額，及我們貨幣的安定。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在米蘭舉行第五屆會議中參加人員所代表之團體及其平時任務。

主席：

羅誥君，(M. Alfred Rocco) 意大利司法部長，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主席。

委員及專家：

(甲)屬於國際團體者：

1. 海牙國際法研究院。(Acade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La Haye)

紀德爾君，(M. Gilbert Gidel) 巴黎大學法學院及政治科學專門學校教授，本院副秘書長。

柯勒芬君，(M. Egon Van Kleffens) 荷蘭外交部司長，本院副秘書長。

2. 日內瓦國際研究處。(Bureaud' Etudes internationales, Genève)

齊梅恩君 (M. Alfred Zimmer) 牛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本處主任
齊梅恩夫人，(Mme Alfred Zimmer) 本處副主任。

3. 加奈冀捐設之國際和平促進社歐洲幹部即設在巴黎之國際關係及教育組。(Centre européen de la Dotation Carnegie pour la paix internationale: Divis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 l'éducation, Paris)

巴布科克君，(M. Earle B. Babcock) 本社歐洲幹部副主任。

4. 荷諾盧盧和平邦交院。(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onolulu)
加爾特爾君，(M. Edward C. Carter) 本院內美國委員會祕書。

5. 日內瓦高等國際研究大學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Genève)

滿都君，(M. Paul Mantoux) 本院主任。

(乙)屬於國內團體者：

1. 德國，——柏林國際事務委員會。

郝愛茲希君，(M. Otto Hoetzsch) 柏林大學教授，本會委員會主席。

柏克爾拉特君，(M. Herbert Von Beckerath) 博恩大學經濟學教授。

柏爾柯希特來塞爾君，(M. Arnold Bergsträsser) 海德爾柏爾柯
(Heidelberg) 大學經濟學教授。

雅克君，(M. Ernst Jäckh) 柏林德國高等政治專門學校教授。

勿爾斐爾斯君，(M. Arnold Wolfers) 柏林大學政治學教授，柏林德
國高等政治專門學校主任。

2. 奧國，——維也納領事研究院。

克爾夏格爾君，(M. Richard Kerschagl) 維也納領事研究院及高等

商業專門學校經濟及政治科學教授，奧國國民銀行法律顧問。

3. 坎拿大，——孟特萊爾坎拿大國際事務院。

代表未出席。

4. 丹國，——哥本哈根經濟科學研究院。

裴德爾森君，(M. Jørgen Pedersen) 本院祕書。

5. 美國，——紐約外交委員會。

蓋奔君，(M. Edwin F. Gay) 哈爾襪爾德 (Harvard) 大學經濟史教授，國民經濟研究所主任，本委員會主席。

6. 法國，——巴黎法國高等國際研究協會。

布葛勒君，(M. Célestin Bouglé) 巴黎大學文學院教授，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副主任，法國政府派充國際文化合作社委員。

愛森曼君，(M. Louis Eisemann) 巴黎大學文學院教授，本協會祕書。

岳柯斯君，(M. Louis Joxe) 巴黎大學助教，本協會副祕書。

畢加爾君，(M. Roger Picard) 巴黎大學法學院教授，(未出席)。

7. 英國，——倫敦英國國際研究協會。

賁罕穆君，(M. F. C. C. Benham) 倫敦大學商學教授。

荊霍爾提督，(M. Le. Commandant Stephen King-Hall) 王國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組祕書。

滿寧君，(M. C. A. W. Manning) 倫敦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陶恩畢君，(M. Arnold J. Toynebee) 倫敦大學國際史教授，王國國際事務研究院主任。

維克爾斯君，(M. C. G. Vickers) 副領事。

8. 意大利，——羅馬意大利國際問題科學研究團體集中協社。

姜體爾君，(M. Giovanni Gentile) 上議院議員，前教育部長，本協會主席（未出席）。

斯特法尼君，(M. Alberto De' Stefani) 意大利研究院成員，前財政部長，羅馬市王國大學政治及財政法規院主任。

安布羅西尼君，(M. Gaspare Ambrosini) 巴洛爾穆市 (Palerme) 王

國大學教授，（未出席）。

亞摩羅蘇君，（M. Luigi Amoroso）羅馬市王國大學教授，

柯波拉君，（M. Francesco Coppola）意大利研究院成員，柏路斯市

（Pérouse）王國大學教授。

杜納第君，（M. Donato Donati）巴都市（Padoue）王國大學教授。

斐拉里君，（M. Giannino Ferrari）巴都市王國大學校長。

斐里君，（M. Carlo Emilio Ferri）服務於馬塞拉達市（Macerata）王

國大學及團體部。

加拉夫雷西君，（M. Giuseppe Gallavresi）米蘭市王國大學教授。

金麥利神甫，（Monseigneur Agostino Gemelli）米蘭市薩克雷柯爾

教堂天主教大學校長，（未出席），由該校教授鮑爾德里尼君，

（M. Marcello Boldrini）代表。

詹納康因君，（M. Pasquale Jannaccone）意大利研究院成員，杜林

市 (Turin) 王國大學教授。

摩爾達拉君，(M. Giorgio Mortara) 米蘭市王國大學教授。

李格體君，(M. Giuseppe Righetti) 衆議院議員，意大利文化合作國民委員會祕書。

蘇爾米君，(M. Arrigo Solmi) 衆議院議員，米蘭市王國大學教授。

施巴文達君，(M. Renato Spaventa) 羅馬市王國大學政治及財政法規院教授。

糾里亞諾君，(M. Michele Giuliano) 高等法院法官，意大利委員會祕書。

9. 波蘭，——瓦爾蘇維市波蘭政治科學團體集中委員會。

席比紹夫斯基君，(M. Zygmunt Grbichowski) 瓦爾蘇維大學公法及國際法教授，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成員，本委員會主席。

羅滿君，(M. Antoni Roman) 私立政治學校教授，瓦爾蘇維外交部

經濟顧問，（未出席）。

10. 魯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魯馬尼亞社會院。

馬德家祿君，（M. Virgile Madgearu）前財政部長，前農工商業部長，布加勒斯特高等工商學院經濟教授。

奧蒲雷斯科君，（M. Georges Opresco）布加勒斯特大學教授，（未出席）。

11. 捷克斯拉夫，——蒲拉柯私立政治科學學校。

姚欽君，（M. V. Joachim）本校主任。

郝達克君，（M. Frant Hodák）衆議院議員，蒲拉柯多種科學學校教授，捷克工業家聯盟會總祕書，（未出席）。

報告員：

博恩君，（M. M. Y. Bonn）柏林高等商業學校國際財政及國際經濟教授，——報告題目，即『國家與經濟生活』。

鐸爾東君，(M. Hugh Dalton)倫敦大學經濟學教授，——報告題目，即『國家與經濟生活』。

哈斯君，(M. Wilhelm Haas)柏林德國高等政治學校及高等技術學校教授，——報告題目，係『政治名詞彙編』。

列席：

(一)馬德利德市弗蘭西斯科維克多利亞社 (Asociación Francisco de Victoria Madrid)

雷葉斯君，(M. Manuel Carrasco Y Reyes) 博洛業市西班牙大學校長。

(二)加奈冀捐款建設之國際和平促進社。

邵特威爾君，(M. James T. Shotwell) 科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本社經濟學及歷史學組主任。

(三)羅克斐勒捐款建設。(Rockefeller Foundation)

根因君，(M. Selskar M. Gunn) 本建設在歐洲部分之副主席。
國聯文化合作組織：

(一) 日內瓦國聯祕書處。

杜富爾斐農斯君，(M. A. Dufour-Feronce) 國聯副祕書長。

孟德納霍君，(M. J. D. de Montenach) 文化合作國際委員會祕書。

庫爾曼君，(M. G. G. Kullmann) 文化合作組中之成員。

(二) 巴黎國際文化合作院。

鮑奈君，(M. Henri Bouquet) 本院主任。

皮希特君，(M. Werner Picht) 本院祕書長。

萊特君，(M. F. Chalmers Wright) 本院祕書。

本會主席團：

主席：

羅誥君，(見前)。

副主席：

斯特法尼君，

愛森曼君，

郝愛茲希君，

陶恩畢君，

均見前。

擬定一九三三年對於國家與經濟生活第二度研究會議大綱。

國際關係科學研究團體提綱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開會於米蘭，藉本年米蘭會議對於『國家與經濟生活』討論結果所得的光明，爲下屆研究會議的組織，考量最適當的方法，以資依接，並爲此期間進行的研究，擬定大綱。

出席本會的提綱委員會委員，除斐拉利君 (M. Ferrari) 主席外，有加爾特爾君 (M. Edouard C. Carter) 愛森曼君，(M. Louis Eisenmann) 雅克君，

(M. Ernst Jackh) 荊霍爾君，(M. Stephen King-Hall) ——係接替陶恩畢君 (M. Arnold Toynbee) 者，——及齊梅恩君 (M. Alfred Zimmermann)。列席者有鐸爾東君，(M. Hugh Dalton) 根因君，(M. Selskar M. Gunn) 李格體君，(M. G. Righetti) 及勿爾斐爾斯君 (M. Arnold Wolfers)。又有國際文化合作社，由鮑奈君 (M. Henri Bonnet)，派特君 (M. Werner Picht)，及萊特君 (M. Chalmers Wright)，代表參加。

提綱委員會決定在大體上仍繼續探討去年選定的問題：『國家與經濟生活』註(1)但同時提出下列種種問題以供特別研究：

註(1)參看一——四頁。至於對待外國人民入境的方略之研究，又展緩在下屆會議以後。

(一)侵犯國際貿易的方略：

要特別研究的，是最惠國條約，門戶開放的原則，維持輸入輸出平衡的雙方協定，對外支付的禁例，以輸互相抵償的結帳法。

(二)侵犯國際金融

一切以影響資本周轉爲目的之國內的方略及國際的方略，（對於向外資及向外貸款的監督與節制，及與國際公私債務債權有關的種種方略）。

（二）國家在私人經濟事業上的干涉：

國家主義，——包括地方自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團體制度，工團主義，經濟聯盟。

提綱委員會邀請本會議成員各團體，在此一年中，對其所採取之問題，研究後各作一報告書，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送繳國際文化合作社，俾總報告員得有相當時間，預定議事日程。

各團體的報告書，應先把重要事實，作一有條理的陳述，然後繼以事實的原因與結果之研究。並請各團體，——假使願意的話，——把自己所認爲進化程途的方向，及由研究工作所得的指示，宣布出來。還有一點：會議時的討論，不免涉及由各種曾經實施的方略在國際上曾經發生的作用，在預備研究中，應就國際的觀點上，對這些方略加以思考。

一九三三年的會議，將在全體會議的概括討論以後，分爲三個委員會，分別研究上列的三類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將送繳於異日再開的全體會議。

本會議已接受英國協立國際研究委員會的邀請，一九三三年的會議將在倫敦召集。